俄羅斯研究　汪道涵 题

# 目　录

## 海外俄苏研究



## 人类学·民族学



## 东正教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杨　成、肖辉忠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电话: 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年6月28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6 年第 3 期（双月刊）

# Оглавление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6 年第 3 期（双月刊）

# Contents

2016 年第 3 期　　俄 罗 斯 研 究　　No.3, Jun. 2016
总第 199 期　　Russian Studies　　Gen. No.199

**海外俄苏研究**

# 俄罗斯研究领域的“英国学派”
# ——历史沿革、思想谱系与时代特征

封　帅*

**【内容提要】**英国开展俄罗斯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末，在 400 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学者对于俄罗斯的研究先后经历了“古典时期”、“帝国时期”、“苏联时期”和“转型时期”四个发展阶段，伴随着英俄外交关系的起落，展现出不同的倾向与特点。以“情感倾向”和“研究路径”两个关键要素作为基本维度，对于当前英国俄罗斯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二维空间的落点象限排布，可以展示当前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五种典型的思想理念，并且勾勒出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总体思想谱系。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以其民族特征和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为基础，以开放、多元和包容的精神推动着学术的稳健发展，并影响着英国对俄外交战略的制定，其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都值得中国俄罗斯研究界加以认真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英国学派　历史沿革　思想谱系　时代特征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 03-0003 (34)

1553 年，英国的北极航道探险船队在巴伦支海触礁沉没，大部分船员葬身大海，幸存者被当地人救起，几经辗转最终到达了莫斯科。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幸存的英国人受到了热情而周到的款待，还获得了沙皇伊凡四世的

* 封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接见。这次海难竟成了英国与俄罗斯百年恩怨纠葛的最初起点。[①]俄罗斯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正式出现在大英帝国的视线之中。英国的探险家、商旅、外交人员纷至沓来，试图揭开俄罗斯的神秘面纱，也从此拉开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序幕。

历经 460 多年的积累与传承，一代又一代的英国学者凭借自己的智慧与汗水，浇灌着俄罗斯研究这片争奇斗妍的学术花园，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从研究内容上看，英国学者的研究涉及学科齐全，关注范围遍及俄罗斯研究领域的所有重要议题，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也是纷繁复杂。然而，如果将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视作一个整体，我们又能够很明显地观察到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对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正是这种文化主体与多元理念的有机结合，造就了哲学意义上的“英国学派”，也在世界俄罗斯研究的学术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对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思想进行学术史意义的研讨和分析，以期更加清晰与深入地展示英国学者对于俄罗斯的总体认知，以及这些认知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为此，我们将回顾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对后冷战时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总体状况和思想谱系进行分析介绍，对其时代特征及其外在影响进行解读，以期为读者勾勒出一张“英国学派”较为完整的发展图谱。

## 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历史沿革

在探险家打开了俄罗斯的大门之后，对于世界无比好奇的英国人便开始了对于这个神秘国度的观察和探索。“最早对俄罗斯感兴趣的人主要是那些探险家们，紧随其后的便是商人和观察家们（observers），俄国问题的观察家都是那些头脑最清醒、同时也是最具有客观精神的英国人”。[②]从16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不同行业精英的共同努力下，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在横跨5个

---

① 参见：J. Hamel, *England and Rus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Richard Chancellor, *Richard Chancellor's Discoveries in Russia 1553*, London: Pravda, 1998.

② Bernard Pares, “The Objectives of Russian Study in Britain”, *The Slavonic Review*, Jun 1922, Vol.1, No.1, p.59.

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历经了四个典型的发展阶段，最终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学界的重要地位。

### （一）古典时期（16-18世纪）

英国对于俄罗斯最初的信息和研究主要来自于探险家、旅行者和驻外使节，他们各尽所能地对眼前这个神秘的国度进行直观的描述。这种具有一定猎奇和探险色彩的叙述尽管略显简单，也不乏对俄国的误解和神话，但却充满了原创意义和历史价值。这种类型的研究贯穿了从16世纪末至18世纪的英国学术史，构成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古典时期”。

从目前可考证的资料来看，在英国最早介绍俄罗斯的书籍出版于1584年，是一本署名霍尔西（Horsey）的小册子。该书介绍了俄罗斯的基本情况，并讲述了一些有趣的风俗故事。1584年也被视为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元年。[①]

1588年，英国下院议员基尔斯·弗莱彻（Giles Fletcher）就任英国驻俄大使， 1591年，弗莱彻根据自己在俄罗斯担任大使期间所获得的信息，将俄罗斯经济、贸易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总结成文。这篇名为Of the Russe Common Wealth：Or Maner of Governement by the Russe Emperour[②]的论文，对于1600年以前的俄罗斯社会和经济状况进行了生动而细致的描述，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加上生动的叙事逻辑，使之成为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在17世纪以前最重要的作品，直到现在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7-18世纪，英国与俄罗斯大体上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1689年，沙皇彼得一世化装成一名随团军士参加了俄罗斯使团对英国的访问，“（他）在英国访问了牛津大学，并且会见了物理学家牛顿……于1698年9月回到莫斯科。”[③]在18世纪，英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十八世纪下半期，俄英两国的贸易额不断增加。俄国向英国出口的铁从占75%增加到80%，大麻从40%增加到58%，亚麻从12.5%增加到60%以上。英国造船工业需要的

---

① 该书作者生平不详，由于年代久远，笔者也未能找到原版书籍，对于该书的介绍可参见 Bernard Pares, “The Objectives of Russian Study in Britain”, p.59.

② Giles Fletcher, *Of the Russe common wealth. Or, Maner of gouernement of the Russe emperour, (commonly called the Emperour of Moskouia)*, at London, Printed by T. D. for Thomas Charde, 1591.

③ 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第 33 页。

铁、木材、大麻、帆布，主要仰赖俄国的出口。俄国同英国贸易始终保持顺差。”[①]在这种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上，两国关系异常密切，“在那个世纪（18世纪）的末尾……英国外交界公开信奉的正统的信条已经是：‘把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坏不了的’。”[②]

但在这一时期，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并未再取得更大的突破。整个18世纪，英国学术界对于俄罗斯的研究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与弗莱彻时期相比，研究水准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提高，对于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的描述也基本上没有脱离早期研究的框架。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俄罗斯当时所处的边缘地位密切相关，对于争夺全球殖民霸权的英国来说，当时遥远而又弱小的俄罗斯很难获得英国社会更多的瞩目。直到18世纪下半期，英国成为欧洲列强争霸舞台上的重要一员、英俄关系也成为英国维持欧洲大陆“力量均衡”的重要砝码的时候，俄罗斯对于英国的意义才逐渐为英国各界所重视，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也才在19世纪后期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

### （二）帝国时期（19世纪-1917年）

在很多当代学者看来，现代意义上的英国对俄研究出现在19世纪。[③]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研究集中于沙皇俄国由盛转衰的进程，可以被称为俄罗斯研究的“帝国时期”。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帝国达到了国势的顶峰，也成为英国在国际

---

① 孙成木、刘祖熙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17 页。

② ［德］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67 页。

③ 很多英国学者在追溯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历史时，经常将起点放在 19 世纪。例如英国斯拉夫和东欧研究协会的现任会长史蒂芬·哈钦斯（Stephen Hutchings）就持这种观点，在他撰写的“Russian Studies in UK Universities”一文中，就明确提出“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开始于 19 世纪”。如果从纯粹的历史文献角度上说，这无疑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因为早在 16 世纪，英国已经出现了以俄罗斯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和书籍。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在“古典时期”，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基本上只是将俄罗斯最基本的情况加以介绍，并没有任何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只能算是普及性读物。而从 19 世纪开始，英国的俄罗斯研究才真正具有了现代学术研究的特征，开始运用学术研究的方法对于特定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索。

舞台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俄罗斯的发展与崛起使得英国不得不重新打量这个昔日的小伙伴，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后，英国掀起了一股新的俄罗斯研究热潮。

在经历了启蒙运动和18世纪英国经验论哲学的洗礼之后，英国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已经达到了新的层次，英国学者对于政治问题的研究和考察更加理性和深入。19世纪中期以后的俄罗斯研究开始摆脱“古典时期”那种猎奇、探险和叙述的逻辑，初步具备了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而且在这一时期，来自帝国不同地区的学者、外交官员、记者、商人都参与到了对俄研究中，并且开始全面涉猎俄罗斯的哲学、文化、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这一时期的研究构筑了现代俄罗斯研究的基本雏形，也为未来英国的俄罗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19世纪，英国在俄罗斯研究领域执牛耳者当属唐纳德・华莱士爵士（Sir Donald Mackenzie Wallace）。[①]华莱士爵士是新闻记者和编辑，长期从事新闻媒体工作。从1870年起，他用六年时间辗转俄罗斯帝国全境，观察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并对此加以细致的记录。1877年，华莱士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著作，书名就叫作《俄罗斯》（*Russia*）。[②]书中详细记述了他多年来对于俄罗斯帝国的观察，内容涉及俄罗斯地理、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堪称19世纪末的俄罗斯百科全书。此书的问世在英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几年之内一版再版。他也被学界称为“现代英国学者中探索俄罗斯的先驱者”，[③]成为“帝国时期”英国的俄罗斯研究界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难以置信的语言天赋的哈罗德・威廉姆斯（Harold Williams）是俄罗斯研究领域另一个值得铭记的伟大名字。威廉姆斯生于新西兰，自幼就显示出超强的语言天赋。在上高中之前，他就可以阅读26种语言的圣经故事，而且可以熟练使用15种语言进行读写。受到列夫・托

---

① 唐纳德•华莱士爵士的生平可参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nald_Mackenzie _Wallace

② 在徐葵先生早年的研究成果中也曾提及此书，他将其称为“麦旨齐・华莱士所著的《俄国》一书”，参见徐葵：“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发展概况——访美考察记之一”，《苏联东欧问题》，1983 年第 1 期。

③ Bernard Pares, “The Objectives of Russian Study in Britain”, p.59.

尔斯泰小说和他的人生哲学的影响，他在20岁时学会了俄语和波兰语，并且很快掌握了多种斯拉夫语言。由于他不愿意在研究所任职，因此选择了新闻媒体的工作，成为泰晤士报（*The Times*）驻圣彼得堡的记者[①]。他凭借自己超强的语言天赋，很快掌握了俄罗斯帝国境内复杂的语言和文字，并且利用这种优势深入观察俄罗斯社会状况，同时也见证了如俄罗斯第一次杜马选举等重要的历史时刻。最终他将自己的观察和研究结集出版，这就是英国俄罗斯研究历史上的著名作品《俄罗斯人的俄罗斯》（*Russia of the Russians*）。这位会说58种语言的记者是英国俄罗斯研究史上的奇才，他对于俄罗斯的了解异常深入，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研究者。他也成了那一时代最具权威的俄国问题专家，他的同事曾经对威廉姆斯在俄国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有过这样的描述: "不止一位俄罗斯人曾经告诉我：'威廉姆斯对俄罗斯的了解比我们要深得多'。" [②]

除此之外，英国学者在俄罗斯宗教、俄罗斯文学、以及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等方面的问题上也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③]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关于俄罗斯及俄语的课程走进了英国大学校园。1869年，牛津大学成为第一个开设俄罗斯研究相关课程的学校[④]。1889年，剑桥大学也开设了俄罗斯研究的课程。1907年，在利物浦大学建立了英国第一个专门的俄罗斯研究院（School of Russian Studies），从此俄罗斯研究取得了独立研究部门的地位。

1912年，在伯纳德·佩雷斯（Bernard Pares）的推动下，《俄国评论》

① 有趣的是，*The Times* 在圣彼得堡的记者站正是唐纳德·华莱士爵士建立的。

② 对于威廉姆斯的详细介绍可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old_Williams_(lingist#uthority_on_Russian_affairs

③ 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还有 W.J.Birkbeck 关于俄罗斯宗教的研究，Aylmer Maude 关于托尔斯泰的研究，F.M.H.Skrine 关于俄罗斯政治和军事扩张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关于俄罗斯文化和地区问题的研究等。相关成果参见 Bernard Pares, "The Objectives of Russian Study in Britain", pp.59-60.

④ 关于英国大学中俄罗斯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可参考 Stephen Hutchings, "Russian Studies in UK universities", http://ww.llas.ac.uk/resources/gpg/386/

（*Russian Review*）杂志在利物浦创刊。[①]《俄国评论》不仅是英国，也是整个欧洲最早的俄罗斯研究杂志。《俄国评论》出版之后，英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开始围绕着这本杂志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所有俄罗斯问题的研究者慢慢聚集在该平台上，形成了最初的学术共同体，专业学者逐渐成为研究俄罗斯问题的核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客观上推动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满足战争、外交和商业的需要，英国开始大规模培养俄语人才。从1914年开始，英国大学开始普遍开设俄罗斯研究课程并开展俄语教育。1914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先后设立俄罗斯研究高级讲师（Readership）职位。随着战争的深入，对于俄罗斯的研究热情在整个英国大学中不断蔓延，更多的大学争先恐后地参与到俄罗斯研究中来，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利兹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诺丁汉大学先后设置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教授职位（Professorship）。此外，在格拉斯哥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也开设了俄罗斯问题的讲师课程（Lectureship），其中格拉斯哥大学的俄罗斯研究讲师还在爱丁堡大学兼任同样的课程。在战争期间，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院长罗纳德·巴罗斯（Ronald Burrows）的支持下，伦敦大学学院仿照利物浦大学的模式，成立了自己的斯拉夫研究院（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东欧和斯拉夫世界。这一时期，各个大学的课程设置系统而全面，并且能够为学习者提供较好的俄语培训条件。在战争期间，各大学通过对于俄罗斯帝国的学习和研究，为英国政府和相关企业提供了大量有效的咨询意见和政策建议，为推动英俄之间的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②]

---

① 关于《俄国评论》的创建，还可参阅 Bernard Pares, “The Objectives of Russian Study in Britain”, p.60. 徐葵：“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发展概况——访美考察记之一”，《苏联东欧问题》，1983 年第 1 期。需要说明的是，徐葵先生在文中提到“1912 年，英国的俄国问题学者纳德•佩雷斯在英国利物浦创办了《俄国评论》”，但笔者在研究中并未发现直接提及这一说法的第一手资料（包括佩雷斯本人的文章中也只是写“创办于利物浦的《俄国评论》”），关于伯纳德·佩雷斯生平的介绍中也并未提到他直接创办了这一刊物。但比较明确的是，《俄国评论》杂志创办于利物浦大学，而伯纳德·佩雷斯 1908-1917 年担任利物浦大学俄罗斯研究院院长。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佩雷斯对于《俄国评论》的创建必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杂志是否由其本人亲手创办仍然存疑。特此说明。

② Bernard Pares, “The Objectives of Russian Study in Britain”, pp.60-61.

### （三）苏联时期（1917年-1991年）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沙俄帝国在革命的洪流中灰飞烟灭，英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戛然而止。在时代巨轮的推动下，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也匆匆告别了旧的时代，进入了“苏联时期”。

突如其来的政治变动对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一夜之间，“苏联学”取代了多年来的沙俄帝国研究，经过数十年积累的以沙俄帝国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很多都失去了意义。由于英俄两国关系进入了“休克”的状态，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研究者与苏维埃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几乎所有的英国学者都对崛起的苏联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对其加以研究。在2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学者几乎无法从苏联获得有用的研究资料和信息，研究成果也相当匮乏，这种状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有所改观。

尽管处境困难，但英国学者仍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推进对苏联的研究工作。很多大学仍然坚持了俄罗斯研究的课程，并且继续推广俄语教学。为了获得苏联的相关信息，英国学者大量听取了十月革命后大量涌入英国的俄罗斯移民所带来的苏联内部消息。[①]更加难能可贵的是，1922年，为应付纯粹的苏联研究资源不足的问题，位于伦敦的斯拉夫东欧研究院（SSEES）以《俄国评论》为基础，出版了新的学术杂志《斯拉夫评论》（*The Slavonic Review*），将苏联之外的其他斯拉夫地区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尽可能地开拓研究空间。[②]《斯拉夫评论》在1928年改名为《斯拉夫东欧评论》（*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虽然其发展过程几经波折，但始终坚持出版，至今仍是英国俄罗斯研究界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

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40年代，是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困难时期。政治环境

① 事实上，这种主要依赖流亡者和移民提供信息的研究方法无疑使英国学者的研究出现了偏差，但客观地说，这是特定历史时期英国学者唯一可以依靠的信息来源渠道，应该从历史的视角给予其更宽容的评价。

② 《斯拉夫东欧评论》杂志的发展历史完全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广泛参考了该杂志从 1922 年至今所发表的多篇文章，但其中给笔者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 1922 年创刊号所发表的多篇文章。英国学者在文章中对于俄罗斯研究所投入的真情实感自然流露于笔端，至今读来都令人非常感动。

的限制使得英国学者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步履维艰。英国的苏联研究水准也逐渐落后于欧洲大陆。这种状况的积累酿成了严重的现实后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英国重新与苏联结盟后，苏联研究严重不足的问题迅速凸显，遍数英伦三岛，竟然没有足够的人才可以承担对苏联的外交工作，只能被迫依靠早年来到英国定居的俄裔英国人和二战期间的俄国移民来暂时承担这一重要任务。[①]现实的需要提供了发展的动力，英国的苏联研究在二战期间开始触底反弹。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加快俄语人才的培养，1942年英国政府责成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斯拉夫东欧研究院（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SSEES）[②]设置俄语培训课程，标志着苏联研究终于重新获得英国政府的实质性支持。二战结束后，“苏联学”也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显学。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苏联的了解，英国政府也有意加大了对苏联研究的支持。1947年，英国外交部发表了一份名为*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Oriental, 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的研究报告，即斯卡波罗报告（*Scarbrough Report*）[③]。报告对40年代英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过于忽视非西方世界的倾向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很多英国大学开始加入到苏联问题的研究中来。

俄罗斯研究传统十分悠久的伯明翰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在40年代先后开设了当代苏联问题的相关课程，积极参与苏联学研究。其中，伯明翰大学将苏联经济体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而格拉斯哥大学则选择更加全面地推进苏联学研究。1949年，《苏联研究》（*Soviet Studies*）杂志在格拉斯哥大学创刊，该杂志努力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保证了研究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成为冷战时期英国最权威的苏联学研究刊物之一。在苏联解体之后，杂志于1993年更名为《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

① Victor S. Frank, “Soviet Studies in Western Europe: Britain” in Walter Z. Laqueur, Leopold Labedz (eds.), *The State of Soviet Stud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65, pp.53-54.

② 在建立之初，SSEES 是一个独立的斯拉夫研究机构，后并入伦敦大学学院（UCL），为了保持行文的一致性，下面将统称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东欧研究院。

③ Foreign Office, *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Oriental, 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1947.

至今仍是英国俄罗斯研究最权威的学术刊物。

1950年，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正式成立。在首任院长威廉·迪肯爵士（Sir William Deakin）的积极推动下，圣安东尼学院积极开展苏联和东欧问题的研究。他们以历史研究为核心，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体制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50年代初，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也开始设置苏联政府和制度等方面的课程，参与到苏联学研究中来。

尽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从整体上看，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英国苏联学研究水准仍然非常有限。大部分参与苏联研究的大学仍然在使用二战以前的教学课程，更糟糕的是，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包括牛津、剑桥等名校在内的大部分学校的俄罗斯研究都以语言学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内容。在观察家看来，“语言学是学者的鸦片”①，学者们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在语言学领域，实际上是在尽量回避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从而主动避开意识形态的干扰。这样的研究根本无法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任何有效的咨询服务，势必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于是，资金不足也成了40-50年代困扰英国苏联学研究的最大难题。

整个英国社会对于苏联研究的不满逐渐积累，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1961年，英国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针对英国学术界远东、斯拉夫和非洲研究过于薄弱的状况，发表了名为*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Oriental, Slavonic and African Studies*的研究报告，即著名的“海特报告”（*Hayter Report*）。②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十到十五年中，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非西方世界对于全球的重要性迅速提升，各个大学都需要提高认识，积极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③“海特报告”发表后，英国的苏联研究终于获得了英国政府和相关教育基金的大力资助，从而解决了困扰英国苏联研究的资金问题。

---

① Victor S. Frank, “Soviet Studies in Western Europe: Britain”, p.55.

②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Oriental, Slavonic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1961.

③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Oriental, Slavonic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1961, p.42.

在“海特报告”的影响下，伯明翰大学迅速将自己校内的苏联研究资源整合起来，于1963年成立了专门的俄罗斯和东欧问题研究中心，就此确立了自己在英国的俄罗斯研究重镇的地位。[①]而牛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则进一步完善了已有的苏联研究体系，始终保持着在英国俄罗斯研究界的领先地位。爱丁堡、诺丁汉、曼彻斯特、谢菲尔德等具有俄罗斯研究传统的高校，努力更新自己较为陈旧的教学内容，逐步与苏联学前沿接轨。此外，以斯望西大学（Swansea University）为代表的一批后起之秀，在60年代后也先后在本校设立了苏联、斯拉夫或东欧问题的研究课程与研究机构。“海特报告”出台以后，充分的资金支持使各大学得以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人才培养体系；英国政府的政策导向也促使英国的苏联研究逐步跳出了语言学的桎梏，转向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上来，逐步走向国际苏联学研究的前沿。可以说，“海特报告”的出现，使英国的苏联研究摆脱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极大地推动了冷战时期英国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的进步，使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期。众多新兴的研究机构和传统俄罗斯研究重镇一起，构筑了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基本格局。

20世纪，英国的苏联研究领域英才辈出，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当属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始人，卡尔拥有众多光辉头衔，他曾在先后外交部、大学、媒体和智库工作，从事苏联研究的时间超过40年。卡尔以苏联史研究为切入点，对于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发表了大批极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卡尔的苏联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当属十四卷本的《苏俄史》（*A*

① 即伯明翰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Centre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CREES）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①]从1950年到1978年，卡尔在这部作品上投入了近30年的时间，详细分析了从1917-1929年的苏维埃俄国史。这部巨著凭藉恢宏的议题设计，充分翔实的资料收集，深入而系统的分析逻辑，加上流畅的文字叙述，一经推出便在世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各国广泛流传，堪称现代苏联学研究史上重要的里程碑。[②]

除此之外，冷战时期英国在苏联学研究的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堪称伟大的成就，例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对于苏联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③]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通过文学作品对于极权主义政治模式

---

① Edward Carr, *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Collection of 14 volumes, London: Macmillan, 1950-1978; 各卷具体内容如下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ume 1;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ume 2;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ume 3; *The Interregnum, 1923-1924*;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924-1926*, Volume 1;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924-1926*, Volume 2;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924-1926*, Volume 3, Part 1;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924-1926*, Volume 3, Part 2;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1926-1929*, Volume 1, Part 1;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1926-1929*, Volume 1, Part 2;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1926-1929*, Volume 2;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1926-1929*, Volume 3, Part 1;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1926-1929*, Volume 3, Part 2;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1926-1929*, Volume 3, Part 3.

② 爱德华·卡尔其他关于苏联问题研究的主要作品包括：*Nationalism and After*, London: Macmillan, 1945; *The Soviet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Macmillan, 1946; *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Collection of 14 volumes, London: Macmillan, 1950-1978; “Radek's 'Political Salon' in Berlin 1919”, from *Soviet Studies*, Volume 3, April 1952, pp.411-430; *German-Soviet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919-1939*, London: Geoffrey Cumberlege, 1952; “Stalin”, from *Soviet Studies*, Volume 5, July 1953, pp. 1-7; “Some Notes on Soviet Bashkiria”, from *Soviet Studies*, Volume 8, January 1957, pp. 217-235; “The Origin and Status of the Cheka”, from *Soviet Studies*, Volume 10, July 1958, pp. 1-11; “Pilnyak and the Death of Frunze”, from *Soviet Studies*, Volume 10, October 1958, pp. 162-164; “Editorial Changes in Stalin's Speech of 9 July 1928”, from *Soviet Studies*, Volume 16, January 1965, pp. 339-340; *1917 Before and After*, London: Macmillan, 1969; “The Zinoviev Letter” from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ume 22, March 1979, pp. 209-210; *The Russian Revolution: From Lenin to Stalin (1917-1929)*, London: Macmillan, 1979; *From Napoleon to Stali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③ 以赛亚·伯林关于苏联和俄罗斯的主要作品包括*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39. 4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Russian Thinkers* (co-edited with Aileen Kell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78. 2nd ed. London: Penguin, 2008;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其中部分作品已经有了中译本：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年；《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潘水强、刘北成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0 年。

进行的深刻批判[①]，以及埃里克·诺弗（Alec Nove）[②]、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③]等苏联学家对于苏联社会历史的深入解析。众多苏联研究的大师以及他们的传世之作点亮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苏联时期”，可谓群贤毕至，交相辉映，至今仍为后来者津津乐道。

### （四）转型时期（1991年至今）

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学研究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戛然而止。而且令苏联研究者颇为尴尬的是，没有任何一位苏联学家预见到这一结果。[④]苏联学研究的意义和水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公众的普遍质疑。在这种质疑的声浪之中，英国俄罗斯研究与新生的俄罗斯联邦一起，匆匆进入了“转型时期”。

1989年，英国的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ies Funding Council）就曾委托诺曼·伍丁爵士（Sir Norman Wooding）领导一个学术委员会，对英国大

---

① 乔治·奥威尔，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英国著名作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他最重要的代表为 1945 年出版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和 1948 年出版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他的作品以夸张的方式描绘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未来世界，对于极权主义体系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一般文学作品的层次，被认为是 20 世纪政治类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作。

② 埃里克·诺弗的主要作品包括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77; *Stalinism and after*, London : Allen & Unwin, 1975;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London: Allen Lane, 1969;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83; *Stalinism and after : the road to Gorbachev*, Boston : Unwin Hyman, 1989; (with Domenico Mario Nuti) *Socialist economics: selected read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viet socialism*,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79. 1995。为了纪念他在俄罗斯研究领域作出的卓越贡献，英国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协会（BASEES）将英国斯拉夫东欧研究领域年度最优秀作品奖命名为“埃里克·诺弗奖”

③ 罗伯特·康奎斯特作的主要作品包括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e Soviet Political System*, London: Praeger, 1969; *Man-made Famine in Ukraine*, London: AEI Press, 1984;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Stalin and the Kirov Mu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talin: Breaker of Natio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刘靖北、刘振前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

④ 事后看来，在英语世界，尽管曾有无数人讲到过苏联必然灭亡，但大多属于意识形态式的一般论述，基本上都是无的放矢。在 1989-90 年前后，只有两位学者明确且认真地讨论过苏联在短期内解体的可能，一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丁·马里亚（Martin Malia），一位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而他们均为历史学教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苏联学家。

学的斯拉夫东欧研究进行评估，并最终发表名为*Review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1989*的研究报告，[1]即著名的“伍丁报告”（*Wooding Report*）。在报告中，学术委员会充分肯定了苏东研究的重要价值，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苏联和东欧问题研究的规模，并增加相关研究项目的拨款。因此，在苏联解体之际，英国的俄罗斯研究的经费非常充足，正踌躇满志地迎接新的发展阶段。

虽然未能预测苏联解体的发生，但英国的俄罗斯研究界对于后苏联时代仍充满了期待。大量前所未见的文献档案使很多冷战期间的历史难题迎刃而解，为史学家重新解读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创造了条件。学者们也终于可以自由进入俄罗斯境内开展田野调查，为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俄罗斯对于体制转型知识的渴望也为新时期的俄罗斯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在90年代初，英国的俄罗斯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还是在大学课程设置中所占的比重，都一度达到了历史峰值。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高速发展期并未维持太久。由于经济转型陷入僵局，加上国内政治局势混乱，车臣战争旷日持久，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急剧下滑。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资金对于俄罗斯研究的投资热情急剧下降，很多机构的教学和研究都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而夭折。尽管1995年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HEFCE）的评估报告中，仍然强调要“扩大语言能力训练和文化知识的培养……加强对于地区问题的知识积累，尤其需要加强对前苏联独立国家的关注”[2]，但在90年代后期，随着俄罗斯的衰落，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和俄语教育仍然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俄语语言学学位曾经在英国大学占到外国语言学学位数量的一半以上，但目前仍然授予俄语学位的学校数量已经降至不到20所。”[3]由于缺乏语言基础，大部分学生不会在本科毕业之后选择俄罗斯或斯拉夫研究作为自己研究生学习

---

① Universities Funding Council, *Review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1989*,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89.

②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Review of Forme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Bristol: HEFCE, 1995, p.36.

③ Stephen Hutchings, “Russian Studies in UK universities”, http://www.llas.ac.uk/resources/gpg/386/

的方向，而英国各大学也不再为俄罗斯研究添加研究岗位。直到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政治经济形势趋于稳定，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

据2012年英国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协会[①]（British Association for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BASEES）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英国有将近30家大学或其他研究机构在从事俄罗斯研究方面的工作，从事俄罗斯及斯拉夫东欧问题的研究者共有600多人，其中国际斯拉夫研究中比较活跃的英国学者超过150人，是当代欧洲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俄罗斯东欧问题学术共同体之一。截至2015年，在英国高等院校中，共成立了七个专门的俄罗斯问题研究院（或研究中心），[②]构成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主要基地。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

① 英国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BASEES）是目前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的国家级学术机构。该协会由“国家苏联东欧研究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NASEES）和“英国高校斯拉夫语言学家协会”（British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 of Slavists, BUAS）合并而成。国家苏联东欧研究会是冷战时期英国苏联学研究领域的国家级学术组织，主要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而英国高校斯拉夫语言学家协会则以斯拉夫国家语言学、文学等人文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由于两个协会的工作都围绕着苏联和东欧研究展开，他们的研究既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又能够很好地互补，因此，在学术界和相关教育机构的共同努力下，两个国家级协会最终在 1988 年成功实现了合并，组成了英国苏联、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Soviet,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BASSEES）。1992 年，因为苏联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协会的名称与现实情况不符，经过协会成员讨论决定，取消协会名称中的“苏联”一词，最终改为现在的名称。英国斯拉夫与东欧协会的官方主页为：http://www.basees.org.uk/

② 即以俄罗斯相关问题为主要研究目标的“中心”（Center）和“学院”（School），而以“系”（department） 或者“项目”（Program）为其名称的研究机构则不在此列。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来说，成立专门的研究中心或者研究院都代表着该研究机构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拥有俄罗斯问题研究中心或研究院的研究单位的水平或影响力一定高于其他研究机构。很多没有成立研究中心的大学或科研机构在俄罗斯研究领域同样也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特此说明。

**表1　英国高校中设立的俄罗斯问题研究院列表**

| 学校 | 研究机构 | 优势领域 | 代表人物 |
|---|---|---|---|
| 牛津大学<br>圣安东尼学院 | 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Russian and Eurasian Center） | 政治、历史 | Archie Brown<br>Robert Service<br>Alex Pravda<br>Roy Allison |
| 格拉斯哥大学 | 俄罗斯、中欧、东欧研究中心（Center for Russia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 政治、经济、外交 | Alec Nove<br>Stephen White<br>Richard Berry |
| 伯明翰大学 | 俄罗斯东欧研究中心（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 经济、历史、政治 | Philip Hanson<br>Julia Cooper<br>Maureen Perrie |
| 伦敦大学学院 | 斯拉夫东欧研究院（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 历史、政治、文化 | Alena Ledeneva<br>Simon Dixon |
| 谢菲尔德大学 | 巴赫金中心（Bakhtin Center） | 文化 | Craig Brandist |
| 布里斯托大学 | 俄罗斯东欧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Cultural Studies） | 文化 | Neil Cornwell |
| 爱丁堡大学 | 达什科娃公主俄罗斯中心（Princess Dashkova Russian Center） | 语言、文化 | L.Ryazanova-Clarke<br>Luke March |

除此之外，英国还有2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俄罗斯研究方面拥有较强的实力或突出的特色，其中曼彻斯特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诺丁汉大学、剑桥大学、肯特大学和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很多学者，都在冷战后的俄罗斯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在时代变迁的考验之下，支撑起整个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学术网络。[①]

总的来说，用“转型时代”来形容冷战后英国俄罗斯研究的状况是非常

① 除研究机构和研究者之外，学术刊物也是英国俄罗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发展历史上，先后创办了四本专门指向区域研究的学术刊物，分别为《斯拉夫评论》（*The Slavonic Review*），1922-1927 年刊行；《斯拉夫与东欧评论》（*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1928 年至今刊行；《苏联研究》（*Soviet Studies*），1949-1992 年刊行；《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1993 年至今刊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就不再对各刊物进行详细介绍。

恰当的。一方面，"转型"是俄罗斯当代史的核心内涵，冷战结束后的20年就是俄罗斯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全面转型的20年。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研究也围绕着俄罗斯的转型进程而展开，理解转型就是理解冷战后俄罗斯研究的关键。另一方面，冷战后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自身也在经历着特殊的"转型"历程。由于两极体系瓦解，俄罗斯无论是政治经济体系还是社会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俄罗斯研究也不得不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等问题上加以调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体系也经历了深刻的调整、改革和重组，"转型"正是对这种变革状态的集中反映。[①]

纵观数百年的学科发展史，与曾经的黄金时代相比，当前英国的俄罗斯研究状况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正如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ICCEES）前会长、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约翰·埃尔斯沃斯（John Elsworth）所言，"现在（英国俄罗斯研究）这艘巨轮正指向正确的航向，但还需要很多年才能达到必要的航速。"[②]即便如此，对于中国的欧亚研究领域来说，无论从学科建设的成熟程度、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抑或是学者的国际影响力来看，认真学习与借鉴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仍颇为必要。其悠久的学术传统、深刻的思想理念、极具说服力的结论和观点，都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研究领域的宝贵财富，值得深入挖掘。

## 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思想谱系

近年来，随着中英两国学术界的交往日益密切，英国学者在俄罗斯研究领域的很多代表性成果已在中文学术刊物上多有介绍，诸多经典书籍的中文

① John Elswor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Slavic Studies in the UK", in Osamu Ieda (ed.), *Where are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Headed in the 21st Century?* 21st Century COE Program Occasional Papers No.7, p.1. http://src-h.slav.hokudai.ac.jp/coe21/publish/no7/contents.html

② John Elswor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Slavic Studies in the UK", p.4.

版也先后问世。[①]但如果希望从具体而分散的观点介绍提升到对整个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整体认知，借助“谱系”研究方法就很有必要。

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所谓“谱系”，指的是对家族世系或者其他代际传承过程的详细记载。而在现代思想研究领域，“思想谱系”（spectrum）则具有更加具体的涵义。按照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说法，所谓“思想谱系”研究，就是将分属政治领域左、中、右三派的思想派别和思想家们之间的定位和边界分析清楚。[②]思想谱系研究可以比较全面地展示特定时间、特定范围内不同思想观念的分布情况，可以更准确地表现出不同思想理念之间存在的微妙差异和相互争鸣的过程。因此，绘制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思想谱系”，指的是将当代较有代表性的学者观点按照某些原则和标准进行分类，并且根据观点的二维象限分布状态，总结目前在英国学术界存在的观点差异，并且分析这些差异背后所展现的思想脉络，该谱系的绘制也将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综合视角。

结合当前英国学界的现实状况，我们选取“情感倾向”和“研究路径”两个关键要素作为分析英国俄罗斯研究思想谱系的基本维度。研究者对于俄罗斯的情感倾向被设定为坐标系的横轴，越向左延伸则表明研究者对于俄罗斯正面的情感倾向更加强烈，即所谓的“亲俄派”（Pro-Russian）；向右延伸则表明研究者对于俄罗斯的感受较为负面，即所谓的“反俄派”（Anti-Russian）。而研究者所选取的基本研究路径被设定为纵轴，如果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更依赖理论研究路径，则会出现在坐标系的上方，反之，如果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更多使用传统经验的方法，则会出现在坐标系下方。

为了实现对英国学者思想谱系的构建，我们选取了 10 名在当前俄罗斯研究各个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作为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代表，他们分别

---

① 近年来翻译出版的英国学者重要研究书籍包括：阿奇·布朗：《改变世界的 7 年》，韩凝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 年；多米尼克·利芬（列文）：《俄罗斯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 1807-1814》，吴畋、王宸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 年；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罗伯特·谢伟思：《斯大林传》，李秀芳、李秉中，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 年。

② 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想左与右》，袁银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前言第 1 页。

是：

阿奇·布朗（Archie Brown），牛津大学教授，政治与历史问题专家；

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肯特大学教授，政治问题专家；

史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政治问题专家；

大卫·雷恩（David Lane），剑桥大学教授，经济问题专家；

菲利普·汉森（Philip Hanson），伯明翰大学教授，经济问题专家；

罗伊·埃里森（Roy Allison），牛津大学教授，政治与军事问题专家；

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历史学家；

罗伯特·谢伟思（Robert Service），牛津大学教授，历史学家；

波波·罗（Bobo Lo），原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外交问题专家；

爱德华·卢卡斯（Edward Lucas），专栏作家，政治与外交问题专家。

上述十位学者来自不同研究机构，研究方法及对俄态度各不相同，根据他们在其研究成果中所展示出来的不同思想观念，最终构成了英国学者在俄罗斯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谱系图。

如图 1 所示，根据感情倾向和研究路径的具体差异，十位学者根据自身的研究特点分别落位于思想谱系图的不同位置。而他们所处的位置较为自然地形成了五个大体上相对集中的区域（图 1 中 A−E 位置）。这种状况非常清晰地反映了目前英国学者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的五种不同立场。每种立场的背后都有非常深刻的思想传统和社会基础，每一种立场也都有重要学者作为其在思想理论界的阐述者和代理人。随着俄罗斯转型的深入，尤其在普京执政以后，这种立场和观点之间的差别在英国社会中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并且对英国政府的对外事务决策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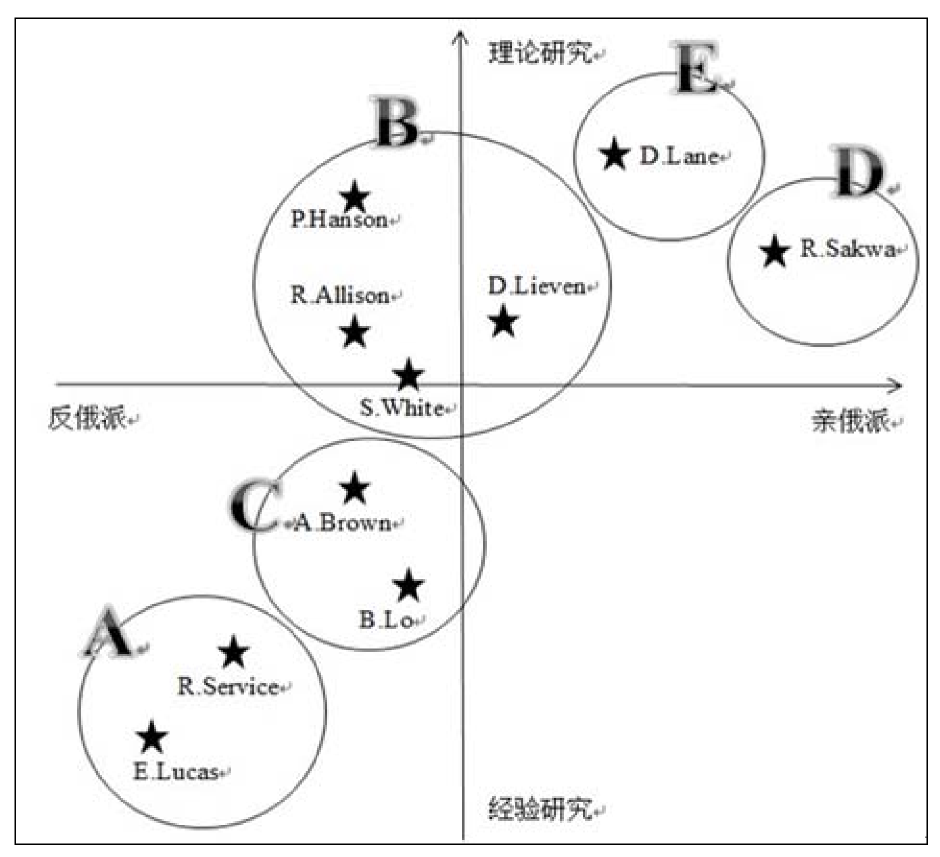


图 1　英国学者在俄罗斯研究领域的思想谱系图

从谱系图的整体状况看，在当前英国社会中，批评和反对俄罗斯政府的声音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无论选择何种研究路径，反俄情绪都是弥漫于学术界和舆论界的主流话语。尽管存在少数学者始终对俄罗斯抱有同情的心态，然而，他们往往只能够通过特定的抽象标准和理论分析的方式为俄罗斯和普京政权的意义及合法性进行论证，任何经验的数据似乎都很难成为他们观点的注解。也因此造就了图中第四象限内的一片空白。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够简单地将当代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单纯地看作是一场反俄反普京的大合唱。事实上，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人群之间，观点和看法的互动过程相当微妙，亲俄派的声音也并非想象中那样微弱。不同立

场的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也存在着许多内在的联系，值得进一步深入剖析。

具体而言，冷战后英国的俄罗斯研究领域较为活跃的思想群体包括以下几类：

**Group A：强硬反对派**

持强烈反俄立场的强硬反对派是当前英国国内影响最大的团体之一。英国国内的强烈反俄思想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十月革命以后，大批沙皇俄国的流亡者前往英国，在英国国内宣传反苏维埃的观念，在英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从此以后，强烈反苏的思想就成为英国内部的重要力量，尤其在冷战期间，反苏思想成为英国国内的主要社会情绪，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991 年，苏联政权解体，强硬反对派将冷战的胜利视为自己努力的成果，因此曾对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发展寄予极大的期望。但随着俄罗斯政治转型的深入，尤其是在普京执政之后，强硬反对派重拾对俄的强烈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由克格勃势力和少数“新贵族”掌控的独裁国家，对内是一个以威权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腐败政府，对外则是仇视西方的帝国政权。他们将俄罗斯视为西方乃至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将对邻国主权和地区稳定造成严重的破坏。

基于这种认知，强硬反对派在对俄政策方面主张对俄罗斯的任何挑衅，都应该以强硬姿态做出回应，例如，西方应该继续推动北约东扩，并且随时吸收有意愿加入北约的新成员；要尽快推进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全面遏制俄罗斯可能的军事威胁；在能源管道的建设上要尽量绕开俄罗斯，欧洲应尽快寻找可替代的资源供应者；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应该继续维护亲西方政权的存在，并且反击俄罗斯的一切阴谋。此外，他们还希望利用各种方式，支持俄罗斯内部的反对派对普京政权发起挑战，从而促进俄罗斯的人权和法制。

强硬反对派对于俄罗斯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外交、历史等领域，在研究方法上，强硬反对派往往都比较擅长经验研究方法，广泛搜集和整理研究资料，通过叙述自然形成结论。其研究成果大多资料翔实，语言生动，具有

很强的说服力。目前，强硬反对派在英国学术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属历史学家罗伯特·谢伟思和《经济学家》杂志的专栏作家爱德华·卢卡斯。谢伟思教授集中研究苏联领袖，他的作品运用了很多新材料，但通过许多材料的组合，他也有意识地将苏联领导人描述成为那种狂热、暴怒，甚至有精神疾病的人，从而达到将苏维埃政权妖魔化的目的。①卢卡斯不仅在其撰写的报刊和杂志的社论文章中对普京和俄罗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还在他的代表作《新冷战：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及其对西方的威胁》②一书中，极度夸大普京的克格勃背景以及普京与苏联政权的关系，并且将普京政权描写为一个腐败、黑暗、嗜杀，充满了阴谋诡计和排外思想的间谍集团，将其视为西方世界的巨大威胁，并且号召各国放弃绥靖思想，重新准备迎接新冷战的到来。强硬反对派的研究成果，极大地迎合了部分英国社会群体的反俄情绪，在英国舆论场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Group B：中间理论派**

强硬反对派在舆论场中影响巨大，但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意识形态因素显然容易对研究的客观性造成干扰。尽管大部分英国学者在情感倾向方面对俄罗斯的转型趋势持负面看法，对于俄罗斯政治转型的过程也不乏批评的声音，但从整体上说，其研究仍然处于相对理性的范围内，而且对于俄罗斯现状也都能够给予较为客观的评价。因此，他们更多选择运用学理方法开展俄罗斯研究，在情感倾向上尽可能追求中立。本类型的研究者属于英国对俄研究的主流，可以称之为中间理论派。

与强硬派相比，中间理论派更好地继承了英国学术界严谨的学术立场和客观的精神，更多地显示出专业学者的风范。从情感维度来看，中间理论派大体上持有较为温和的反俄观念，他们主要是依据经典民主理论的标准，对当代俄罗斯政治体制中的很多现象提出负面评价；从研究路径维度来看，中间理论派则更多地采用理论研究的方式，运用多种理论工具对当代俄罗斯的

---

① Robert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2000; Robert Service, *Stalin: A Bi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2004; Robert Service, *Trotsky: A Bi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2009.

② Edward Lucas, *The New Cold War: Putin's Russia and the Threat to the West*, London: Macmillan, 2008.

转型过程进行分析。中间理论派涉及学科较多，理论化程度根据学科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以菲利普・汉森为代表的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化程度最高；史蒂芬•怀特等政治研究领域的成果则比较平衡地使用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方法；而多米尼克・列文等学者对于俄国历史的研究，更多地体现出了对于俄罗斯历史和社会的同情，并且努力建构理论化观点。总的来说，在英国学术界比较活跃的大部分学院派学者都属于中间理论派，他们思想活跃，对于相关议题讨论广泛，思考深入，研究成果丰富多样，在学术圈影响力巨大，代表着英国对俄研究的主流思想。

但中间理论派的研究者大多缺少外交实践和媒体宣传的经验，研究内容的理论化程度较高，对于政策研究兴趣不高，尤其是对于外交战略方面的问题涉猎较少，在政策影响力方面往往相对有限。而且，由于研究的理论化程度较高，在结论表述方面不易与社会舆论形成共鸣，客观上限制了其社会影响力的发挥。

**Group C：中间反对派**

在强硬反对派与中间理论派之间还存在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情感倾向和研究路径两个维度上，都与强硬反对派有相似之处，但在研究结论和政策选择方面却又存在明显不同。这一群体在很多方面同意强硬派对于当代俄罗斯的看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意他们对俄罗斯进行的分析，但是在他们看来，要应对这一切，需要对国际环境和俄罗斯本身进行更加认真和全面的分析，在战略选择上也需要更加灵活，更加具有战略眼光。从总体上说，他们属于反对派阵营，但在方法和思想上又呈现出很多中间派的现实主义色彩，因此被称为“中间反对派”。

中间反对派的思想渊源也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英国的反苏情绪，但在社会舆论反苏的声浪中，那些实际参与英国对俄外交的资深外交官和对苏联有更深刻理解的资深学者们注意到，尽管苏联政权在很多方面都不能够令人感到愉悦，但作为世界政治的重要行为体，英国仍然不得不与苏联政权继续交往甚至加强合作。因此，确认当今俄罗斯政权存在的问题，但从理智而非感情因素出发，更加灵活地处理俄罗斯事务，便成为中间反对派的基本信条。

就现实情况而言，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政治结构是存在威权主义色彩的，

而且他们也基本同意俄罗斯正在对邻国采取帝国式的态度，但正因为这样，西方国家才更应该采取务实的、以利益为核心的行为模式。西方不能够以想象的、理想主义的方式来期待俄罗斯在未来出现突然的改变，而是应该调整其对俄罗斯国际行为的期望，以现实的态度来看待俄罗斯。

中间反对派中的很多人都曾经亲身经历甚至参与过对俄外交，因此提出的应对策略和解决方案都更有现实意义。目前在英国学术界，牛津大学的阿奇·布朗，前澳大利亚驻俄副大使波波·罗，以及前英驻俄罗斯大使罗德里克·布拉斯维特（Rodric Braithwaite）可以被看作是中间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很多方面对俄罗斯提出了批评，但与强硬派相比较为务实温和。阿奇·布朗通过自己多年的研究，热烈赞颂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功绩，而对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保持着持续却比较谨慎的批评态度。而波波·罗等则在外交研究中提出“就事论事”（case-by-case）的原则，认为应根据自身利益，而非俄罗斯的反应做出决策。西方国家需要采取选择性接触的方式，与俄罗斯就相关问题展开对话，从而实现西方国家所必需的战略目标。

中间反对派的成员多为现实主义者，他们完全承认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而且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人也是现实主义者，通过引诱和施压，促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对话合作是完全可能的。与强硬反对派相比，他们对于俄罗斯事务更加熟悉，也更加冷静务实。与中间理论派相比，他们更加关注当代世界体系中的国际交往活动，也更加擅长实际问题的研究。尽管这一群体在社会舆论和思想理论界的影响比起前述两个群体来都略显逊色，但在英国政府的外交决策过程中却受到了更多的青睐，其思想和观点对于英俄关系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Group D：亲俄派**

如果说前面三个群体属于英国社会对于俄罗斯的主流认知，那么其他两个群体则是英国国内的少数派。

在英国社会中，亲俄的思想理念同样由来已久，即便在苏联时期，英国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人士也都保持着对苏联的好感和认同。[①]在 20 世纪

① 新左翼理论派与这里所说的亲俄派的思想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英国左派思想传统，但目前两派所显示出的研究方法和发展思路显然已经分道扬镳。

90 年代，由于激进转型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和痛苦，部分英国学者对俄罗斯的状况表现出了深切的同情。在普京执政后，围绕着如何评价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这一问题，英国学术界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逐渐形成了新的少数派。

随着普京体制的逐渐成形，大多数英国学者更多地注意到普京体制对于俄罗斯民主政治和私人财产权的负面影响，但在少部分学者看来，普京对当代俄罗斯发展所产生的总体影响是正面而积极的。他们认为，普京为俄罗斯带来了久违的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民族自信心，并且极大地扩展了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使俄罗斯重新作为大国返回到世界政治舞台上来。更重要的是，他们虽然承认关于普京的争议，但始终坚信普京本质上是一位民主的政治家，并且遵守宪法的规定。他的目标是将俄罗斯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国家，而目前之所以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俄罗斯从 90 年代即叶利钦时代的混乱和苦难中解救出来。由于他们对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保持着积极的看法和较好的评价，因此，在英国社会被视为“亲俄派”，或者说“亲普京派”（Putinites）。

亲俄派的学者往往对于俄罗斯的特殊性予以较多的强调，而且对于英国社会对俄罗斯政治的很多批评进行反驳。在他们看来，现在俄罗斯的舆论环境并不比 90 年代更不自由。90 年代是少数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的传媒，而现在虽然国家对媒体也有所控制，但仍然比 90 年代更加开放。在他们看来，普京之所以在当政两届之后让位给梅德韦杰夫，恰恰说明普京对促进俄罗斯民主是非常认真的。他们相信俄罗斯最终将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亲俄派的学者在研究中更多地选取理论研究的路径，对于俄罗斯不同时代的政治转型过程进行不同的理论分类和判断。在英国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亲俄派学者是理查德 •萨科瓦，他的代表作是《普京：俄罗斯的选择》（*Putin: Russia's Choice*），其思想观点从作品的名称上即可看出端倪。[①]而且萨科瓦拥有很大的理论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对普

① 近年来萨科瓦教授对普京的评价也有所改变。不过在和萨科瓦教授的直接交流中，他的一句话给笔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批评普京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之一，但理解当代俄罗斯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模样，则是非常困难的。”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英国国内亲俄派的思想根源。

京体制进行真正学理意义上的解读，并且希望能够为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找到方向。

**Group E：新左翼理论派**

如果说亲俄派更多地属于普京时代的新鲜事物，那么新左翼理论派就应该算是冷战时代的重要“遗产”了。

正如同他们的名字一样，这一群体与英国悠久的左翼思想传统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以著名刊物《新左翼评论》创刊为标志，英国左翼思想在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广泛传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左翼思想家群体，其研究成果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左翼思想与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多年以来，英国左翼理论家一直都对苏联和俄罗斯问题保持着密切的关注。苏联解体之后，尽管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已经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但英国左翼思想家仍然继续坚持以左翼理论的标准检验和评价俄罗斯转型的过程，并且对于苏联和俄罗斯发展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很多当代著名的左翼思想家，例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佩里 • 安德森等都曾积极参与过俄罗斯问题的讨论。秉持着左翼理论的学者坚持左派传统，通过左翼理论分析和评论俄罗斯社会的当代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在英国学术界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小、但极为稳定的群体，即新左翼理论派。

新左翼理论派尽管对于俄罗斯目前的发展状况也颇有微词，但其感情色彩上始终难以摆脱左翼理论中根深蒂固的亲俄情绪。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始终坚持以理论研究为主，并且从经典的社会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分析当代俄罗斯发展进程中的种种问题。他们的研究视角与众不同，观点和结论也较为独特，代表了英国社会一个特殊群体的思想观念。其中，剑桥大学的大卫 •雷恩教授以世界体系理论对于俄罗斯政治精英和经济转型问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因其重视平等、社会利益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素，所以对于俄罗斯转型进程的评论在学术界独具特色。作为一种少数派的声音，也非常值得世界各国的学者认真倾听。

总而言之，批评是当代英国社会对于俄罗斯的主流声音。尤其在社会舆论领域，对于普京体制的反对已经成为新闻报道中的某种政治正确的标准。

但在学术界，尽管反对者同样占据大多数，但是批评的声音相对理性温和，而且也有部分学者保持着中立甚至亲俄的态度。而在外交决策领域，虽然受到社会舆论和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决策者内心可能会对俄罗斯持批判的态度，但在国家行动上更多地倾向于奉行实用主义政策。这种微妙的差异也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应该注意的。

当然，图 1 所展示的思想谱系只是一种宏观的概括，实际上，英国学者看待俄罗斯的观点往往因其家庭出身、工作环境、教育背景乃至个人性格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涉及具体问题时，不同研究者也可能会根据特定情势调整自己的观点。因此，谱系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不能将其绝对化，更不能将其作为研究和判断实际问题的标准。更重要的是，现存的思想谱系并不是静态的，随着时间和情势的变化，各派观点也会随着现实情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无论任何时候，当我们试图对于英国学者的思想倾向进行概括时，都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做出谨慎而具体的分析。

## 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时代特征

凝聚了 400 多年岁月的沉淀和积累，经历了冷战结束后 20 多年的曲折前行，英国学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勇于创新，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局面下，凭借学者们的经验、智慧和努力，发展成为当代国际斯拉夫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术共同体之一。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发展轨迹赋予了英国俄罗斯研究丰富的色彩，展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英国学者在俄罗斯研究方面的思想与方法深深植根于不列颠的民族特性和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之中。**

从整体上看，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仍然承袭了从贝克莱、休谟时代起源的英国经验论的思想传统，强调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对于所有被赋予先验意义的概念和理论都保持谨慎的批判态度。经验主义认识论将研究视为基于经验的基础上对于各种知识和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体与客体、事实状

态与价值判断完全无法割裂。[①]

作为经验哲学的大本营，英国的学术传统奉行的是典型的经验论研究方法，这也使英国的俄罗斯研究拥有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典型特征。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英国学者重视俄罗斯民族文化特性和思想发展的内在轨迹，能够放开历史的视野，努力去探寻俄国人神秘多变的精神世界。传统的英国学者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受到整体主义思想影响，擅长运用历史学、哲学、国际法等传统人文学科的思想和理论，对政治问题加以理解和诠释。在研究过程中重视个人性格、思想观念、历史背景等因素对宏观事件发展产生的影响。他们能够深刻理解历史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广泛运用综合分析、历史叙述和分类比较等经典研究模式，对于个人在特定历史情境中选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进行剖析。

即便是在行为主义和量化分析工具得到广泛运用的今天，新一代英国学者在思想层面上仍然保持着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会将抽象的科学化研究与俄罗斯民族历史与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寻找冰冷的数字与逻辑背后所蕴含的温度和精巧。

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领下，大部分英国学者文风简练、犀利，能够通过简洁明快的语言叙述非常复杂深刻的议题。英国学者往往能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展现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扎实的学术功底，许多优秀学者都擅长跨学科研究，这使得他们的成果往往同时具有多学科价值，获得世界各国研究者的重视和青睐。

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其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创新和进步，对于研究对象的认知也经历了复杂深刻的改变。但作为英国学术沃土上成长起来的重要区域性研究领域，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根基始终是英国的民族特性与哲学传统。它们赋予了英国俄罗斯研究以独到的风骨，汇聚起整个研究的思想内核。也正是由于英国俄罗斯研究拥有这样坚实的基础，才能够在百年的风浪中不断开拓进取，搭建起恢宏的学术大厦，为全球学术界提供有关俄罗斯社会变迁的重要认知

---

① 参见[英]洛克：《人类理解论》，谭善明、徐文秀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与思想。

**第二，开放兼容的帝国传统与相对超然的国际地位，是英国俄罗斯研究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

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能够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稳定发展，并且能够不断产生引领时代的新思想与新理念，与英国的帝国传统和相对超然的国际地位关系密切。

帝国传统给予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界开放和兼容的态度。多年以来，英国学术共同体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姿态，热情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使共同体始终保持着激情与活力。会说 58 种语言的哈罗德 • 威廉姆斯生于新西兰，以赛亚 • 伯林生于拉脱维亚，乔治 • 奥威尔生于印度，而英国苏联学的标志性人物埃里克 • 诺弗则是生于圣彼得堡的俄国人。在当代英国学界，这种开放的状态依然如故，多米尼克 • 列文是沙俄大贵族后裔，波波 • 罗则是长期在英国工作的澳大利亚人。

英国学界开放与兼容的心态还体现在他们对于不同研究思想的宽容态度上。虽然英国当代的社会舆论整体呈现反俄倾向，社会舆论对于俄罗斯和普京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在俄罗斯学术研究领域，亲俄派和左翼学者的观点无论在研究和发表过程中都很少受到限制，其论点也仍然能够很快被学者和公众所知。整个学术界总体上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关于俄罗斯问题的辩论，并且认真倾听少数派的声音。

当然，英国俄罗斯研究的稳定发展也与英国相对超然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密切相关。作为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国，英国同俄罗斯之间保持着非常微妙的政治关系。双方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对抗，也没有形成较高水平的合作。两国之间双边贸易额很小，相互依赖程度较低且缺乏战略互信。英国长期奉行以英美特殊关系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对于俄罗斯则采取相对冷淡的外交姿态。由于英国国家实力所限，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所处的位置也并不算非常重要。英俄之间的双边关系长期保持稳定，但却始终在较低水平上徘徊。

然而，这种外交层面的相对冷淡却无意中给英国学者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在更加宽松的环境中开展研究。因为双方外交关系的相对冷

淡，英国学者不需要在研究中受到本国外交政策和很多实用主义观点的干扰。特殊的超然地位更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干扰，更加冷静地观察和理解俄罗斯社会，更容易得出理性和客观的研究结论。

曾经的帝国传统造就了英国学术界开放与中立的心态，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将多元思想和多元文化带到了英国，经过广泛的学习与吸收，长期的争论与融合，最终形成了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更倾向于回避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以普世心态看待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这种开放多元、兼容并蓄的精神保证了英国俄罗斯研究多年来的稳定发展，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宝贵财富。

**第三，英国学者能够以多种方式对英国的对俄外交战略产生微妙影响。**

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影响并不仅局限于学术界，很多英国学者都试图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咨询。囿于英国政治体制的限制，英国学者的大部分观点还无法直接转化为外交决策。总结起来，目前英国学者对于国家外交决策过程产生影响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通过有政府官员参加的学术研讨会或二轨会议，将学术界卓有见地的观点向政府机构推介，在获得政府机关的认可之后，学者将会有机会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的研讨，并且影响最终的决策。其中 80 年代中期，阿奇·布朗参与撒切尔政府对苏外交决策的过程就是这种模式的最典型案例。1983 年 9 月 8 日，在一场有撒切尔夫人和内阁主要成员参加的学术研讨会中，布朗教授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当时还不为西方所知的戈尔巴乔夫。他将戈尔巴乔夫描述为苏共政治局中最具国际视野、思想最开放的成员，并且断言他将是苏联未来的政坛领袖，可以为苏联与西方关系开辟新的局面。布朗的观点对撒切尔夫人启发很大，戈尔巴乔夫迅速成为英国政府对苏外交中的重点关注目标。1984 年，尚未成为苏联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布朗再次受邀前往唐宁街十号，深入参与接待工作。可以说，布朗的观点在 80 年代英国政府制定对俄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二，英国式的微缩“旋转门”。受制于英国政治体制和行政制度，学者获得美国式“旋转门”的机会有限。然而，在经济、外交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部分顶尖学者仍有可能以咨询顾问的身份进入政府部门短期任职，直

接参与政治活动。例如，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战争需要，英国政府就曾经征召利物浦大学俄罗斯研究院院长伯纳德 •佩雷斯参与对俄外交事务。而在 90 年代之后，英国政府也为经济领域的相关专家提供过类似的短期职务，菲利普 •汉森就曾经受邀担任英国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并在英国财政部短暂任职。当然，由于这种职务的临时性，其工作多以咨询和信息分析为主。

其三，通过积极参与智库机构的研究项目，以研究报告的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间接参与政府的政策研讨。在英国的学术研究体系中，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虽然它在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但实际上从成立之初就与英国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很多外交官员在退出公职之后都受到邀请，参与该机构的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对于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决策仍有一定的影响。多年以来，很多英国学者都以各种方式参与其研究项目。目前，理查德 • 萨科瓦，亚历克斯 • 博拉夫达（Alex Pravda）等多位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都以兼职研究员的身份参与该所斯拉夫欧亚项目的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影响英俄关系的发展。

**第四，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也存在很多难以改变的痼疾。**

一方面，由于经济因素的渗透，公正与客观的立场正在受到挑战。社会资金的注入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也是冷战后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但资本的影响力也使得原本客观的研究有可能失去自己的独立地位。根据波波 • 罗教授的说法，当代西方关于俄罗斯研究这样充满争议和分歧的领域，往往会受到很多外部因素的干扰，特定的政治、思想和商业利益都会影响研究的结果。“对于俄罗斯的研究日益以政策为导向，大学、研究机构和智库不断向基金、政府、多边组织以及企业部门寻求资助。为了获得资金，他们需要展示他们的研究是‘意义重大’的工作。”[①] 所以，关于俄罗斯的演变就不可避免地都更注重提出“特定”的观点，而不是进行客观分析。资本的力量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削弱学术研究的中立地位，这种愈演愈烈的趋势可能使未来英国俄罗斯研究产生方向性的偏差。

---

① 波波 • 罗教授于 2009 年 9 月在华东师大的演讲。此外，在笔者和他的交谈中，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缺陷的存在。

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说，英国学者的研究并没有改变其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根基。尤其是在政治和外交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将西方模式神圣化、并以西方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评判俄罗斯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象。例如，英国学者在描述俄罗斯追求自身利益和西方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时，往往都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在英国学者对俄罗斯的许多解读和评论中也可以发现明显的双重标准痕迹。另外，除了少数左派理论家之外，英国学者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态度往往都有所偏颇。

## 结论：他山之石

在国际研究领域，“英国学派”是一个响亮而荣耀的名字，出于对这一称号的尊重，我们也愿意沿用“英国学派”来称呼不列颠岛上众多研究机构和学者群体。事实上，尽管由于特定的民族性格与思想传统，使得英国学者在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方面存在着某些共同倾向，但具体到俄罗斯研究领域，最后凝结于整个研究群体内心深处的共识其实只是那开放、多元与包容的精神。

作为一个开放的区域研究领域，英国的俄罗斯研究本身既没有设置共同尊奉的理论概念，也从未刻意去构建某种英国式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他们以多元的精神看待各种竞争性学说，并将学者们的独特个性与思想差异视为该领域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局面的根源。他们从未将自己视为一个排他性的群体，永远以包容的心态欢迎着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科的思想、理念和方法。他们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学派”，他们本身就是西方主流学术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与来自世界各国的顶尖学者一起，共同推动着国际俄罗斯研究走向新的未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积极学习，善于学习一直是中国历代学人最为珍贵的品质。面对时代的变革，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发展历程无疑值得中国学术界认真研究与借鉴。随着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对于国际问题研究和地区研究的需要也愈加紧迫，努力学习西方学界的先进经验，在知识与思想上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才能够勇敢而自信地迎接中国俄罗斯研究走向

跨越式发展的新时代，这既是海外俄苏研究系列研究项目的根本目标，也是当代中国学者所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

---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in carrying on Russian studies dates back to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In 400 odd years, the British scholars' Russian studies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namely "classical period", "empire period", "the Soviet Union Period" and "transition period". With the ups and downs of Britain-Russia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re existed different tendencies and characteristics during each period. With the key elements of "sentiment orientation" and "research path" as two basic dimension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outline the general spectrum of Russian studies in Great Britain and analyze five typical concepts within its current Russian studies through examining its present representative viewpoints. Based on it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mpiricist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Russian Studies in Great Britain has gained moderate development through its open, pluralistic and inclusive spirit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affect Britain's Russian strategies as well. Actually, their success and lessons could offer references to Chinese Russian studies circle.

**【Key Words】** English School, History, Spectrum, Characters

**【Аннотация】**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началось в конце 16-го века, за более, чем 400 лет британские учёные выделяли следующие этапы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России: «класс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период империи», «перио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переходный период» — вслед за взлётами и падениям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дан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этапы изучения России также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и различ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зяв «эмоциональ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пу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двух ключевых элементов, проведя анализ двумерного расположения репрезентативных точек текущ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оссии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можно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ть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пяти типичных идей в дан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а также набросать общую генеалогию идей британ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осс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опираются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 философскую традицию эмпиритики, наполнены открытым, плюралистическим и всеобъемлющим духом, содействуют здоров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а также оказывают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России, опыт и уроки, полученные в процессе да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огут и должны послужить примером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Английская школ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генеалогия идей,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эпох

（责任编辑　李 恪）

2016 年第 3 期　　俄 罗 斯 研 究　　No.3, Jun. 2016
总第 199 期　　Russian Studies　　Gen. No.199

# 斯拉夫·欧亚研究的“日本范式”*

阎德学**

【内容提要】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缘起于战争需要，经过二战后的曲折发展，最终以建立“全国共同利用设施”——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为标志，形成了日本区域研究的重要力量，并以创建“斯拉夫·欧亚学”为学科基础，以重新诠释的“帝国理论”为理论框架，跃升为国际斯拉夫学界一支举足轻重的研究团队。在学科发展上，日本学者通过重大课题牵引，建设和完善学科体系，注重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注重多学科跨学科地比较研究，注重地区小国的研究，设定的研究课题具体而微观，通过田野调查以及国际化、多语种地全方位研究，注重研究资料的长期积累，所以笔者将上述特征归纳为斯拉夫·欧亚研究的“日本范式”，希望对中国以及世界的斯拉夫·欧亚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斯拉夫·欧亚研究　日本范式　帝国理论　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 03-0037 (27)

冷战结束至今，日本学者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以创建日本的“斯拉夫·欧亚学”为标志，开辟了一条区域研究领域的新路径，意味着日本的斯拉夫区域研究经过探索和发展，跃上了更高水平的研究平台，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

* 特别感谢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前主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松里公孝对本文的指导。

** 阎德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上海高校智库华东师范大学周边中心。

期。日本今天的斯拉夫区域研究业绩绝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通过冷战前、冷战中、冷战后等几个发展阶段的积累、断层、重启、发展、完善和提升等过程才得以形成的。本文重点通过冷战结束后，以日本对俄罗斯社会全面转型的各种分析视角，来观察日本学者进行斯拉夫区域研究的若干重要特征，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炼归纳出斯拉夫区域研究的“日本范式”。

## 一、日本斯拉夫·欧亚研究意义的认知

在提出斯拉夫区域研究的“日本范式”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冷战后日本学者从事斯拉夫区域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何在，否则，归纳出所谓的“日本范式”也必然显得牵强附会。

对于日本从事斯拉夫区域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日本学者有不同的认识角度。譬如，北海道大学副校长、斯拉夫研究中心前主任原晖之教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世界各国之中，无论对于过去的日本还是对于现在的日本，俄罗斯都是最具重要意义的国家，这一点谁都不会否认；将焦点聚焦于俄罗斯，最重要而又最单纯的理由，就是俄罗斯是日本的邻国。日本与东欧国家的关系，绝没有日本与俄罗斯那样密切，甚至有时只是以邻国俄罗斯为中介的间接关系。可是，俄罗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邻国，这一事实不容置疑。原晖之教授还指出，自“十月革命”以后，日俄两国实行了不同的制度，这一点也很重要。但在阐述两国不同的制度问题之前，必须抓住俄罗斯幅员辽阔这一地理上的特点。俄罗斯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在欧洲，可是远东地区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日本与俄罗斯的直接接触点，这种地理上的特性是考察日俄关系的关键。[①]从历史上看，明治维新后的近代日本，其对外政策的根本取向是对亚洲邻国进行扩张，而横亘在日本面前的阻挡势力就是俄罗斯帝国。关于当时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于 1890 年第一届议会施政演说中提出：“一要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之侵害；二要防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所谓主权线，

---

① ［日］原暉之、外川継男編：『 講座　スラブと日本』第 8 巻、弘文堂、1994 年 12 月、前言。

乃是国家之疆土；所谓利益线，则是与邻国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相关之地域。方今处于列国之间，仅只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还必须同时保卫利益线”。[①] 而保卫外围利益线的背景，是因为俄罗斯即将修建横穿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当时日本对此事的判断是，虽然西伯利亚大铁路是连接俄罗斯中心部与东部边境的国内铁路，但是，它将对“东洋和平”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危机感提出的“利益线”概念，后来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形成了近代日本安全保障观的基础框架。因此，近代日本对俄国的关注与对亚洲邻国的态度联系在一起，并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近代的负面遗产经过战后冷战时期一直延续至今。[②]

东京大学盐川伸明教授则提出从区域研究的学术视角来认识俄罗斯研究的价值。他指出，日本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传统上是由欧美世界和东亚世界这两根支柱构成的，而在一个历史时期，紧随前两者之后的“第三根支柱”还有俄罗斯·苏联。之所以对俄苏予以强烈关注，是因为苏联不仅是一个“世界超级大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是，苏联解体后，日本对社会主义的关注极为低落，对从“超级大国”地位滑落的俄罗斯也不太关注。中东伊斯兰世界则取而代之，成为日本区域研究的“第三根支柱”。日本人对于世界认识的视角变化不可避免，而且近期在整体上也看不出会发生逆转。因此，盐川伸明提出，关于日本人的世界认识，欧美、东亚和伊斯兰世界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俄罗斯与前三者全部相互关联，并且保持着各种交流、摩擦、相互渗透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欧亚地区构成了非常独特的空间。抓住这一特征来阐述俄罗斯与邻接地区的相互关系，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③]

与侧重地缘政治因素和近代战争遗产的日本学者的观点相比，欧美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西里尔·E·布莱克教授曾在日本斯拉夫研究中心讲学。由他牵头组织了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

---

① 转引自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② [日]原暉之、外川継男編：『 講座　スラブと日本』第8巻、前言。

③ [日]塩川伸明：「日本におけるロシア史研究の50年」、『ロシア史研究、2006年総第79号。

等的 8 位美国学者，通过日本和俄国现代化模式的比较研究来阐述俄苏研究的价值，也是一种颇为独特的视角。对于为何选择日本与俄国来进行比较，他们指出：日本与俄国有许多共同点，第一，两国都是晚近加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在 19 世纪时的发展水平相差不多，而且两国都有决心、有能力赶上较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第二，两国都从 17 世纪起存在有效的中央治理传统，都处于更高文化区域的中华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周围。第三，两国都有着牢固历史基础的价值制度，强调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中央政府应该在国家发展方面起主导作用，以及权威政治人物确定的为国家利益献身和做出牺牲的道德。①他们根据日俄两国诸多的相似点，对两国的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增长、社会依赖以及知识和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的最终结论是：日本和俄国引进的政治体制和技术是成功的，但这种做法只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日本和俄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或者说实现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模式是：为了实现现代化，领导人拥有通过公私机构进行社会动员的能力，包括集中进行政治控制和协调的能力、管理资源并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鼓励社会互相依赖的能力、以及通过研究和教育来产生和分配知识的能力。②

同样，俄国也有学者从日俄两国面临着现代化这一共同课题来阐述俄日两国应该接近。比如，发动明治维新的许多日本人曾是彼得大帝的“狂热的追随者”，对彼得大帝的改革给予高度评价。③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以彼得大帝改革为样本，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历法改革和留短发等方面，18 世纪初的俄国改革与明治维新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同点。日俄两国在达成现代化这一相同的目标方面有着相互理解的基础。因此，20 世纪初期俄国知识分子倡导的理想，能在日本民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俄罗斯文学深受日本人欢迎的秘密也源于此。日本的知识分子常常把俄国知识分子的烦恼作为自己身上的事物加以认识。俄国文学中的主人公力求在不断欧化的浪潮中，确立俄

---

① ［美］西里尔·E·布莱克：商务印书馆译，《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年，第 34-43 页。
② 同上，第 436-437 页。
③ ［俄］梅切尼科夫：《流亡俄国人眼中的明治维新》，讲谈社学术文库，1982 年版，第 25 页。

罗斯人的身份认同，日本人也从俄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发现自己。[①]因此可以说，在被迫走上“促成现代化”的道路方面，日俄两国形成了“日本人与俄国人类似”的意识。日本当时的文献资料，有不少是以日俄两国的国民性相类似为主题进行阐述的，比如提倡国家主义的内田良平、宗教思想家内村鉴三、立宪国民党党首犬养毅，就是其中的代表。当时日本学者的思想动向可以通过下面这段话反映出来：“日本和俄罗斯在文明发展史上都是新成员。这两个新的大国互相合作对于将来的世界文明具有重大意义……日本民族和俄罗斯民族还很年轻，富有朝气，将来大有可为。正因为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未成品，所以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②]

中国学者冯绍雷教授则从俄罗斯和日本对地区安全认知的视角强调俄日关系问题的研究价值。冯绍雷指出：俄罗斯学者对于日本的认识是，日本凭借其经济、金融和技术力量优势在远东地区占有一个中心地位，日本正刻意通过其实力和政策调整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矮子”这样一种局面。这种努力既是远东地区进行国际合作的机会，同时也将带来挑战。其中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日本与美国是战略盟友，而俄日之间还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因此，俄罗斯学者认为，凭藉与美国的战略盟友关系，日本能够通过接近中国，达到从俄罗斯获利的目的。而另一方面，日本也非常担心中国崛起，也有意愿与俄罗斯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以抵制中国崛起的影响。[③]

总体来看，国外学者对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分析，要比日本学者的阐述更为丰富、视角也更广阔一些，但是日本学者的观点不容忽视。

## 二、斯拉夫·欧亚研究的“日本范式”

其实，本文并非有意要创造出一个所谓的斯拉夫区域研究的“日本范

① ［日］沢田和彦：「新潟とロシア：1900-1944 年」、『ロシア文化と近代日本』，世界思想社、1998 年、191 頁。
② ［日］昇曙夢：「日本民族と露西亜民族（日本国民性の比較研究）」，『日本評論』1 巻 18 号、1916 年 10 月 1 日、第 78 頁。
③ 冯绍雷：“远东地区：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的安全认知”，《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 5 期。

式”，而是通过对冷战后日本的俄罗斯历史研究、俄罗斯的政治转型、经济转轨、社会变迁、国内体制与对外战略互动研究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之后[①]，受到日本学者致力于创建“斯拉夫·欧亚学”的启发，尝试着提出日本在冷战后的斯拉夫区域研究（也应该包括冷战期间的斯拉夫区域研究）方面，是否有一种为日本学者所特有、但不为其他国家的学者所共有或者有所忽视的研究方法上的特征？又有哪些背景因素支持这些特征的产生？如果将日本学者从事斯拉夫区域研究的主要特征归纳起来，是否可以用一个简洁的“日本范式”来概括？其实，上述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需要回答冷战后日本学者从事斯拉夫区域研究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因此，我们将围绕冷战后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的主要特征进行阐述。

**（一）通过国家级课题立项牵引，建设和完善区域研究的学科体系**

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的一个明显变化，是非常重视国家级的课题立项，因为国家级的立项课题往往会起到某一研究领域的牵引“火车头”的作用。这种研究机制也是 21 世纪世界各国学术研究的一种大趋势，并非为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所特有。国家级的重点研究课题，既有国家所需的应用研究，也有经过整体论证的基础性研究，较好地体现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在研究方法上更是采用跨学科、多部门、集体攻关等方式，而且还有较为充足的经费支持，在学科领域内的学术影响也非常广泛，所以深受研究机构和学者的青睐。

冷战后日本的斯拉夫区域研究，在国家级课题立项上不断出现重大突破，其中，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最具代表性。进入 21 世纪之后，日

① 相关论文请参见阎德学：“冷战后日本的俄罗斯政治研究综述”，《东南亚纵横》，2011 年第 4 期；阎德学：“冷战后日本关于俄罗斯社会转型研究综述”，《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 年第 4 期。

本文部科学省自 2002 年开始实施“21 世纪COE项目”[①]，重点支持大学建设具有世界水准的研究教育基地，希望以此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大学。2002 年、2003 年和 2004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全日本的大学实施了为期 5 年的“21 世纪COE项目”，最终在日本 93 所大学建立起 274 个“卓越的研究教育基地”，得到国内外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高度赞赏，也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21 世纪COE项目”中，与国别和区域研究相关的领域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跨学科、复合、新领域”三类。最终，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学的构建：中域圈的形成和全球化”（2003-2007 年度）、早稻田大学“现代亚洲学的创建”和爱知大学的“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等三个项目获得“跨学科、复合、新领域”的立项，九州大学的“东亚与日本：交流与变迁”获得“人文科学”的立项。斯拉夫研究中心能够在以欧美和亚洲研究为中心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获得立项，充分表明该中心在日本斯拉夫研究界的核心地位，也可以说，斯拉夫研究中心已经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界树立起“第三根支柱”。通过国家项目的牵引，斯拉夫研究中心创建了日本的“斯拉夫・欧亚学”，为国别和区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跨地区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路径。

为充实和发展“21 世纪COE项目”，进一步充实和加强日本大学研究生院的教育研究功能，重点支持日本大学的研究生院建成国际一流的教育研究基地，并且依托世界最高水平的研究基地培养出领导世界的创新型人才，以此来推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学建设[②]，自 2007 年起，日本文部科学省开始实施新的项目——“全球COE项目（后 21 世纪COE项目）”。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面向全日本的大学，实施为期 5 年的“全球COE项目。”其中，与国际问题相关的立项课题只有两项：早稻田大学的

---

① 日本文部科学省从 2002 年起，采取公开竞争方式，根据第三方评价，有重点地资助世界性研究教育机构的形成，推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最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为此实施了“重点资助世界性研究教育机构的形成——21 世纪 COE 项目”。该项目针对设有研究生院博士课程的研究教育机构，接受这些机构大学校长的申请，在第三方评价后，再拨付资金，选定资助对象。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日本学术振兴会“21 世纪 COE 项目委员会”对项目进行审查和评价。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coe/020801.htm

②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グローバルCOEプログラムの概要について」、2006 年 10 月 16 日。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coe/06101307.pdf

“为整合亚洲地区而培养世界型的人才基地”和北海道大学的“边境研究的基地建设：斯拉夫・欧亚地区与世界”（2009-2013 年度）。这是斯拉夫研究中心获得的第二个国家基地建设项目。课题负责人岩下明裕教授指出，项目的建设目标是将日本分散的边境研究组织起来，利用北海道的地理优势，将斯拉夫・欧亚地区的学术研究以及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教育研究集中起来，建设一个综合性的复合型学术基地；并以北海道大学为基地，汇集全日本的边境研究力量，创建相关学会，按照国际标准向世界发出日本学者的声音；并与欧美相关学会合作，主导建立世界性的研究框架，利用这些平台来培养下一代学者以及从事具体业务的实干家。[①]该课题之所以能获得立项，重要的因素在于，它充分借助已经结项的 21 世纪COE项目“斯拉夫・欧亚学的构建：中域圈的形成和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并继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所以无论在人才培养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都被寄予很高的期望。[②]

自 2008 年起，日本文部科学省又设立“新学术领域研究”项目，成为日本又一类的高级别国家项目。设立目的是，发现无法纳入现有研究领域框架中的新兴-融合领域，开展不同学术领域之间的合作，促进随着学术水平的提高而带来的研究领域的革新与挑战。[③]实际上，从立项结果来看，日本每年只有一个“人文・社会”类项目立项，其他都是理工生物类项目。在如此严酷的竞争环境中，斯拉夫研究中心竟能脱颖而出，田畑伸一郎教授（斯拉夫研究中心现主任）申报的“欧亚区域大国的比较研究”（2008-2012 年度）获得了“新学术领域研究”立项，标志着斯拉夫研究中心的研究范围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斯拉夫・欧亚地区扩展到中国、印度乃至土耳其等大欧亚地区，并试图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冷战后的国际格局进行区域层次的剖析。而以欧美和亚洲研究为重点的国际问题研究基地，目前还没有“新学术领域研究”的立项。直到 2012 年，筑波大学长木晃教授申报的“作为现代文明基层的古代西亚文明：为了克服文明冲突论”（2012-2016 年度）立项

---

① ［日]岩下明裕:『「境界研究の拠点形成」概要および採択理由』。http://www.jsps.go.jp/j-globalcoe/data/kyoten/k/K01.pdf

② 同上。

③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平成 20 年度から科学研究費補助金「新学術領域研究（研究領域提案型）」として新たに発足する研究領域について』。http://www.mext.go.jp/a_menu/shinkou/hojyo/1256618.htm

之后，每年都会有一个人文社科类的课题立项，像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园部哲史教授申报的“解读新兴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类型”（2013-2017 年度）、茨城大学青山和夫教授申报的“古代美洲的比较文明论”（2014-2018 年度）、金泽大学中村慎一教授申报的“稻作与中国文明：综合稻作文明学的新构建”（2015-2019 年度）等课题获得“新学术领域研究”立项，突破了区域和国别研究领域，上升为更高层次的文明论研究，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文部科学省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宏观指导方向。

2013 年 11 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欧亚区域大国的比较研究”进行结项验收，总体评价是“大致达到了预期效果，但存在不足”，主要问题在于“按照学科领域或者区域分野进行研究，不能展现研究成果的整体面貌和做出综合结论，没有明确展现超越以往的人文社科理论之所在”。2015 年 2 月，全球COE项目委员会对“全球COE项目”等 9 个项目进行结项验收，“边境研究的基地建设：斯拉夫・欧亚地区与世界”项目获得最高评价（共有 5 个项目获得最高评价），认为课题“充分达成了立项目的”[①]。可以说，无论是“21 世纪COE项目”、“全球COE项目”还是“新学术领域研究”项目，都代表着日本学术界的最高研究水平，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是唯一三度获得立项的研究基地，而且总体上获得较高的结项验收评价，充分表明该中心在整个日本国际问题研究界已经建立起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引领着日本的欧亚区域研究乃至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方向。

同样，像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有着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承担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政府机构的委托课题当然是份内之事。譬如，作为日本外务省的智库，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核心职能，是开展国际关系与外交问题的基础研究，同时进行国际形势的调查研究，为制定外交政策服务。该所领受多项日本外务省下达的委托课题，譬如关于俄罗斯问题的委托课题有：“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形势研究”（2000 年）、“俄罗斯外交——从俄罗斯与欧洲、美国关系的视角”（2001 年）、“俄罗斯企业制度改革的现状”（2002 年）、“伊拉克战争后普京政权的对外政策全貌”

① [日]日本学术振兴会：『平成 21 年度採択拠点事後評価について』、第 9 頁。http://www.jsps.go.jp/j-globalcoe/data/h21/houkokusho21.pdf

（2003 年）、“俄罗斯的政策决策——诸多力量与过程”（2010 年）、“俄罗斯政治体系的变迁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2013 年）、“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和日本的经济安全”（2014 年）、“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探讨”（2016 年）等，这些调研报告都会成为日本对外决策的参考依据，但最终对于决策影响的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 （二）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

作为实体研究机构，斯拉夫研究中心从 1953 年最初成立研究室之日起，就明确以下三项功能，并成为此后 60 余年发展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多学科研究理念，从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斯拉夫区域进行研究；二是坚持开放性原则组建研究团队，换言之，斯拉夫研究中心可以超越北海道大学的范围，面向日本所有高校和从事斯拉夫・欧亚研究的学术机构招聘研究人员；三是坚持纯学术与共同研究的理念，有意识地与当时美国流行的决策学、战略学等视角保持距离，强调以学术性为基本研究导向。[①]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亲历者再总结当时的经验时认为，正是因为自创立之初就坚持与政策研究和安全战略研究保持距离，并将自身定位于跨学科的“区域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一个跨越院系和大学围栏的机构，再加上排斥左右两派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秉持开放自由的学术精神，因此该中心才能从北海道大学内部一个普通的研究机构跃升为全日本共同利用的研究机构。[②]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会刊——《斯拉夫研究》，其刊载的学术成果直接反映出该中心纯学术研究的理念，刊载的文章几乎没有政策和对策研究类的文章，即便是政治经济等与时政问题密切相关的领域，也都是从实证研究的视角对问题进行学理上的阐析。比如，《斯拉夫研究》把民族问题看作是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点课题，但并没有紧密跟踪车臣等热点问题，而是恪守着一贯的学术原则，与热点和时政问题保持距离，注重从历史和人类学等视角来研究俄罗斯的民族问题。

---

① ［日］望月哲男：「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40 周年によせて」、『スラヴ研究（Slavic Studies）』、1995 年第 42 号。
② ［日］外川継男：「スラ研の思い出（第 2 回）」、『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ニュース』、1999 年第 76 号。

还有像俄罗斯史研究会、比较经济体制学会、俄罗斯·东欧学会等学术研究机构，它们的研究风格各具特色，无法以一概全。譬如，俄罗斯史研究会成立至今，秉持着“在野的精神”，有意识地拒绝被学院派的风气同化，排斥学术上恶劣的形式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影响，追求高层次的学问取向，并用这种精神去开创未来。[①]比较经济体制学会前身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会，最初的成员都是由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构成，学会会刊《比较经济研究》上刊载的论文反映了该学会的主要研究特色，即，以问题意识为导引，力求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多维度地阐释清楚具体的问题领域，实施办法就是围绕学会每年举办的大会主题来撰写论文，择优录用。这样办刊有如下优点：一是主题集中，每期刊物的文章都围绕着共同的主题来阐述；二是集众人之智来解决具体的问题，以此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三是引导着会员的研究方向，保障会员们共享最新的学术信息。俄罗斯·东欧学会前身是苏联·东欧学会，其成员由研究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学者构成。学会会刊《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上的文章，是该学会的会员学者在一种自发的、无序的状态中，凭着各自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领域来撰写发表的，反映的是一种自由研究的学术结果。而《比较经济研究》上的文章，学者是在一种研究主题被规定的、有序状态中，结合各自擅长的研究领域而撰写的文章，反映的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结果。两者的不同风格，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比较经济体制学会和俄罗斯·东欧学会在冷战时期的形成背景，虽然冷战结束后二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几乎消失殆尽，但在研究风格上似乎还保留着过去的传统，即比较经济体制学会更注重组织性和计划性，而俄罗斯·东欧学会更重视个人的发挥和自由创作。这里没有论断孰是孰非的问题，只是强调两者不同的研究风格。

与注重纯粹学术研究的民间研究机构不同，日本政府及其相关背景的研究机构则是以服务于政府的决策咨询为其研究的一项宗旨。譬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日本外务省进行对外决策的智囊机构，防卫研究所是日本防卫省在安全保障方面进行决策分析的智囊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是日本经济产业省在对外经济决策方面的调研机构，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与经

---

① [日]塩川伸明：「日本におけるロシア史研究の50年」。

济动向有着准确而及时的跟踪把握，尤其对经济情况的把握可用“全面准确、扎实细致”来形容。这些研究机构，极为重视俄罗斯等具体问题的调查研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权威性。

但是，学界研究机构的纯学术研究与政府研究机构的政策研究，两者之间也并不是相互孤立、平行进行的，而是通过研究人员相互参与对方的研究课题，借助彼此的专长，合力出台较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同时，参与者本人的研究领域也会得到深化。在民间与政府的研究机构交流方面，往往是政府研究机构更重视借助民间学者的研究力量。譬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调研报告——《俄罗斯的政策决策——诸多力量与过程》（2010 年 3 月），就是由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横手慎二牵头，上智大学教授上野俊彦、亚细亚大学教授永纲宪悟、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官兵头慎治，以及瑞穗综合研究所、东北大学、京都大学等研究机构与大学的专家学者参与撰写，代表了当时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俄罗斯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相信，这项研究成果一定有助于提高日本的俄罗斯政治研究的水平。[①]同样，日本防卫研究所自 1999 年以来，专门邀请政府部门以外的著名学者和专家，主办“防卫战略研究会议”，预测未来全球的战略环境，思考日本防卫战略的各种选择。当然，日本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也会参与民间学术机构的学术活动，比如，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官兵头慎治、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横川和穗等，经常参与斯拉夫研究中心、俄罗斯・东欧学会等民间研究机构的学术会议和科研项目。

松里公孝教授在与笔者交流时指出：与欧美和中国不同，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并不要求文科类的研究成果对现实社会和政府起到资政作用。这应该是民间研究机构坚持纯学术路线的一个主要背景，但是，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民间与政府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又做到了两者的融会贯通，在取长补短的过程中得到良性的发展。

### （三）注重多学科、跨学科与比较研究

---

① ［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调研报告：『ロシアの政策決定—諸勢力と過程』、前言、2010 年 3 月。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向松里公孝教授请教，他说，日本学术界之所以注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流和人员往来，是因为日本学者总体人数较少，无法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截然分开。比如，一个历史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学者，有时还会进行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这对于掌握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比如利用统计学来对政治选举进行分析）来说是不利的，但政治学者具有历史、宗教、语言、民族等人文科学的知识，因此在分析民族冲突等问题时，要比欠缺人文素养的欧美社会学者更容易发表优秀的见解。

关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流与学者互动的情形，观察一下斯拉夫研究中心是如何建设“全球 COE 项目”——“边境研究的基地建设：斯拉夫・欧亚地区与世界”的，就能做出基本的判断。该项目的总体建设思路是，作为世界水准的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基地，将斯拉夫研究中心积累的经验与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的人文与社会专业的教学以及运作功能有机结合起来，设立实况研究与表象研究两个大组，每组再各设斯拉夫・欧亚地区班与比较・大区域班两个班组，这样，一共设立 4 个班组开展研究与教学。同时，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研究中心、文学研究科与博物馆等核心机构作为基地运营的业务中心，参与基地的教育项目。关于项目的核心团队人员构成情况，请参考表 1“边境研究的基地建设”项目的核心人员构成与研究方向。可以看出，“全球 COE 项目”——“边境研究的基地建设”的研究人员构成及其研究方向，完全体现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流与合作，甚至可以说是以历史、文学、哲学、语言学等人文科学来引领政治、经济、区域研究等社会科学的发展。如果考虑到斯拉夫研究中心始终坚持的多学科研究理念，更容易体会到人文与社会科学互相交融对于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的意义。当然，“边境研究的基地建设”项目也同时反映出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以及对俄罗斯与中国等地区国家进行比较研究的研究方法。

表 1 “边境研究的基地建设”项目的核心人员构成与研究方向

| 实况研究 | | 表象研究 | |
|---|---|---|---|
| **斯拉夫・欧亚地区** | **比较・大区域** | **斯拉夫・欧亚地区** | **比较・大区域** |
| 松里公孝<br>俄罗斯/政治 | 铃木一人<br>西欧/全球化 | 望月恒子<br>俄罗斯/文学 | 中村研一<br>国际政治理论 |
| 宇山智彦<br>中亚/历史 | 村田胜幸<br>美国/移民 | 谷古宇尚<br>远东/边境表象 | 中岛岳志<br>亚洲/思想 |
| 山村理人<br>中亚与俄罗斯/经济与农业 | 守川知子<br>西亚/历史 | 桥本聪<br>中欧/语言文化 | 樽本英树<br>国际社会学 |
| 家田修<br>中欧/经济 | 渡边浩平<br>中国/信息 | 望月哲男<br>俄罗斯/文化 | 武田雅哉<br>中国/文学 |
| 岩下明裕<br>欧亚地区/国际关系 | 北村嘉惠<br>台湾/原住民 | 野町素己<br>斯拉夫词汇/语言 | 桥本努<br>帝国论 |
| 山崎幸治<br>北方/原住民 | | 荒井信雄<br>远东/边境居民 | |

需要强调的是，该项目非常重视文学研究，称得上是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一大特色。关于文学研究对于区域研究的价值，可以通过望月哲男教授从事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体现出来。望月哲男认为，应该针对不同的研究领域，分别采取相应的研究方法。在近代俄罗斯文学与文化思想研究领域，主要以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及评论为研究对象，对近代俄罗斯文艺的模式特征、思想意义、社会文化的作用与功能等进行比较研究与综合研究。通过文学研究探寻近代俄罗斯社会与文化的特征及其在文化思想史上的意义，并重新诠释它的可能性。对于当代俄罗斯文艺的研究，则通过体制变迁后的俄罗斯文艺的研究，考察当代俄罗斯的文化状况、思想发展、文化与社会体制的相关性、作为表现历史意识与文化认同的文学的功能、文艺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20 世纪俄罗斯经验的世界史意义等。[①]在综合研究现代俄罗斯文艺的时空意识后，望月认为，俄罗斯社会在 20 世纪末的体制变迁过程中，彻底体会到认同危机，至今仍处于世界观的过渡期与摸索期。因此，望月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在现代俄罗斯人的意识当中，关于历史与未来的时间展望以及国家、社会与文化等空间展望，具有何种特征与过程，对同样经历了世界观变

① ［日］望月哲男：「2001 年度点検評価報告書」。http://src-h.slav.hokudai.ac.jp/center/tenken/2001/index.html

化的现代世界有着怎样的启示。望月哲男尝试着通过文学、思想、舞台与电影艺术、造型艺术等时空形象的综合研究[①]，对上述课题做出阐释。

### （四）注重地区小国的研究

日本斯拉夫学界非常注重俄罗斯以外的前苏联国家的研究，并且取得较好的研究业绩。松里公孝提醒笔者在研究时注意：与日本关注区域小国的研究倾向相比，中国与韩国的研究可以说是俄罗斯中心主义。其实，不仅是日本学者，俄罗斯本国的学者多数也是同时进行俄罗斯以外国家的研究。英语国家的学者同样如此，比如，他们会同时研究俄罗斯与乌克兰、俄罗斯与吉尔吉斯斯坦等课题。松里告诫说，在今天的整个学界，仅凭俄罗斯的知识很难有大的发展和作为，非俄罗斯研究如果不纳入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这个框架之内，是无法把握日本斯拉夫学界研究的动向的。

笔者在研究整理日本斯拉夫学界代表性的学术刊物，像《斯拉夫研究》、《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比较经济研究》、《俄罗斯史研究》、《俄罗斯研究》等刊载的文章过程中发现，除了《俄罗斯史研究》与《俄罗斯研究》（该刊已于 2004 年后停刊，似乎也是受到日本斯拉夫学界“小国志向”的影响）是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学术刊物之外，其余三份杂志都是以前苏东地区的国家为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俄罗斯本国问题的研究。笔者对《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1992-2008 年）刊载的总计 247 篇文章分类汇总后发现，该杂志刊载的关于东欧与中亚地区的文章有 62 篇，占到全部论文比例的 25%；《斯拉夫研究》（1992-2010 年）总共刊载的 199 篇文章中，关于东欧与中亚地区的论文为 23 篇，占全部论文比例的 12%；而《比较经济研究》（1992-2010）所刊载的全部 281 篇论文中，直接论述俄罗斯问题的文章只有 102 篇，而论述前（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不含前苏联）的论文竟有 92 篇之多，大有凌驾于俄罗斯研究之势。日本斯拉夫学界之所以有注重前苏东区域研究的“小国志向”，从比较经济体制学会 1993 年将会名由“社会主义经济学会”变更为现名时所强调的宗旨应该有所体会：第一，比较经

---

① 请参考阎德学、邓青：“帝国理论视野的俄罗斯空间意象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 年第 2 期。

济体制学会通过强调“比较”二字，既是继承以往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传统，又在谋求获得突破和发展；第二，以“经济体制研究”为研究目的，可以刺激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经济体制”研究的多样化；第三，期待着学会的活动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内涵更加充实与深化。①

**（五）设定具体微观的研究课题**

日本人普遍认为，是稻作文化造就了日本人的“纤细”性格。水稻栽培的劳作，从灌溉到插秧、收割、脱粒等整个过程，都需要精细地作业和实时的观察，稍有疏忽，一年的辛苦劳作就将付诸东流。为了不错过最佳的农耕时节，必须仔细体察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并通过自然景物的变化来掌握季节变化的规律。于是，在漫长的稻作生活中，日本人对季节与自然景观的变化就有了敏锐的感受，同时也造就了日本人独特的细腻性格。其实，同为稻作文化的中国江南地区，民众的性格也同样较为细腻。日本人的细腻性格以各种具体的形式体现在日本的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中，造就了独具特质的日本文化。我们在此无法详细探讨日本人的细腻性格对于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力学作用，但日本产品的精细设计却是最好的实例证明。

关于学术问题设定的具体而微观的特性，松里公孝指出，总体来说，日本学者不大相信“民主化”、“市民社会”之类的抽象概念的有效性，这一点与欧美和中国的俄罗斯研究不尽相同。日本学者追求的是在具体的知识与中等视距的理论阐述方面相互竞争发展，而不是去创建一个宏大的理论。

我们不能由此说明日本学者在研究斯拉夫问题时，忽视从宏观的视角来考察地区问题，相反，斯拉夫中心近年来获得的“斯拉夫・欧亚学的构建”、“欧亚区域大国的比较研究”、“边境研究的基地建设”等三个日本文部科学省的重大项目，无一不是从宽广的视角来研究地区问题。不过，他们在每个大项目之下又设立若干个具体而微观的子项目。如果对《斯拉夫研究》、《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比较经济研究》、《俄罗斯史研究》、《俄罗斯研究》等杂志刊载的论文进行全面观察，更能切实体会到日本学者从事

① ［日］長砂實：『「社会主義経済学会会報」から「比較経済体制学会会報」へ「会報」名称変更によせて』、『比較経済体制学会会報』、1993 年 31 期。

学术研究的细腻精神。譬如，他们对俄罗斯地方政治转轨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藤本和贵夫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政治动向——以再转轨时期的沿海地方为中心”（《俄罗斯研究》第24期，1997年）、堀内贤志的“俄罗斯联邦制秩序的现状——从远东的视角”（《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第28期，1999 年）、松里公孝的“鞑靼斯坦共和国政治体制的特质及其形成过程1990-1998”（《斯拉夫研究》第47期，2000年）、兵头慎治的“当代俄罗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划分权限条约为中心”（《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第28期，1999年）、桥本あかね的“叶利钦时代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以调停纠纷为视角”（《俄罗斯研究》第32期，2001年）、袴田茂树的“普京政治改革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变迁——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鞑靼斯坦共和国、库尔斯克州为中心”（《俄罗斯研究》第32期，2001年）、中马瑞贵的“俄罗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政治过程——以划分权限条约的综述分析为例”（《斯拉夫研究》第56期，2009年）等，仅从论文的题目来看，基本可以观察到日本斯拉夫学者对俄罗斯政治转轨问题研究的细致程度。

不过，细致的微观研究带来的反面作用就是区域研究的细分化和碎片化倾向。其实，早在冷战时期，随着斯拉夫区域研究的深入，曾经出现过各个专业领域的细分化倾向。对于这种倾向，当时苏联·东欧学会的发起人气贺健三教授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出现细分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可是，由此带来的障碍是很难从多个角度来全面认识社会、文化等各种现象。[①]冷战结束后，松里公孝特别强调，创建“斯拉夫·欧亚学”的一个实践动机在于，想要阻止前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的细分化倾向。[②]两位代表人物的批评也说明，日本斯拉夫学界已经出现了区域研究的细分化或者是碎片化的倾向，同时，他们对于微观研究的负面影响也保持着学术上的警惕。

### （六）注重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

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注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

---

① ［日］気賀健三：「ソ連·東欧学会の発足にあたり」、『ソ連·東欧学会年報』、1972年第1期。

② ［日］松里公孝：「中域圏の概念について」、『「地域研究と中域圏」フォーラム』。http://src-h.slav.hokudai.ac.jp/coe21/forum/forum01.html

领域，但日本的斯拉夫学界却将其大量应用在区域研究领域。冷战期间，由于受到国际关系和研究经费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几乎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实地调查研究。苏联刚一解体，各种政治限制就松动了，实地调查和去海外收集资料的机会大大增加，日本学者不仅是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去其他地方访问和调查的机会也迅速增加。现如今，充足的经费保障和便捷的交通条件以及网络技术的普及，走出国门前往研究对象国进行实地调查极为普遍，并且成为研究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松里公孝之所以被誉为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的第一人，除了他的论文质量、语言能力以及在国外同行的评价较高之外，当初他走访前苏联档案馆的数量也被认为是在西方学者中最高的。为了研究后共产主义各国的地方政治、投票地理学、地方政党政治等问题，他对俄罗斯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如鞑靼斯坦共和国、车臣共和国等）以及立陶宛、白俄罗斯等地方政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还多次深入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走访当地民众、学者和政府官员，研究后苏联空间内的“不被承认的国家”。因此，正是由于日本斯拉夫学者秉持着日本学界一贯的扎实作风，极为重视第一手资料的占有，注重实证研究的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从而确保了研究课题的深度和质量，也迅速提升了日本斯拉夫学界在国际上的地位。

松里公孝还对中国学界提出了建议，他说：中国富裕了，为了推进区域研究的发展，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让区域研究的学者出国进行实地考察。不过在中国，研究预算似乎有平均分配的倾向，这就剥夺了优秀学者的实地考察和在海外学会发表的机会。因此，中国的研究预算能否根据学者的能力与业绩进行评价，采取倾斜分配的政策，而不是“平均”分配。一位优秀的学者一年进行两次实地调查要比大家平均三年一次的实地调查效果要好得多。在日本，实地调查繁荣的背面就是克里姆林宫的学问薄弱，很少有学者关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这也是日本与中国在俄罗斯研究方面的最大不同。

### （七）注重国际化、多语种的全方位研究

日本斯拉夫学界与国外相关领域的学者广泛合作，推进共同研究，目标是增强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在国际上的发言权。譬如，斯拉夫研究中心与哈

佛大学的戴维斯研究中心、牛津大学的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等海外研究机构缔结了学术交流协议。该中心还为北海道大学与萨哈林国立大学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诸民族历史·考古·民族学研究所缔结学术交流协议起到了发起人作用。为了与中国、韩国等相关学会合作建立东亚学者共同体，该中心 2009 年组织召开了第一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国际研讨会。特别是该中心每年夏季和冬季举办的国际专题研讨会极具学术影响力。每年夏季和冬季的国际专题研讨会自 1979 年开始举办，学术影响力逐渐由日本扩展到世界；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斯拉夫问题最高水平的专家和学者经常应邀与会，体现了会议的国际性和内容的高水准；会后也会整理高水平的论文结集出版，并且 1994 年以后的论文集几乎全部用英文出版，充分体现出学术成果的国际性。

在语言方面，日本斯拉夫研究的学者都有着较高的语言素养。斯拉夫研究中心要求所有研究人员，不仅能够使用英语和俄语进行流利的写作和交谈，同时还要懂乌克兰语、鞑靼语、立陶宛语等语言，至少能读懂文章。该中心的学者精通英文与俄文，不少青年学者甚至通晓 3-4 门外语，确保了国际同行间的无障碍交流。同时，为了提高英语表达和写作水平，中心每年都会组织为期两周的讲习班，聘请外国资深教授讲解英文发表技巧。为了使学术成果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斯拉夫研究中心就开始重视国际化，国际学术交流日渐频繁，在海外发表的文章数量日渐增加。即便如此，日本斯拉夫学界仍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认为即使与韩国学者相比，日本学者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仍有差距，并且努力想改善这种局面。这也是该中心致力于推动青年学者国际培训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①]

对于中国俄苏学界，松里公孝提出非常尖锐的建议，他说，中国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应有的语言能力非常低下，在国际性研究会议上配备翻译，说到底是为了帮助不懂英语和俄语的年长学者，可是，一些英语和俄语水平很好的中国学者因为有同传人员，他们也用汉语发表观点。好像中国存在一种观念，认为只有大人物说话时才应该配备翻译，其实，这对与会的外国学者

---

① 参见杨成：“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重构与智识革命——基于学术史回顾和比较研究的展望”，《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1 期。

来说，是非常不礼貌的态度。如果是研究欧亚区域的学者，最低水平也要能说会写英语和俄语，最好再会几门其他国家的语言。

### （八）研究资料的长期积累

日本斯拉夫学界非常注重资料的积累工作，为学术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譬如，斯拉夫研究中心的藏书，不仅推进了该中心学者的学术研究，还为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者系统地收集了资料与数据，也为日本各地和世界范围内的专家提供了方便，获得了高度的好评。该中心拥有丰富的藏书，截至 2013 年 3 月，约有 12.3 万册图书，其中约 11.6 万册为外文图书；4.6 万份缩微文献（几乎都是外文），1365 种报纸和期刊出版物（外文 1261 种），其中含有大量有关俄国革命、日俄战争、共产国际问题的珍贵史料，以及以乌克兰语言学为中心的可以填补斯拉夫文献学的资料等。截至目前，中心还收藏有 4909 份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学生的有关斯拉夫问题的学位论文。中心附属图书馆北方资料室，系统收集整理了包含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料在内的日俄-日苏关系的贵重古老文件、古老地图等很多数据和资料。图书室还存有 4504 张原苏联的 20 万分之一的地图，这是 1956 年至 1991 年原苏联全境的陆地部分的地图。在苏联解体之前，一直限定用于军事目的以及政府使用，现在已为众多进行俄罗斯实地调查、经济学、生物学、冰雪学、考古学等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广泛使用。该中心还保存着前苏联制作的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内蒙古的地图 430 张，19 世纪初制成的部分俄罗斯的古老地图，最近也通过网络对外公开。[①]该中心收集的关于斯拉夫・欧亚地区的数据和资料，无论品质还是数量都是日本第一。与之相比，中国国内尚无任何一家区域研究机构拥有如此庞大的研究资源。

日本俄苏学界的研究特征与中国学界存在一些共性，但似乎日本学界的做法更为深入细致，一些个性化的特征是需要我们努力借鉴的。为了论述上的方便，姑且将其归纳为斯拉夫・欧亚研究的“日本范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归纳总结的斯拉夫・欧亚研究的“日本范式”，其着眼点是值

---

① [日]スラブ・ユーラシア研究センター図書室：所蔵資料概要。http://www.lib.Hokudai.ac.jp/slv/collection-outline/

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优点和长处，并非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没有不足，只是出于论述需要，本文并未将其不足专门列为一个问题进行阐述而已。

## 三、日本斯拉夫·欧亚研究的理论创新

现代意义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缘起于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对情报的需求，特别是美国参战之后的战略情报需求。同样，日本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也缘起于战争的需要。譬如，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设立了“东亚研究所”（1938 年）和“总体战研究所”（1940 年），进行敌国的情况调研。二战结束后，“东亚研究所”解散，像后来成为俄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鸟山成人等则进入大学教书；总体战研究所（1940 年）在二战结束解散后，该所军人进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研究室工作，江口朴郎、岩间徹、矢田俊隆等民间人士则进入大学教书，在后来的苏联与东欧史研究领域起到领军作用。

### （一）日本斯拉夫·欧亚研究机构的曲折发展

二战结束后，美国、原苏联等国家都认识到，为满足军队、政府、外交乃至商界对于海外知识的需求，需要建立和推进国别与区域研究。可是，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则受到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加之日本战前几乎没有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俄苏研究机构，所以战后新起炉灶需要一个过程。语言文学专业具有中立性，受战争及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小，所以在二战后最先得以恢复，战前设有俄国语言文学课程的国立大学很快恢复了俄语教学，比如东京外国语大学外语系俄罗斯东欧课程、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文学部俄国文学专业、东京大学斯拉夫语斯拉夫文学专业等。但也有像上智大学等在二战后才设立俄语专业的大学。直到 1956 年《日苏共同宣言》生效，日苏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之后，日本的斯拉夫研究机构才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冷战时期日本斯拉夫研究机构发展历程较为艰难，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为例，1947 年，北海道大学在国立大学中最早开设俄罗斯文学科，并接受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援助，成为从事俄苏人文社科研究的机构，北海

道大学也成为战后日本国立大学中最先开设斯拉夫研究机构[①]的高等学府。对于为何要在大学设立斯拉夫研究机构，机构创建元老、法学部教授尾形典男回忆道：美国占领日本后不久，就邀请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等学者赴美参观。在回国的船上，大家谈到日本将来也要设立区域研究机构，把美国研究放在东京大学，中国研究放在京都大学，俄国研究放在北海道大学。当时像是痴人说梦，但却成为斯拉夫研究机构建立的一种缘起。[②]

斯拉夫研究机构成立之初并无明确的学术定位，研究人员数量很少，附属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该机构之所以能够诞生，一是因为当时北海道大学文学部教授木村彰一（斯拉夫研究室主任、斯拉夫研究所首任主任）和同为文学部副教授的鸟山成人（斯拉夫研究所第二任主任）想在该校设置机构，从语言、文学及历史视角研究斯拉夫问题；二是时任北海道大学校长的杉野木晴贞和法学部教授尾行典男也想设立斯拉夫研究机构，把当时在美国快速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综合起来；三是得益于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该财团当时非常乐意向日本国立大学中唯一设立俄罗斯文学专业的北海道大学提供资助，建立苏联与东欧研究机构。在这三股力量的合力作用下，1953 年成立斯拉夫研究室（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前身），1978 年斯拉夫研究中心独立，成为北海道大学共同教育研究机构。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高了日本民众和学生对斯拉夫国家的关注度，同时也暴露出日本斯拉夫研究的封闭、资料滞后、交流缺乏以及研究专业与对象区域不平衡等问题，突显出建立全国规模的斯拉夫研究中心的紧迫性。1990 年 6 月，斯拉夫研究中心终于在苏联解体前一年，发展为“全国共同利用设施”，成为日本斯拉夫・欧亚研究的中坚力量。

---

① 所谓斯拉夫研究机构，包括教学实体单位——斯拉夫研究室和进行学术研究的斯拉夫研究所，前者有固定人员编制，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吸收大学内外的兼职研究人员而构成，其实是一个实体两块牌子。

② ［日］外川継男：「スラ研の思い出（第 2 回）」、1999 年第 76 号。

（二）日本“斯拉夫·欧亚学”的建构[①]

对于什么是区域研究，处在不同的立场会做出不同的定义。日本区域研究共同体（JCAS）前秘书长、京都大学地区研究综合信息中心山本博之从三个特征来理解区域研究[②]：

第一，区域研究是针对现实世界的诸多课题进行的学术探究，最大特征是承认现实世界存在各种制约条件，并通过克服制约条件去进行研究，来解决现实课题。至于有哪些制约条件，比如，在数据收集方面，无法得到完整的数据；经常必须直面研究对象处于紧急状态的时间节点，无法等到所有素材具足之后再着手研究。这些制约条件导致区域研究与现有学术之间存在差异，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反映出研究者本人的价值观，至于科学与否暂且不论，但区域研究关照的是现实问题的解决，反映出区域研究者学以致用的精神。

第二，区域研究可以从内部对现有的学科进行改造或改良。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各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对于区域研究的认知也不尽相同。譬如，在“我”看来，有其他学术背景的学者，他们的问题在于：1.不关心人类社会问题；2.只知道自己的“一亩三分地”；3.一味地机械套用理论；4.说不出他们从事的是学术研究还是社会活动。反之，他们认为“我”的问题是：1.只关心过去；2.对世界性问题的阐释没有助益；3.只在陈述事实而没有理论；4.只是就学问论学问。结果是，无论双方如何互相批评，都不会产生建设性的讨论，更不要指望把所有的学术训练合而为一来解决问题。因此，区域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能让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认识到各自的专长和局限，然后再考虑以何种方式互相配合更为合理。

第三，区域研究是通过对被分割的研究对象——“区域”进行的综合研究，不应只停留在阐述对象区域的固有特性上，而应在此基础上认知与其他区域的相关性，故可称之为“从区域出发走向世界的研究”。现有的学科多是以历史上特定时代特定地区的事例为基础进行的阐释，不能充分应对当前世界的诸多问题。区域研究并不拒绝现有学科，而是通过处理世界各地的事

① 具体内容参见阎德学：“日本‘斯拉夫·欧亚学’的构建与意义”，《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1 期。

②［日］山本博之：「地域とは」。http://www.cias.kyoto-u.ac.jp/~yama/areastudies/astudies.html

例来提升现有学科的普适性。比如，当说到“欧洲的逻辑不适用于亚洲”时，不是要得出“所以不需要欧洲的逻辑”，而是“经过修正，成为适用欧亚的逻辑”。

斯拉夫研究中心作为日本区域研究共同体（JCAS）的最初加盟会员，山本博之一定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样本，来对日本区域研究的特征进行提炼，因为斯拉夫研究中心经过冷战后十余年的努力，创建了“斯拉夫·欧亚学”这一学科体系，以此来阐释前苏东地区的巨大变迁，在国际斯拉夫学界也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所谓斯拉夫·欧亚学，是指继承前苏联·东欧区域研究的学问。研究对象是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圈，包括原苏联 15 国和东欧 13 国。在设定研究对象之后，日本学者把向心力、离心力、统合、认知、跨境、观察等研究路径作为突破口，来分析多重复合的斯拉夫·欧亚地区，最终形成了综合的“帝国理论”。[①]

日本创建“斯拉夫·欧亚学”的直接动机是希望阻止前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的细分化倾向，[②]适应学界进入 21 世纪从整体上研究前苏东地区的发展趋势。日、法等国从苏联时代至今都保持着通过历史、文学等学科来研究斯拉夫问题的基础；同时，区域一体化和区域重组在斯拉夫·欧亚区域内外不断发展，也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来应对现实课题的动态发展。[③]对日本来说，与斯拉夫·欧亚地区关联最深的是日本的北方诸岛、以及明治维新以后在军事和政治上参与最深的从俄远东到西伯利亚这一区域。[④]冷战结束后，随着俄远东和西伯利亚与东亚联系的加深，日本面临的课题是：如何作为东亚一员，超越日俄关系，与西伯利亚和远东相处？自 1997 年桥本龙太郎首相提出“对丝绸之路地区的外交”之后，中亚地区引起日本的重视，

---

① [日]家田修：『講座スラブ·ユーラシア学 1 開かれた地域研究～中域圏と地球化』、講談社、2008 年、第 11 頁、第 16 頁。

② [日]松里公孝：「中域圏の概念について」、「地域研究と中域圏」フォーラム。http://src-h.slav.hokudai.ac.jp/coe21/forum/forum01.html

③ [日]家田修：『講座スラブ·ユーラシア学 1 開かれた地域研究～：中域圏と地球化』、第 29-30 頁。

④ [日]原暉之：『シベリア出兵：革命と干渉、1917-1922』、筑摩書房、1989 年、前言。

九一一事件后，中亚成为日本外交“和平与稳定的走廊”。东欧对于日本外交来说，只是对俄、对欧政策的一部分，日本的东欧政策是以欧盟东扩为背景制定的。其实，创建日本的“斯拉夫・欧亚学”还包含着日本学界谋求在世界斯拉夫研究领域拥有相当分量发言权的远大抱负。

在日本学者看来，“语言、宗教、形质上的同质性”的民族国家，是一个虚构的产物，是让人们深信起源于 16 世纪的民族国家是自然的存在，而非近代的建构；是西方人要让人们忘却近代以前欧洲存在帝国的事实，以此确定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近代历史叙事中的统治地位，并且让人们相信，与民族国家的理念相比，帝国只是一种例外的存在。其实，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普遍的国家形态，帝国才是天然的存在，帝国确信自身的建构并推行着自己的政策。[①]实际上，如果冷静观察 19 世纪至 1991 年的历史就会发现，欧美国家是通过输出民族国家这一理念来瓦解竞争对手——近代亚洲和欧亚大陆各个帝国的，同时也在更新和强化着自身的帝国治理，掌握和维护世界的霸权地位。

日本学者看到，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被从欧洲移植的民族国家理念所牵绊，流了很多血，而斯拉夫・欧亚世界和中国则行动稳健。原因在于原苏联和中国采取了社会主义联邦制的形态，把民族国家的诸多要素吸收到帝国秩序之中。不过，苏联由于运用不当而导致解体，从中产生出所谓的民族国家，为了能够作为国家继续生存下去，他们争先恐后地加入其他大帝国，寻求欧盟和美国的庇护。所以说，民族国家的理论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浸入欧亚大陆，反映出 20 世纪统治欧亚大陆的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微妙态势，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欧亚大陆不适用民族国家的理论，也没有必要进行代价高昂的实验。[②]因此，日本斯拉夫学界致力于把世界帝国性质的事实讲清楚，进行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梳理，促使世界各国更加公平的竞争。[③]

斯拉夫・欧亚研究的“日本范式”，为学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国别与地区研究的分析路径，也就是跨地区、跨学科和比较研究的路径。日本学者创建

① [日]松里公孝：『講座スラブ・ユーラシア学 3 ユーラシア——帝国の大陸』、講談社、2008 年、第 16 頁。
② 同上、第 17 頁。
③ 笔者将专文阐述日本斯拉夫・欧亚研究的帝国理论，故在此不做具体分析。

斯拉夫·欧亚学的最初目标是将普遍性、全球化以及毗邻地区的诸多因素一并纳入研究范畴后再加以综合分析，并同时关注斯拉夫·欧亚区域内发生的事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正如帝国没有固定的边境一样，研究也是没有固定界线的”[①]，在当今跨界的时代，要求学者必须进行“跨界的研究”，因为学者本来就是跨界者。

**【Abstract】** Japanese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stemmed from the needs of war. Through the ups and down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has ultimately formed a significant force in Japanese regional studies, symboliz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lavic Research Center at Hokkaido University as a “national common facility”. Based on creating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as the discipline base and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Empire theory”, this center has emerged as pivotal team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Slavic research communities. In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Japanese scholars make all efforts to construct and improve their discipline system through important projects. They prefer to combining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policy studies, focusing on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emphasizing studies on small regional countries. Their topics are concrete and micro. Through fieldwork and international, multi-lingual comprehensive studies, they focus on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data and materials. As a result, the author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as Japanese paradigm in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hoping to draw beneficial references for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in China or even the whole world.

**【Key Words】**Slavic Eurasian Studies, Japanese Paradigm, Empire Theor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Аннотация】** Славянские и еврази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Японии возникли из-за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войны, после поворотов в ходе истории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был создан «объек

① [日]松里公孝：『講座スラブ・ユーラシア学3 ユーラシア——帝国の大陸』、第31頁。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ользования» — Центр славян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Хоккайдо,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сь важная база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Японии, а также создание «славянских и еврази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качестве учебного фонда,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 «теории империи» как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ы привело к образованию ключев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группы в сфере славян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сфере развития дисциплины, японские учёные занимались важным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ми проектами, создавали 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ли систему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осредотачивали внимание на связи между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м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делали упор на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уделяли долж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малых стран региона, тем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определялись чётко и конкретно, благодаря полевы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и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появлялись многоязычные всесторон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учёные сосредотачивались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ом накоплении научных данных,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автор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и назвал приведённые выш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японской моделью» славянских и еврази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надеется, что это предоставит полезные советы и уроки для учёных в сфере славянских и еврази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Китае и в мире в цело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Славянские и еврази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японская модель, теория империи, создание дисциплины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斯蒂芬·赫德兰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路径依赖

韩冬涛　孔令兰萱*

【内容提要】斯蒂芬·赫德兰是当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罗斯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使用历史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俄罗斯转型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以路径依赖为分析框架，形成了一套系统、独特的观点。赫德兰认为，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将俄罗斯的历史、文化特点排除在外，忽视了社会规范对于市场经济规则的关键性支持作用，导致俄罗斯转型的失败和逆转。他强调，后苏联时代俄罗斯转型的失败并不是个案，而是与俄罗斯历史上的制度矩阵特点和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将俄罗斯转型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普京治下的“威权主义”实际上是“莫斯科公国”制度的回归。赫德兰主张，俄罗斯未来的转型必须重视制度的转变，彻底打破历史上权力-财产权关系模糊的制度特点，构建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主要特点的制度体系，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俄罗斯转型　路径依赖　制度矩阵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 03-0064 (30)

赫德兰教授是瑞典著名的经济学家、苏联和俄罗斯研究专家。他在瑞典著名学府隆德大学接受了系统性的经济学专业训练，于 1983 年在隆德大学

* 韩冬涛，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0 级博士生；孔令兰萱，上海海关学院科研处，助理研究员。

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对苏联经济体制及其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高级研究员在瑞典苏联和东欧事务局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赫德兰回到隆德大学经济系从事研究工作。1984 年赴乌普萨拉大学从事苏联与东欧研究和教学工作，1985 年至 1990 年同时在隆德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进行有关苏联、东欧的研究与教学，1990 年至今，一直在乌普萨拉大学从事俄罗斯、欧亚研究工作，现任乌普萨拉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主任。赫德兰教授曾赴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进行访学和交流，也是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常客。在吸收先进研究方法和经验的同时，也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往关系。

赫德兰教授在其研究中表现出深厚的理论功底，通过对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认知心理学等相关理论的娴熟运用，结合比灵顿、派普斯、爱德华 •凯南等对俄罗斯制度、历史、文化特点的分析，构建了一个逻辑严密的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发掘俄罗斯转型失败的深层次历史、文化原因，为人们了解俄罗斯政治制度和文化发展的特点及其在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俄罗斯朝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转型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方案。

赫德兰认为，体制转型实际上是制度转变和观念转变的综合过程，只有行为体尊重并执行新的博弈规则，转向生产性的逐利行为模式，才有可能为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技术性改革方案提供“土壤”，真正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赫德兰在新制度主义框架下，为俄罗斯转型提供了一条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以产权制度和国家责任为改革为核心的转型路径选择，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

## 一、休克疗法的评估与对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批判

当叶利钦选择以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模式为转型目标时，俄罗斯改革派精英和西方国家都对此目标在短期内实现充满了乐观情绪，俄罗斯民众也极度渴望能够尽快改变自身窘迫的生活状况。然而，以自由化、私有化、稳定化为手段的休克疗法不仅没能实现经济增长，改善生活水平，反

而导致经济持续衰退，社会动荡不安，国家濒于崩溃的境地。1990 年代后期，俄罗斯民众普遍开始怀疑、排斥西方化改革，要求国家进行强力干预，抑制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的趋势，促进社会平等与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普京治下“威权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为什么在拉美和东欧“捷报频传”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在俄罗斯遭遇了“滑铁卢”？赫德兰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改革派精英和西方国家并没有认识到转型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凭着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发动了一场轻率的改革；忽视了俄罗斯独特的历史、文化在转型中的作用；令自由化、稳定化，特别是私有化政策变成了寡头们掠夺的工具，最终造成了改革的失败和逆转。

**（一）叶利钦选择的休克疗法变成一场“掠夺盛宴”**

对于休克疗法对俄罗斯经济、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害，赫德兰认为瓦西丘克的总结最为精辟。1996 年，叶利钦再次当选总统后，《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的经济评论员叶甫根尼·瓦西丘克（Евгений Васильчук）撰文指出：“俄罗斯快速进入智力和工业的完全退化，财政紊乱，犯罪精英形成，地区分离出联邦之势明显。”[①]通过对GDP、投资率、基尼系数、“人口指数（headcount index）”、“贫富差距（poverty gap）”等主要经济指标的评估，赫德兰指出，1992 年至 1998 年的改革导致了俄罗斯经济漫长的恶性衰退——经济总量螺旋式下降，生产投资严重不足，贫困化大幅度加重，社会保障体系几近崩溃。在他看来，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完全失败，主要在于以下四个原因：

1、盖达尔团队执行了一个轻率的改革计划

实际上，早在 1990 年 7 月美国休斯敦举行的G7 峰会上，7 国首脑就决定由WB、IMF和OECD组成工作组对苏联经济进行详细研究，提出改革建议，并以此作为西方提供援助以有效支持改革的标准。赫德兰认为，G7 工作组的建议是专业、全面并具有可行性的，“G7 工作组自始至终都在强调需要综合性的改革，即与狭隘的专注于休克疗法正好相反。”[②] 工作组认为：“短期内实现稳定，需要在财政、货币和外部领域开始结构性改革，并且还需要

① Stefan Hedlund, *Russia’s “Market” Economy: A Bad Case of Predatory Capitalism*,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3, p.345.
② Ibid, p.115.

在所有制安排、企业管理、价格、劳动力市场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① G7工作组的建议，主要包括稳定化政策、打击自然垄断、私有化、应对货币过剩等方面。特别是私有化，工作组的建议强调，作为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必要前提条件，私有化是非常重要的。“为了鼓励个人的主动性，必须从一开始就保证私有财产权受到保护”。②“要想在快速行动的愿望与大规模执行政策的不可能性之间取得平衡，必须使用灵活的方法……需要以国民收入填补经济改革带来的成本——包括重组可运行企业的成本，清算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成本，已经积压的、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费用——因而国有资产只有出售而不能赠予。”③

在赫德兰看来，IMF、WB和OECD工作组的建议是系统性的，而且工作组强调，在进行上述改革的同时，需要大量相关制度创设的配合，所以需要大量时间进行审慎思考和谨慎执行。然而，1991 年秋，叶利钦并没有接受工作组的建议，“集中在叶利钦身边的那些‘年轻的改革经济学家’执行了一个粗陋的改革计划， 而这个计划并不是从IMF和WB的建议中得出的”。④赫德兰认为，这是因为叶利钦需要一个以俄罗斯优先的改革方案，从而增加自己作为俄罗斯领导者的合法性。叶利钦选择了以“俄罗斯优先”为理念的盖达尔团队，因为盖达尔令叶利钦相信改革很容易就能完成，“新的体系可以被简单地安装，就像是在硬件上安装软件那么简单。”⑤改革者将复杂的社会重建过程过分简单化了。他们认为，以快速自由化和彻底私有化作为工具，就能够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但实践说明，这些行为反而为大量的寻租和掠夺铺平了道路。

2、叶利钦专注于个人权力

赫德兰认为，叶利钦承诺将俄罗斯转变为西方式的“正常社会”的任务，实际上是“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分权、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这应当在民主、分权的政治制度下，通过建设和遵从法律规范来促进市场经济

---

① *The Economy of the USSR*, The World Bank Report , Washington, DC, 1990, p.1.
② Ibid, p.17.
③ Ibid, pp.26-27.
④ Stefan Hedlund, 2003, p.120.
⑤ Stefan Hedlund, *Russian Path Dependence*, Routledge, 2005, p.272.

的良性发展。但是，叶利钦从一开始关心的就是个人权力。赫德兰认为，证明这一观点的证据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叶利钦选择盖达尔团队只用了 18 天时间。当时，他深刻地体会到明显的离心力，确认保留联盟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他希望成为俄罗斯真正的领袖，获得切实的个人权力。叶利钦命令盖达尔在六个月内完成（盖达尔自己也接受了）。[1] 他并不清楚经济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他需要的只是快速的成功从而加强自己作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叶利钦之所以选择盖达尔团队，是因为看到了盖达尔团队可能带来的利益。盖达尔团队由专业的经济学家组成，他们倡导的是西方的经济理念，能够用流利的英语与西方人交流，这有助于叶利钦争取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援助。

其次，叶利钦并没有毫无保留地支持盖达尔团队的改革，反而采用分而治之办法来制约改革者，他留用了几名原苏联的官僚，包括尤里·斯科科夫（Юрий Скоков）、奥列格·洛博夫（Олег Лобов）和米哈伊尔·马列伊（Михаил Малей）。此外，赫德兰认为，叶利钦让盖达尔团队独自为经济改革奋斗。在他们与最高苏维埃的斗争中，叶利钦置身事外，直到最高苏维埃威胁到自己的权力，才介入其中。叶利钦优先选择个人权力议程，将改革者置于了一个孤立、冲突的位置。

第三，赫德兰认为，叶利钦有对“懦夫博弈”[2]行为方式的偏好，也说明了他专注于个人权力。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中，政治进程是通过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来推动的，既保持了竞争性，也实现了政治发展。但赫德兰认为，在叶利钦的政治哲学中，没有看到妥协的概念，他明显偏爱对抗性政治形态。从与戈尔巴乔夫的角逐到与最高苏维埃（哈斯布拉托夫）的“兵戎相见”，叶利钦采用了“懦夫博弈（chicken game）”的策略。

通过上述分析，赫德兰认为叶利钦将个人权力置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当他选择权力议程优先的时候，就没有给经济改革留下多少空间。他强

---

① Stefan Hedlund, 2003, p.149.

② 懦夫博弈，博弈论中的一种经典案例，行为者在博弈中互不相让，博弈结果是必有一方损失。

调，这都是叶利钦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迫作出的决定。叶利钦的个人权力议程侵蚀了经济改革，从而付出了极大的政治、经济代价。

3、寡头是赤裸裸的掠夺者

赫德兰指出，轻率的改革计划和叶利钦将个人权力议程置于经济改革议程之上，为寡头的掠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他看来，“聚集在叶利钦身边的人开始积聚起巨额财富，这些人被称为‘寡头（oligarchs）’”，[①]包括政治和经济精英。他们依靠与权力的直接或者间接联系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从行为偏好上来说，寡头倾向于重新分配而不是增值性生产。赫德兰强调，虽然寡头对俄罗斯政治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依赖的是总统的权力，他们从没有属于自己的权力基础。因为“俄罗斯总统实际上充当了官僚机构与那些密切联系政治的经济势力之间的仲裁者，这才是叶利钦权力的真正来源，但这种权力需要以源源不断地分配利益为代价。”[②]

关于寡头掠夺的手段，赫德兰指出，寡头通过不正当的私有化交易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因为大规模私有化的“赠与”性质，导致“内部人在事前就已经得到保证，他们将会继续控制‘他们的’企业。”[③]随着政府预算赤字的迅速增长，政府开始了“货币私有化（money privatization）”，为预算提供资金。但货币私有化却成为叶利钦换取政治支持的奖励形式，即 1995 年的“贷款换股份”。赫德兰指出，“贷款换股权”预期总收入为 8.7 万亿卢布，实际所得为 7.6 万亿卢布，看起来是成功的。但被拍卖资产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中标者也是预先决定的。“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偿还贷款，所以 ， 抵押的股份实际上从交易的那一刻起就被提供贷款的银行没收了。”[④]赫德兰强调，叶利钦成功地利用“共产主义幽灵”为权力与财富的交换提供了借口——银行家提供政治支持，确保他的个人权力。作为回报，叶利钦向“忠诚于他的”寡头授予财富。这表现出财富的获得依赖于权力，两者间的界线是模糊的，本质上与俄国时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等级性的、非互惠性的权力关系相同。

① Stefan Hedlund, 2003, p.278.
② Ibid.
③ Stefan Hedlund, 2005, p.255.
④ Ibid, p.256.

4、西方不负责任地干预俄罗斯转型

苏联解体后，西方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而这种情绪是建立在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完胜”苏联的基础上的。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认为，俄罗斯社会已经摆脱了所有共产主义的束缚，能够像西方社会一样运行，因此俄罗斯愿意并且能够进行快速的转型。

赫德兰强调，西方将这种观念灌输给俄罗斯的改革者，因此，盖达尔团队认为所有的制度都是相同的，可以直接使用“舶来品”。赫德兰认为，这种理念对俄罗斯的转型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为忽视了两个重要前提：首先，制度性转变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范两方面的改变，西方和俄罗斯改革者忽视了非正式规范的改变，没有为正式规则的改变提供充分的合法性；其次，市场转型需要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是掌握市场经济知识的人才，因为苏联绝大部分的人，特别是政治领导人，并不知道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很难争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所以，在赫德兰看来，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上并不是传统的第三世界国家，应当被当作一个特殊的案例，西方和俄罗斯改革者最大的问题就是没能认识到俄罗斯的特殊性。①

赫德兰认为，西方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驱动，无原则地支持俄罗斯转型，不仅没有帮助俄罗斯完成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建设，还引发了道德危机。

## （二）赫德兰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通过对休克疗法进行评估和对其失败原因的分析，赫德兰发现，转型时期的俄罗斯行为者的行为模式相较于苏联时期并没有发生改变：领导人专注于个人权力，官僚和商业精英没有转向生产性行为，而依赖统治者的权力从事重新分配活动。权力与财产权的关系没有出现本质性的变化：以建立私有财产权为目标的私有化成了统治者与商业精英之间的“权钱交易”，权力使用的随意性显而易见，国家没有肩负起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责任，导致行为者仍然偏好影响力博弈，而不是遵守规则。

① Stefan Hedlund 2003, p.112.

赫德兰认为，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是基于经济人工具理性的假设，忽视了俄罗斯原有社会规范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西方经济学家和俄罗斯改革者简单地认为，解除管制的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没有区别，只要转型为市场经济，就能提高生产效率，而人们也会自动适应和尊重市场经济下的博弈规则。因为他们相信，经济法则是超越不同国家文化和历史区别的[①]——经济人只关心结果，是有远见的。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新自由主义者一厢情愿的想法。布拉班特（Jozef van Brabant）就曾经指出，“不像法律原则（规范性法律）和客观的发现（如物理学中的），经济法则只能通过人类的活动才能存在，”[②]而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受到历史、文化、宗教、身份认同、集体记忆等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因而赫德兰指出，当人面对机会时，他们将会基于不完全的、可能是扭曲的信息作出决定，因而只有有限理性。

赫德兰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源于理性主义引入经济学后所造成的理论假设简化。牛顿发现力学定律后产生了启蒙运动，人们利用牛顿发现的定律将世界描述为一个巨大的钟，所有的行动都可以用理性去理解，都可以预测。当理性主义和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之后，促成了经济学革命，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也随之将人类社会简化。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历史和文化特点不能、也不应该进入微积分学中，[③] 因而，人的社会属性也被排除在分析框架之外，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工具理性成了一种不需要证明的假设。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假设将人类社会简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研究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完全信息条件下的边际变化。然而，这两个条件在真实的社会中很难实现，行为者经常会面临一种“以普遍不确定性为标志的非常规情况，以及同时出现多重利润的额外边际变化”[④] 。

赫德兰指出，理论假设简化的结果就是，适用性的无限扩大。因为认定经济人都是相同的——具有工具理性、有远见的、随时准备利用机会去实现

① Stefan Hedlund, *Invisible Hands, Russian Exper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Systemic Fail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0.
② Ibid, p.21.
③ Ibid, p.26.
④ Ibid, p.18.

个人效用的最大化；由此推论，每个国家的状况都是一样的；而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将会令他们自动服从市场规则，实现经济的最优均衡。他们据此而形成了一种简单的理念，认为放弃命令经济体系的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是相同的，能够快速向市场经济转型，实现经济增长和良性发展；而俄罗斯人因为乐观的经济前景，会自动支持市场经济，并在市场经济框架下进行自利行为。但实际上，他们忽视了原有社会规范有可能造成行为者旧有行为模式的延续，并抵制向正式规则转变的可能。赫德兰认为，社会规范与正式规则和执行机制共同构成了制度。赫德兰指出，社会规范是正式制度在行为体心理层面的内化，从而驱动行为模式的转变，对正式制度有支持作用——赋予其合法性。他再三强调，正式规则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但是社会规范的形成是一个观察、学习、分享的过程，需要长时间的影响才能转变。所以，如果社会规范没有转变，而单纯地强调正式规则的作用，将会形成行为者仍延续旧有行为模式的局面，导致正式规则无法获得合法性而失效，继而发生改革的逆转。

所以，赫德兰认为，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虽然改变了正式的博弈规则，但是忽视了社会规范的转变，导致改革不仅没有成功，反而恶化了经济情况。他强调，制度变迁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的双重转变；而俄罗斯转型失败的关键之处，在于没有认识到改变俄罗斯行为者偏好影响力博弈，逃避规则这种旧有社会规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想改变旧有的社会规范，就必须彻底改变原有的制度矩阵[①]。他主张，这需要回到历史，探寻俄罗斯制度演进中的特点。在他看来，基于权力-财产权的关系不明确的、以偏好个人影响力博弈、逃避规则、追求重新分配的行为模式，并不是在苏联体制下才开始出现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赫德兰强调，以权力-财产权模糊为特征的制度模式，实际上早在莫斯科公国时期就已经形成。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和巩固，这种制度模式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政治文化和行为体行为模式。尽管在历史上多次出现以西方权力-财产权关系为目标的制度变迁，但总是出现逆转。从莫斯科公国到沙俄帝国再到苏联，一直到今天的普京政权，最初的制度设计在数百年的变迁中保

① 制度矩阵，指的是构成制度体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持着惊人的惯性。有鉴于此，赫德兰认为，俄罗斯制度的演进史是路径依赖分析的天然案例，应该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俄罗斯的制度变迁历史进程研究，发掘俄罗斯制度矩阵的特点，找寻导致改革逆转的关键性因素，为俄罗斯打破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提出可行的建议。

## 二、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的基本逻辑

路径依赖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者制度变迁具有类似于物理学中惯性的特征，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就会对这一路径产生依赖。路径依赖理论源于经济学理论中对于技术改变的研究，用于解释在技术发展和创新条件下，为什么生产者会持续选择使用效率相对低下的某些技术。道格拉斯·诺斯将技术变迁中的自我强化机制引入到制度变迁的分析中，用以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国家没有选择相同的发展道路，一些国家长期陷入贫困，无法摆脱低效制度的问题。对于制度的基本作用，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更正式些，是人为设计的限制性条件，用以塑造人们之间的互动。因此，制度能在人类的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的交换中构建激励因素。随着时间的变化，制度变化塑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式，所以是理解历史变化的关键。"[①]简单来说，一些人制定规则，用以管理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互动，另一些人则通过建立各种组织等方式应对新规则，这样有助于拓展获利的机会——生产性的或者重新分配性的。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者主站，制度变迁中也存在路径依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旦选择了以回报递增为特点的制度安排，强化机制将会造成锁闭效应，从而对这种发展路径产生依赖。

### （一）路径依赖形成的条件

赫德兰支持路径依赖是基于低效制度的主张，并认为两种力量形成了路径依赖——回报递增和有巨大交易成本的不完全市场。笔者需要强调的是，

① D.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

这实际上修正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边际收益递减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假设。在制度变迁环境下，如果行为者对某一种制度安排的持续投入造成回报递减的话，那么行为者将会选择调整或者放弃这种制度安排。但在现实世界中，一些经济落后国家的制度安排却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这说明制度安排可能存在回报递增，使得行为者继续投入以保持这种制度安排。完全竞争市场是经济学中的一种理想状态，在这种市场状态下，行为者能够获得全部信息，买卖双方自觉接受市场价格，过去的经验不会对行为者的决定产生影响。但在现实条件下，这种理想状态是不可能达到的：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以及专业分工的发展，交易成本[①] 也随之增加，而行为者获得的是不完全的反馈信息，行为者对于周围世界的认知会影响他们的选择。所以，在回报递增和有着巨大交易成本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次优制度安排有可能存在，并因为制度的锁闭效应而得以保留。

赫德兰指出，如果创设的制度是以回报递增为特点的，将会抑制生产性活动。在这种制度条件下形成的各种组织和利益团体，会利用现有的限制性条件获取利益，与制度形成一种共存共荣的关系。在这种社会中，存在着奖励海盗行为（重新分配性活动）的支付矩阵（pay off matrix）。[②]各种组织和团体就会为那些有助于重新分配性活动的知识和技术进行投资。[③]因为投入的不断增加，使各种组织和利益团体更加依赖于以回报递增为特点的制度安排。即使这种制度的效率会越来越低，因为考虑“沉没成本”，他们也不会轻易地选择退出。在此基础上，赫德兰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奖励海盗行为的制度矩阵，一定是源于财产权利缺乏保障；而存在这种制度矩阵的社会长时间被锁闭在次优均衡的路径依赖中。[④]

① 交易成本的概念是新制度经济学派引入到经济分析中的，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科斯（R.H. Coase）提出。

② 支付矩阵又称报酬矩阵、收益矩阵、赢的矩阵，指博弈参与者的策略选择与相应收益所组成的矩阵。

③ 关于建立海盗行为的支付矩阵的详细论述，参见 D. North, “Towards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Barnett, W.A., Hinich, M.J. and Scofield, N.J. (eds),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④ Stefan Hedlund, 2003, p.28.

赫德兰强调，在有着巨大交易成本的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信息反馈是碎片化的，受信息不完全反馈和意识形态影响的行为者的主观心理将会塑造路径。[①]随后，不仅偏斜的路径和持续的表现不佳会占上风，而且从历史中获得的认知也会影响行为者做出的选择。[②]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会将奖励海盗行为的制度结构合理化，而且还会对社会的表现不佳做出解释；结果，经济将会发展出强化现有激励因素和组织的政策。在路径依赖理论中，意识形态是指被广泛共享的心理模型，而心理模型是由个人认知系统创造的，对周围环境解释而形成的内在表现。赫德兰强调，“心理模型一旦形成就会被不断加固，很难被改变”，[③]这是因为“未来记忆（memory of the future）”在发挥作用。神经生物学家大卫·英格瓦（David Ingvar）的研究发现，为了处理每天大量的信息，人的大脑会发展出一种“未来记忆（memory of the future）”，这是一种播放机制，能够过滤掉那些不符合个人对未来感知的信息。[④]通过这种过滤，“解释环境”的任务将会得到极大促进，而且很难被影响。

从赫德兰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可以获得两个重要信息：首先，历史是重要的，历史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回报递增可能会影响特殊制度安排的创立和保留；而且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高交易成本的条件下，行为者也会被锁闭在对周围世界认知的模式之中，从而影响他们未来的决定。其次，相对于制度矩阵（正式规则），意识形态（非正式规范或者社会规范）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将奖励海盗行为的社会结构合理化，为社会不良表现提供解释的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会持续抵制正式规则的改变。

需要注意的是，赫德兰反复强调，路径依赖不是决定论，或者政策失败主义。路径依赖分析的是制度锁闭效应如何以及在什么方面可能会发生影响。虽然这种锁闭效应很难被突破，但不等于说无法被突破。路径依赖分析的意义在于提醒潜在的改革者在进行政策建议时要谨慎。首先，要突破一种既有的观念，即所有国家都是相同的，同一种经济政策将会在所有的文化背

① Stefan Hedlund, 2011, p.225.
② Stefan Hedlund, 2003, p.281.
③ Ibid, p.291
④ Ibid, p.292.

景下产生同样的结果。“只有准确的考虑和寻求阐述路径依赖结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范两个方面，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改革建议，才有希望取得进步。”[①]

### （二）打破路径依赖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简化了人类行为动机的复杂性，将历史、文化等因素排除在外。但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历史影响力会防止理性的向前看效用或者利益最大化。更具体地说，“当历史妨碍市场力量消除差的制度化解决方法时，它就变得很重要”。[②]所以，赫德兰主张，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根据这种结构性或者文化性的观点，制度被视为现象，即“超越了个体行为者，具有不可变的社会文化特征，这种社会文化特征会决定行为。”[③]

笔者需要强调的是，赫德兰的路径依赖分析框实际上扩大了新古典主义的传统解释范围，同时坚持根植于新古典主义的主要假设。赫德兰并不否认行为体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但是因为受到不完全信息的影响，行为者追求合理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有可能导致对次优均衡的持续逆向选择。这可以解释为是个人偏好的排序导致了某些类型的集体不理性反应，而不是外部强制力所导致的。因而，他主张自利的理性工具行为必须考虑嵌入到社会结构中，并以社会规范的力量作为补充。

赫德兰指出，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因为不受限制的自利行为有可能会堕落为纯粹的贪婪，从而损害公共利益。因此，需要引入国家的作用。当谋求个人利益堕落成贪婪时，国家应该进行干预，在防止市场失效的同时，又不用压抑合法的寻求自我利益的行为。因此，他强调，国家应该像看门人一样，将宏观层面的公共规范植入到微观层面，并内化为个人规范。只有当两个层面流畅地联系起来，才能期望个人规范出现，从而支持良好的经济表现。

① Stefan Hedlund, 2005, p.12.
② 关于赫德兰对于行为动机的论述，详见 Stefan Hedlund, 2011, pp.197-203.
③ Ibid, p.160.

市场的第二个缺陷是不能降低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的扩大、产量的增加，规模经济会降低转换成本，同时，由于市场复杂程度的增加，也造成了交易成本的增加。仅依靠市场自身是不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解决的方法总是带有集体产品的特点，即所有人都可以免费使用的产品或者服务。赫德兰认为，很难找到所有人共同分担集体产品成本的方法，这就需要国家承担。“（现实世界中）因为缺乏个人行为利他主义的激励因素，所以市场和国家需要共同努力，保证个人行为符合集体利益”。[①]

基于上述分析，赫德兰强调，应当将国家视为一个独立的行为者，重视国家的责任，而不是放任自由。“（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承担契约的第三方执行者和不可侵犯的财产权保护者的责任，决定经济将有怎样的表现”。[②]

所以，打破路径依赖，需要：首先，建立正确的正式规则，即制度不具有回报递增的特点，使支付矩阵奖励生产性行为；其次，引导心理重述，改变原有社会规范，促使行为者认同、支持生产性行为，从而为新的正式规则提供合法性。国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赫德兰逻辑来看，完成上述目标需要经历三个步骤：

第一，确立以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正式博弈规则。以回报递增为特点的制度矩阵的核心是权力——财产权关系的模糊，从而导致获得财富的方式是重新分配。这需要行为者与权力者建立依附关系，因而行为者偏好个人化关系和影响力博弈，这就降低了对法律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者是普遍逃避规则的。所以必须将财产权从权力中分离出来，确立以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性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明确划分私有财产权与国家权力的界限，以保护私有财产权。在这方面，赫德兰认为休克疗法中的改革建议是充分的。

第二，国家作出可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限制自己随意破坏私有财产权的权力。“要保护财产权，要么需要统治者克制和抑制自己使用强制性力量，要么需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以防止随意没收财产。”[③]即“激励性（motivational）”可信承诺。这需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为自己找到信守承诺的理由，这要求统治者构建一种博弈规则，令统治者和选民在“激

① Stefan Hedlund, 2011, p.148.
② Ibid, p.155.
③ Stefan Hedlund, 2003, p.301.

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le）”的条件下，都有兴趣遵守规则。从而形成制度的自我强化，有助于支持性规范的形成。“激励性”可信承诺强调非正式规范与正式规则的共同转变，从而为正式规则提供合法性。

第三，建立独立的司法机关，严格执行以法律为基础的博弈规则，通过执行机制持续的可信性引导心理模型“重述”的发展，逐渐改变社会规范，为正式规则提供合法性。在市场经济中，重复博弈的经验会告诉行为者，背叛不是合理的策略，相互学习将会形成一种心理模型的汇聚，从而导致规范——如契约必须遵守，将内化在政治文化和商业道德准则中。

赫德兰强调上述努力，时间是关键。这需要数个前后相继的政府领导层持续地证明其改革承诺，才能有效地引导心理重述的完成，从而改变非正式规范，促使行为者为更好的掌握生产性行为技巧而进行投资，促进市场繁荣。所以，打破路径依赖的关键挑战是坚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在构建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赫德兰将叶利钦时期主要行为者的行为方式与古代俄罗斯和苏联时期行为者的行为方式进行了对比，他发现，不同时段的行为者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一致性：偏好个人影响力博弈、普遍逃避规则、对统治权力的依赖等，是其进行重新分配性活动的基础。这可能说明，驱动行为者行为的旧有社会规范仍在发挥着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赫德兰通过对俄罗斯制度演进史的分析，发现因国家不负责任而导致的财产权模糊是俄罗斯从古至今的制度特点，也是俄罗斯人普遍逃避规则这种社会规范的根源所在。

## 三、俄罗斯制度演进史中的路径依赖

赫德兰从留里克王朝建立开始，认真分析了基辅罗斯、莫斯科公国、沙俄帝国、直至苏联的制度特点，在派普斯、爱德华·凯南、比灵顿等关于俄罗斯制度和政治文化、精神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使用路径依赖理论工具，分析俄罗斯制度建立的初始条件、自我强化机制、与统治规则相适应的社会规范（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总结出俄罗斯制度矩阵中的本质特征，以及在此制度矩阵下俄罗斯人的行为方式的特点。

在俄罗斯的案例中，赫德兰认为，俄罗斯早期——莫斯科公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具有历史偶然性，但这一制度体系具有明显的回报递增特点——财产权不明确，由这一制度矩阵创造的特殊利益集团——贵族、官僚，依赖统治者的权力，通过重新分配活动获取利益，逐渐发展出将这种制度矩阵和社会结构合理化的社会规范。赫德兰指出，专制制度矩阵并不是俄罗斯唯一的选择，当这种制度矩阵的效率越来越低的时候，统治者也会改革——彼得一世改革、叶卡捷琳娜二世改革、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等。但是统治者始终不愿分享权力，使得政府不愿承担第三执行方和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责任；加上令专制制度合理化的社会结构合理化心理模型的抵制作用，造成了数次西方化改革的逆转。

### （一）俄罗斯专制主义制度矩阵的崛起

从制度特点看，莫斯科公国与基辅罗斯具有明显差异：莫斯科公国是一个典型的世袭国家，而基辅罗斯是一个组织松散的、由波雅尔——商人组成的商业联邦。但赫德兰强调基辅罗斯留下的三项重要遗产对莫斯科专制主义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财产权利的缺失、东正教的影响、与东部草原民族频繁相互征伐的恶劣安全环境。古罗斯的统治者们主要通过贸易获得收入，所以基辅罗斯的王公们并未对土地开拓实现真正的依赖，统治精英未能建立起任何与领地的实质性的联系，也就没有出现对于主张土地所有权的各种法律规定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却是西欧产生分权的驱动力。基辅罗斯的横向继承制度[①]阻碍了世袭君主政体的建立，因而不能发展出西欧那样的封建秩序，也导致土地财产权的主张被压抑。

东正教产生的文化和社会影响，有助于形成俄罗斯独特的意识形态，为莫斯科专制主义制度模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合法性基础。而与草原民族之间的频繁战争，迫使自然条件恶劣的东北罗斯必须集中大部分人力、物力用于安全保障，从而产生了对强制资源动员体制的需求。

---

① 横向继承制度区别于纵向的世袭继承制度，权力和财产不是在父子之间传承，而是在兄弟之间传承，即上一任大公去世后，由大公最年长的兄弟继承王位，直至大公最年幼的兄弟过世后，才由子侄辈继承王位。赫德兰认为，这种横向继承制度可能是基辅罗斯在与南方游牧民族长期的贸易和战争关系中学习来的。

1、莫斯科公国专制主义制度的确立

首先，统治者垄断了权力。莫斯科大公通过权力的不断集中和巩固，将王位继承转变为自己家族的实际特权；将过去大公仅仅是公爵中居首位者的秩序转变成为真正的独裁者秩序。独裁原则正式确立之后，统治者为了一时波雅尔贵族逐渐增强的自由趋势，开始着手解决他们手中的可继承土地——包括封地和授予土地[①]。其次，剥夺波雅尔贵族的权利，建立服役土地制度（поместье）。莫斯科大公通过两个与土地集中有关的步骤，将世袭土地体制（вотчина）转变为服役土地体制，即服役才可获得统治者授予的土地：第一步，缩减服役公爵的数量，破坏波雅尔的实际自由；第二步，通过没收和允许大公胜利后在支配奖励服役土地方面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增加了无主土地的可用性。赫德兰强调，将统治者无责任的权力与服役者有条件的财产权利结合在一起，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当需要发动战争的时候，统治者不需要与有土地的贵族进行讨价还价，而可以通过命令，征用人力和物质资源。[②]由于莫斯科普遍缺少贸易和资源财富，大公没有钱支付波雅尔的酬劳，因此进一步发展出了供养制（кормление），允许官员在他们负责管理的土地上收取财物，养活自己。因此，包括继承财产权利和自由离开权利的法律规则体系转变为无规则的服役义务，因工作获得工资的契约权利被基于统治者意愿分发奖励所取代。自下而上的私人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体制被遏制了。

第三，强加集体责任，进一步加强控制，防止背叛。因为强制服役，变节和背叛的危险也随之增加，莫斯科大公开始加强对服役者的控制，强加集体责任（порука）。服役的波雅尔和公爵们被迫宣誓不会离开服役，还要提供担保人担保他们的忠诚。慢慢地，对于提供担保的人数要求也不断增加，此外，还要求服役贵族缴纳保证金，以防止背叛。集体责任产生了一个依赖和从属于统治者权力的政治阶层，根深蒂固而且长久。[③]

① 授予土地是封地时期奖励军事服役者的一种土地制度，授予土地可继承。
② Stefan Hedlund, 2005, p.119.
③ Stefan Hedlund, 2011, p.120.

第四，将封地阶段早期的农民转变为农奴。莫斯科大公为了满足自己对资源越来越大的需求，榨取的对象逐渐指向农民。为了将地租榨取最大化，需要确保有足够的劳动力资源，所以需要抑制农民的流动性，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1649 年法典正式引入农奴制。

赫德兰指出，随着农奴制的建立，莫斯科专制体制的建设正式完成。贵族和农民被剥夺了自由流动的传统权利，同时也被剥夺了财产权利以及使用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莫斯科大公在自己可继承的土地上像上帝一样行使完全权利，整个东北罗斯都是他的个人财产”。①

在赫德兰看来，在当时高度没有规则的环境下，莫斯科以最大限度榨取资源的方式而建立的正式规则体系是合理的，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功，使国家能够将力量集中在严格受限的目标上——“保持军事安全、政治秩序，更准确地说是避免政治混乱”。②但是，对社会制度矩阵的其他方面造成了严重的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附带损害之一，就是有效压制了所有要求执行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这为俄罗斯法律体系的长期发展设定了方向。赫德兰强调，俄国后来普遍性问题的根源在于司法权分配逐渐集中于大公法庭，以及法官的逐渐腐败。附带损害之二,是供养制（кормление）以及后来的授予土地制（поместье）有效压制了货币交易。这两个附带损害导致了基础性规范体系的转变，令国家与社会的界限逐渐消失了，权力——财产权的关系也模糊了。所以，莫斯科专制主义制度矩阵具有明显的回报递增特点，缺乏正式博弈规则，有着显著的交易成本。

赫德兰认为，莫斯科强制性资源动员模式的历史动力，预示了专制主义下经济增长和力量投送的周期性，即每次革命后，都是独裁主义旧秩序的恢复。这里的核心含义是，俄罗斯历史发展展示了一种制度模式的持续性，即使面对巨变，依然能够保持。③

2、支持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形成

在确定莫斯科专制主义制度具有回报递增特点、缺乏正式博弈规则、存在显著交易成本后，赫德兰转向了路径依赖形成的第二驱动力——在信

① Stefan Hedlund, 2005, p.98.
② Ibid, p.132.
③ Stefan Hedlund, 2011, p.122.

息反馈不完全条件下形成的支持性共有心理模型——意识形态，是如何为专制主义制度安排提供合法性的。在分析专制君主、波雅尔精英和农民心理模式的转变过程后，赫德兰认为，东正教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实现沙皇垄断权力的合法性，教士将拜占庭王权高于教权的理念引入莫斯科，宣称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人们必须完全服从沙皇。在宣传过程中，为了使统治者接受保护者的身份，东正教将莫斯科塑造为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引入了“第三罗马”理论。赫德兰主张，“俄罗斯后来的扩张和弥赛亚主义的形式，以及布尔什维克的第三国际，都可以被描述为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直接扩展”。[①]支持“第三罗马”理论的来自塞尔维亚的流亡教士还帮助莫斯科统治者编造宗谱，将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祖先回溯到罗马帝国皇帝。因而，东正教会请求莫斯科大公使用拜占庭皇帝和专制君主的头衔——“沙皇（tsar/samoderzhets，царь\самодержец）”，[②]成为“全罗斯的主人”。尽管第三罗马理论与莫斯科统治者的要求不相关，但是与罗马帝国皇帝的联系，以及专制君主头衔所代表的绝对权力，是有助于其统治的合法性的。

赫德兰强调，波雅尔贵族阶层对于专制主义制度合法性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莫斯科不管统治权力理论的正当性有多强，也需要统治阶级的支持才能进行统治，因为统治者也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赫德兰认为，波雅尔和较小的王公本来可以有效挑战专制体制，因为在基辅时期大公不过是波雅尔的领袖，不具有独裁权力。但是莫斯科大公通过引入新的贵族等级——御前重臣（окольничий）、杜马贵族（думный дворянин），来削弱波雅尔对专制君主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赫德兰认为，波雅尔阶层之所以接受等级体系和专制君主的垄断权力，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思考也促成了波雅尔贵族心理模型的转变。首先，莫斯科经历组织性变迁后，贵族失去了有效挑战专制统治的平台，实际上已成为沙皇的奴仆，所以即使贵族真的想要挑战也很难进

① Stefan Hedlund, 2005, p.119.
② 沙皇，俄语，来源于拉丁语中的皇帝（Caesar）和德语中的皇帝（Kaiser）。

行。其次，当贵族接受了成为沙皇奴仆的现实后，发现等级体系是有好处的。他们服从统治者，不仅可以保证贵族之间的和睦，不用害怕卷入内战的危险，而且可以从沙皇处获得稳定的、不费力的收入。第三，专制君主对于背叛行为设立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并建立政治警察执行“言行（слово и дело）法”，加强对波雅尔贵族的控制。第四，双重的非正式连带责任——贵族成员间相互担保、以及报告和谴责背叛行为的义务，大大增加了背叛的成本。赫德兰认为，通过得失权衡，贵族接受自己是沙皇奴仆的地位是一种合理的策略。随着这种信息的长期传播，会造成参与者的认知失调，并改变贵族的心理模型，最终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为沙皇服务是每个人的神圣义务。他认为，在莫斯科人的心理世界中，为沙皇服役是保持他们自由和尊严的条件。莫斯科人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主人，那是一个可怜的人，会遭受侵犯和侮辱。但是如果一个人服役，特别是为沙皇服役，将会得到主人强大的保护，并分享主人的尊严。[①]这种形象传递出一种自我强化的世袭统治体系，宫廷内外的人在世袭统治体系的延续性上有很强的既得利益。

赫德兰认为，相对于专制君主和波雅尔贵族，农奴的心理模型转变较为容易。这主要是因为村社制度的保留和延续。尽管农民被变为农奴，但村社制度得以保留，这是因为农民认为这种组织形式是有益的。村社给农民的心理模型造成两种影响：集体主义意识和对于权威的服从性。村社的出现和发展是为了保证集体的生存，而不是增加个人财富，因而在村社中，集体利益居于首要地位，任何威胁集体利益的个人行为都会受到谴责。为了保证集体生存，村社强制安排生活的所有方面，因而产生一种严厉的权威结构，村社是由长者治理的，他们的决策不能被质疑，更不用说反对。因而，赫德兰强调，农民从一开始就没有产生出任何权利观念。[②]

东正教会通过两种方式让上层强加的义务在农民的心理层面合理化、合法化：第一，向农民宣传沙皇是全俄罗斯的主人，其权力是神授的，受神的庇护；沙皇是所有子民的父亲，农民完全信任沙皇，将错误要么归咎

① Stefan Hedlund, 2005, p.151.
② 对于村社的详细论述，参见 Stefan Hedlund, 2003, pp.286-287.

于上帝的惩罚，要么归咎于大臣的奸佞。第二，逐渐向农民灌输宿命论，以及面对来自统治者的暴力时，要有顺从的观念。

### （二）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持续抵制西方化的改变

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为以强制资源动员为目标的正式规则提供了合法性。因而形成了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所说的“间歇性（jerky）”经济发展模式，即由军事需要所驱动、国家主导的资源动员反复形成冲刺型的快速经济发展。赫德兰强调，由于政府过度榨取，经济快速发展一段时间后就会长时段地停滞，因为巨大的投入已超过人民所能承受的极限，长时间的经济停滞是不可避免的后果。以安全为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定律”——战争胜利将带来旧体制的巩固，战争失败将引发改革。每次战败，统治者总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干预——引入西方正式规则，做出改变。但下层的反应与所谓的工具理性相反，下层行为者坚持逃避或者扭曲新规则，而不是适应和遵从。其结果是“产生不加抑制的普遍的贪污，以及对高度个人化的影响力博弈的偏好”。[①]

非正式规范抵制改变的第一次表现是在“大混乱”后，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赫德兰认为，贵族阶层本可以利用这次机会迫使新沙皇签订权力契约，限制王权，引入私有财产权，然后走上与西方相同的发展道路。但是贵族阶层选择继续服役，重建专制主义的制度安排。这是因为专制统治被波雅尔视为物质收益的稳定来源，波雅尔能够通过形成新形式的组织和规则体系有效地进行利益的开发，并且逐渐发展出一套规范体系，即使他们的物质利益变小，也能阻止对专制统治的任何形式的挑战。因为波雅尔对精英等级体系进行了大量投入，加上政治婚姻，令认知失调减少，从而导致一种特殊的忠诚观念，有效阻止了退出选择。波雅尔精英阶层中出现的“为沙皇服役是荣耀”的观念，有助于压制任何波雅尔内部企图破坏等级体系的成员。[②]

① Stefan Hedlund, 2011, p.172.
② Stefan Hedlund, 2005, p.168.

彼得一世被誉为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沙皇，但是学界对彼得一世的看法却出现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改革者，打开了朝向欧洲的窗户，并使俄罗斯不可逆转地踏上了通往西方的道路。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彼得一世是反基督者，是俄罗斯警察国家的创始人、指令经济的创始者。赫德兰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正确的，不能分立看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他看来，彼得一世改革有两个目的：第一，米哈伊尔时期被波兰击败，迫使俄罗斯必须加强自己的战争能力；第二，希望将俄罗斯现代化，“结束其拜占庭式的过去，进入欧洲大家庭”。[①]其本质是增加指令和控制效率，而不是允许更多的、自下而上的主动性；并认为1722年引入的基于功绩晋升的终身服役体系——“官阶表（Табель о рангах，table of Ranks”，实际上表明，彼得一世并不允许自下而上的企业家精神出现。

赫德兰强调，彼得一世试图用合理性和现代性来取代东正教信条，但这种现代性只被一小部分首都的精英所接受，而包括地区贵族，新出现的商人和企业界阶层，受到良好教育的、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信奉东正教的农民-农奴，将改革视为魔鬼的行为。导致精英与其他阶层或集团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

彼得一世以后，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都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没有形成积极的、可持续的转变。赫德兰认为这是因为内生性的抵制因素在发挥作用：一方面，统治者不允许对绝对专制君主权力进行宪法性限制；另一方面，贵族依赖统治者权力获得利益、以及倾向于服役的心理模型已经固化。

尽管两次改革发生逆转，但是1905年革命和斯托雷平改革令赫德兰相信，俄罗斯的西方化改革向着成功的方向前进，甚至认为这可能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赫德兰的理由是：第一，《十月宪章》允许了第一次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引入了保证全部权利和自由的基本法；第二，斯托雷平的改革不仅加强了私有财产权的地位，而且缩小了农业的相对规

① Stefan Hedlund, 2005, p.177.

模，有利于资源转移到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生产中。但令赫德兰惋惜的是，20 世纪初所有的努力都被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断了。

从赫德兰的分析来看，两个多世纪的后彼得时代发展，一方面是俄罗斯精英西方化的持续过程，另一方面是重复的国家干预，阻碍引入民主政治制度和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改革和逆转的周期性表明，一些因素持续地发挥着抵制性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官僚机构中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那些支持专制、反对市场管理、深深嵌入制度矩阵中的社会规范。与同时代西欧发展路径的根本不同在于，俄罗斯在正式规则改变的时候，缺乏西欧那种由城市文化引发的深层次法律与精神的转变。其后果就是导致俄罗斯没有发展出有特色的城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构成了欧洲发展的基础，他们构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 （三）苏联——现代化伪装下的莫斯科制度矩阵重构

在对苏联制度矩阵的分析中，赫德兰借鉴了科尔奈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基因工程”的解释框架，即一旦完成几个基本步骤后，其余的程序就会自动完成。在赫德兰看来，苏联的制度构建主要经历了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引入权力的垄断，党的领导层掌握着所有权力，而这种权力不根据正式规则使用，没有正式的、公正的外部执行机制，像专制君主一样保留了不负责任的核心特点。第二步是宣称彻底的国有化，引入“人民财产”的概念，实际上压制了私有财产权。赫德兰认为“人民财产”概念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所有人都拥有，实际上就是没人拥有，其目的在于压制合法的经济产权制度。第三步，引入庞大的中央计划官僚机构，因为压制了财产权和货币之后，布尔什维克需要创造“协调机制”以替代市场的配置作用。赫德兰指出，一旦压制了货币交换，布尔什维克就需要回到莫斯科公国向服役者提供报酬的方式——封地和供养土地，滋生出普遍的贪污腐败。第四步，为了抵御外敌，发动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以实现军队的现代化，手段同样是利用对农业部门的强制榨取。布尔什维克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恢复了莫斯科时期的仇外情绪，从而将强制榨取政策合法化。

基于苏联制度矩阵特点的分析，赫德兰认为苏联重构了莫斯科公国的制度矩阵，不过是专制君主变成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服役贵族变成了党的精英，职级表变成了罗名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东正教构建的精神世界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这种制度矩阵特点的延续性表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所以他认为，苏联的衰落和崩溃，符合格申克龙所说的“急动性”规律——国家主导的强制性资源动员发展，在经历冲刺型发展后，因为资源和人民的承受能力已经耗尽，会陷入长时段的停滞，并最终崩溃。

### （四）普京时代制度变迁的逆转——“莫斯科公国”的重建

相较于莫斯科公国、沙俄帝国和苏联，赫德兰认为叶利钦时期行为者的行为偏好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符合他所总结的莫斯科公国制度矩阵下行为模式的特点：统治者偏好不负责任的权力，不接受对于权力的限制；权力与财富之间的界限模糊，精英的财富获得依赖于统治者的权力，对于财富的占有是暂时性的，财产权没有保障；正式制度的改变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形式，没有统治者的支持，改革不能进行。按照赫德兰的逻辑，正式规则的改变并没有带来驱动行为体行为的社会规范的改变。虽然法律和实际的私有化过程确立了私有财产权，但是国家并未能做出可信的承诺，即限制自己破坏财产权的权力，导致寡头依赖权力对财产进行重新分配，而人民对于休克疗法所确立的正式规则表现出普遍的怀疑，正式规则的合法性遭到侵蚀。从而为普京治下“莫斯科公国”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在赫德兰看来，首先，普京没有加强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制建设，而是选择了与莫斯科公国时期相似的惩罚性议程。其次，普京建立了垂直性的权力结构，加强权威，实现权力执行的有效性。第三，控制媒体。从赫德兰提出的打破路径依赖的必要条件来看，普京的上述政策与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的行为相反，即社会进行真诚对话，对洛克式的社会契约做出可信承诺。赫德兰强调，如果接受心理模型的共享是成功做出可信承诺的必要条件，那么可以认为普京没有尝试开启关于政府承诺可信的共有心

理模型的重述进程。正相反，普京仍然满足于不透明的权力和影响力博弈，而不允许广大民众参与。

赫德兰认为，随着普京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莫斯科公国再次被重建了。“作为无冕沙皇的弗拉基米尔一世，普京希望一种与古代沙皇、大公没有多少不同的统治”。[①]在他看来，政府对于私有化是否继续含糊其辞，说明权力和财产融合的传统仍然在发挥作用；杜马被削弱，说明权力仍然是不负责任的；切断与叶利钦时代“家族”的所有联系，说明俄罗斯总统再一次像真正的、传统的专制君主一样统治。虽然普京关注公共参与，但他像彼得一世一样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双向沟通，或者对他权力任何形式的挑战。赫德兰指出，对于寡头和官僚来说，这一信息是明确的，屈从于总统的人能够继续得到“供养”，并进一步收到有利可图的“授予产业”。莫斯科秩序复活最重要的方面是国家的稳定性与某个人联系。如果普京突然消失，那么就会陷入体系精英之间的自相残杀。[②]

赫德兰强调，普京重构的莫斯科公国制度矩阵与俄罗斯人的心理模型是相契合的。俄罗斯人“对一党国家感到舒适，将秩序置于自由之前，对媒体的审查制度也没有意见。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们希望俄罗斯再次成为一个强国，他们认为国家更多地介入经济生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③]21 世纪的俄罗斯也展示出同苏联一样的俄国制度连续性，包括政府的独裁模式、模糊的财产权利、依赖于统治者个人意愿的现代服役贵族的出现。仇外情绪的不断增长，也提升了安全和爱国主义的重要性。

通过对俄罗斯制度变迁史的系统分析，赫德兰指出，仅仅通过彻底的自由化引入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失误之处在于改革者以及他们的西方顾问没有试图为新规则提供合法性，因而也丧失了引导公众心理模型进行重述的机会，而成功的心理重述可以产生一套新的、支持正式规则的非正式规范，为新的博弈规则提供合法性支持。所以，赫德兰反复强调，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在于国家做出可信的承诺。只有国家做出可信的承诺，行为者才

① Stefan Hedlund, 2005, p.306.
② Ibid.
③ Stefan Hedlund, 2011, p.109.

会相信为了保证长期收益而牺牲短期收益是合理的，从而出现相应的心理模型转变，转向生产性行为模式。

尽管困难重重，但赫德兰坚持认为，在俄罗斯面前仍然存在朝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选择。所以，俄罗斯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引入拥有包容性的政府。他强调，如果俄罗斯经济想进入可持续增长的轨道，必须消除流动强盗的消极影响。否则，持续的资本外逃和对外国投资的阻碍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一任务就像是重建固定的强盗，不仅需要将榨取最优化，而且要促进生产性投资期限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政府要保证公共物品的供给，从而实现以消费者主权和法治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赫德兰强调，这才是俄罗斯政府必须要做的真正选择。

所以，从赫德兰的逻辑来看，俄罗斯改革者所面临的真正挑战不在于经济政策领域，而在于民主制度的建设。只有建立负责任的政府，才能期望真正的进步，这不仅要求坚定地保证言论自由，而且还要真正地授予人民可执行的个人权利。赫德兰希望，“未来，俄罗斯可能会拥有一位进行充分‘自制和限制’的统治者，令政府向‘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①]的方向发展。

## 四、结论与评价

赫德兰将俄罗斯的改革进程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其基本假设是俄罗斯从古至今的制度变迁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因而后苏联时代的改革失败、逆转具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所以，赫德兰将研究重点集中在找寻俄罗斯制度矩阵中具有回报递增特点的制度安排，并据此提出打破俄罗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建议，为俄罗斯转型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选择。

赫德兰在作品中指出，经济学最初是作为政治经济学出现的，关注的不只是经济规律，而注重考查政治、社会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就连经济学的

① 强化市场型政府，曼努尔·奥尔森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个政府足够强大，能够创立和保护财产权利、执行契约，但同时限制自己剥夺个人财产权利的行为。

创立者亚当·斯密也重视政治、道德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新古典主义革命将政治学、社会学排除在外，专注于经济增长理论，而忽视了政治、社会等其他变量。在方法论上，赫德兰采用了整体主义方法，强调个体行为者的社会属性，主张个体行为是被社会规范所引导的，认为个体行为应当从社会、文化、制度的现象中寻找解释。

但是，赫德兰所倡导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并不是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的挑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对新古典主义理论框架的补足。新古典主义理论在经济人工具理性假设下认为，市场调节能够实现最优均衡。但是赫德兰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交易者获得的反馈信息不完全，因而市场存在交易成本，而行为者在有限的信息下可能根据掌握的知识和过去的经验做出选择，这种选择有可能不是工具理性假设中的最优情况。换句话说，行为者的理性选择有可能形成次优均衡。那么如何解决不完全信息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次优选择问题呢？新制度主义者认为是合适的正式博弈规则，但是正式规则可能因为执行成本较高以及与原有道德不一致而造成约束力受限。所以，需要发挥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约束作用，来补足正式规则的局限性。鉴于新的正式规则有可能与原有社会规范不一致的情况，需要发挥重复博弈的学习效应，即通过持续的、公正的执行，使行为者相信，遵守新的正式博弈规则是符合个人利益的，从而将遵守规则内化为新的社会规范。

在笔者看来，在这个逻辑中有两个重点：第一，合适的正式规则，即在防止自利行为陷入短期贪婪的同时，又不阻碍合法的冒险行为；第二，社会规范对于正式规则的支持性作用，社会规范实际上是正式规则内化为精神的表现，能够对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约束。所以路径依赖理论强调行为者行为偏好中的历史、文化影响，以及时间的重要性。

尽管赫德兰纠正了新自由主义理念将俄罗斯一般化的错误，并将俄罗斯的历史、文化特点带入到制度分析当中，但这一过程一直存在着一个隐形的比较对象——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矩阵特点。赫德兰关于私有财产权的确立所引发出的一系列对于法律和民主制度安排需求的主张，实际上是源于对西方崛起经验的总结；关于打破路径依赖的建议，也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制度特

点的基础之上的；打破路径依赖的目标，仍是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模式。相较于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强调转型的“技术性政策”，赫德兰补充了合法性的内容。但西方化的模式能否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未知数。

赫德兰在俄罗斯转型的分析中，注重对政治领导人行为模式的分析，实际上仍然是遵循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方法，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比如，赫德兰将叶利钦使用法令代替立法推进改革措施解读为他对于权力的贪恋。在当时国家、政治体系已经崩溃的条件下，以总统法令暂时替代需要经过冗长程序才能颁布的法律来推进改革措施，是可以理解，也是可行的办法。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坚定支持者安德斯·奥斯隆德（Anders Åslund）就强调，在苏联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多重崩溃的情况下，是一种极端的危机，俄罗斯的改革应当被看作是一种危机解决过程。 在当时的危急情况下，叶利钦使用非常规手段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此外，赫德兰使用路径依赖解释市场失败，过于依赖高度特殊性的定义和具有契合性的历史事件，有可能让读者怀疑这些历史事件是为了实现分析框架的完整性而精心筛选的。

尽管如此，赫德兰将俄罗斯后苏联时代的改革失败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下进行考察，利用俄罗斯的制度演进史阐明了俄罗斯当前面临的困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地认识、了解俄罗斯转型逆转过程中历史、文化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而且为俄罗斯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一条基于私有财产权和国家责任的新的转型路径选择。

---

【**Abstract**】Stephen Hedlund is a prominent expert in contemporary Scandinavia Russian studies. By employing approache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economics, he has traced Russian transition for a long time and thus formed systematic unique viewpoints under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ath dependency. Hedlund holds that neoliberal transition program has led to the failure of Russian transition and reversal as it excludes Russian histor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gnoring the key supporting role of social norms for the

rules of market economy. He stresses that the failure of post-Soviet Russia's transition is not a single case, but instead it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matrix and political culture of Russia. Thus he explores Russian transition under a long-term historical context and argues that Putin's "authoritarianism" is actually the return to the "Moscow principality" regime. As a result, Hedlund advocates that Russi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gime change for its future transition. Only when its fuzzy system features of power-property relations in history is changed completely, when a system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protecting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s constructed, can health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 achieved.

**【Key Words】** Russian Transition, Path Dependency, System Matrix

**【Аннотация】** Стефан Хедлунд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Скандинавии. Он, использу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а, в течение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отслеживал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и, и избрав траекторию развития в качестве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ы, сформировал уникальную систему взглядов. Хедлунд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неолиберальные программы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и исключил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траны, проигнорировали ключевую роль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орм в поддержке правил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неспособност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 России и повернуло весь процесс вспять. Он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что провал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не произошёл просто так, а тесно связан 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и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изучая трансформиции России в длительн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можно считать, что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 Путина по сути является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к режиму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княжеств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Хедлунд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для будущи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Россия должна обратить внимание на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истеме, полностью разрушить власть истории — нечётк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истемы имуще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построить систему защиты прав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н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и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можно добитьс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и социально здор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и, зависимость траектории, матрица системы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人类学 • 民族学**

# 中俄边境城市满洲里的女性边贸人

萨雅娜 · 娜姆萨拉耶娃*

**【内容提要】**作为中国的边境城市，满洲里城市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官方热情迎接国外游客的诸项政策有关。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的成就，另一方面，大量外国人的突然出现也引起了“悦纳异己”这一经典理论所描述的境况，促成了城市公民和非公民两个群体在空间上的分裂。俄罗斯女性是满洲里游客的主要来源，通过观察她们的旅游过程以及他们对这个城市神话式的美化，并借助德里达在《逃城》中的观念，可以认为俄罗斯女性在满洲里找到了时空上的庇护之城，这里她们得到了情感和形态上的提升和认可，她们以自己在中国境内的消费去表达对俄罗斯经济地位的不满。通过中俄边境上的跨境女性对美的消费的民族志分析，可以把性别特殊的实践方式与亚洲北部边境研究的宏大领域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中俄关系　中俄边贸　俄罗斯人在满洲里　俄罗斯女性
**【中图分类号】**D851.2；D814.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3-0094(28)

……在俄罗斯不管怎么样，女人比男人更有人情味儿。
维克多 · 叶罗菲耶夫[①]

……哭泣是相貌平平者的避难所。漂亮女人会去购物。
奥斯卡 · 王尔德

* 萨雅娜 • 娜姆萨拉伊娃（Sayana Namsaraeva），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所研究员。

① 维克多 • 叶罗菲耶夫（Виктор Ерофеев），当代俄罗斯作家，他在小说《俄罗斯美女》（Русская Красавица）中，挑战苏联时期俄罗斯妇女“工人—母亲—妻子”的典型形象，塑造了利用女性气质改变命运的性解放的新女性形象。

# 引 论

2015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突然从媒体报道中消失了十几天，从而使整个国家陷入了恐慌，谣言四起，其中有关于他健康状况的猜想排在了首位，专家对他无任何声明的消失提出了更多的可能性。然而，各种猜想随着3月16日普京的重新出现而告一段落。一位专家在《克里姆林宫政治》（*Kremlin politics*）上对俄罗斯总统的新面孔做出了如下评价：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脸很有光泽，闪烁着绝对健康的色彩”。这位专家指出，“普京接受了系列整形外科手术，这次只是最近几年所接受手术中的一次”。[①]因为大家都看到了总统的脸“前后”之区别，这一说法成了使人信服的解释。之后，整容专家认为，普京脸上的光泽说明了他注射了肉毒杆菌毒素，十天正好使得脸部得以恢复。[②]

这一有趣的新闻报道表明：首先，在俄罗斯，男性与女性一样关心自己的外表（尽管绝大多数情况下整形手术被女性所追捧）；[③]再者，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情况各异，但人们都很在意自己的外表，这也使得整形手术从边缘提升到了主流，成为公共话题，尤其是那些需要隐秘的恢复过程的整容手术[④]；最后，普京成了多次接受此类整形手术的典型。据ASPS数据，反复进行整容手术的人群占接受整形手术总人数的三分之二。[⑤]

整形外科手术在俄罗斯仅有十五至二十年的历史，主要整形机构均集中于都会城市，整形热使得市场需求稳步增长。在此期间，俄罗斯的整形手术

---

① Stanislav Belkovsky, Interview dated 16 March 2015, http://echo.msk.ru/programs/personalno/1517426-echo/ (accessed 20 March 2015)

② Amwayhealthline, “Did Vladimir Putin ‘Go Missing’ So He Could Have Plastic Surgery?” http://www.amwayhealthline.com/modern-medicine/surgery/did-vladimir-putin-go-missing-so-he-could-have-plastic-surgery.html (accessed 25 May 2015)

③ 俄罗斯的整形专家证实，在俄罗斯整形市场份额中，男性占 5–8%。这一性别比例与美国相比，《美国社会的整形手术》（ASPS）报道，寻求整形手术的人群中女性占 91%，相关信息参见 Jane Megan Northrop, *Reflecting on Cosmetic Surgery: Body image, shame and narcissism*,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2.

④ 主要针对皮肤伤口、淤痕和拉伸后的恢复。

⑤ 英语新闻中假定其整形手术分别于 2011 年和 2014 年，相关论述可见 http://beautyditor.ca/2014/02/21/vladimir-putin-before-and-after 以及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dec/16/vladimir-putin-botox-plastic-surgery (accessed 30 March 2015)

出现过很多问题，有时问题可以用悲哀一词来形容，再加上高昂的医疗费用，很多俄罗斯人不得不寄望于俄罗斯以外的市场，从而促进了世界医疗旅游的市场，在短短几年内该市场增长了两倍。[①]有数据显示，在俄罗斯游客中，旅游和医疗捆绑的旅游消费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三，其中需要进行住院治疗的游客仅占百分之一。[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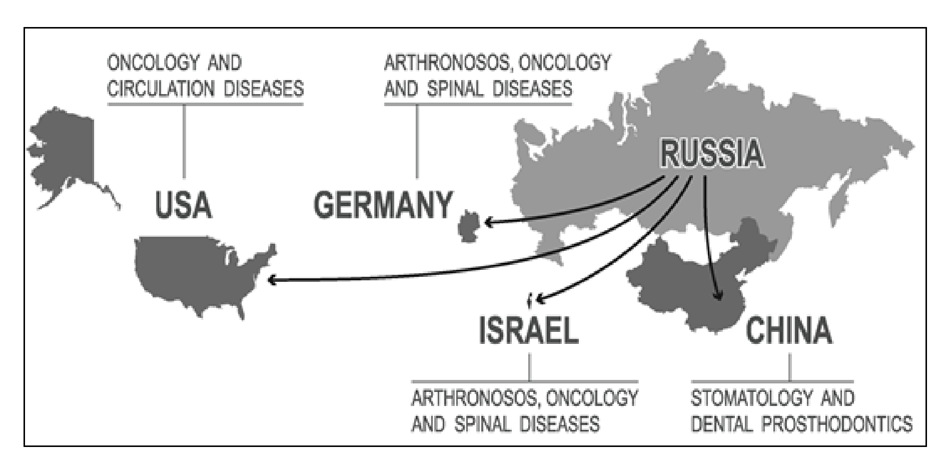



**图1 俄罗斯人的海外医疗消费**

资料来源： http://www.rg.ru/2012/02/10/doktor.html

低廉的价格是人们到国外进行美容、医疗手术的主要原因，牙科、隆胸、不孕不育和提臀手术等是最常见的选项。[③]在俄罗斯人看来，充分而能满足需要的俄语翻译，是影响他们选择具体地点的重要因素。因此，率先采取针对性宣传的国家，如德国、以色列、美国和中国等，成了俄国游客理想的医

---

① 在人类学著作中有多种“医疗旅游”的定义，但其中较为合理的定义来自科妮莉亚 • 沃格特（Cornelia Vogt）提出的：“医疗旅游是由人们对医疗服务的渴望去旅行而产生的一系列关系和现象的总和，选择医疗旅游的人需要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通过绑定度假和治疗的旅游行程，得到方便的医疗介入式治疗”Cornelia Vogt et al., *Health Tourism in Australia: Supply, demands and opportunities*, Griftin University: Sustainable Tourism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STCRC), 2010, p.36

② Irina Krasnopol’skaya, http://www.rg.ru/2012/02/10/doktor.html (accessed April 21 2015)

③ 有的国家在某些领域加强了专业化：泰国以其 320%的增长率被证实为假牙行业的热点区域；2014 年捷克共和国在隆鼻业方面增长了 304%。

疗旅游地点（图1）。德国、以色列和美国集中了不少能讲俄语的医疗专家，他们大多数人是苏联解体后移民到那里的，这给俄罗斯游客带来了沟通上的便利。中国是俄罗斯的邻国，自苏联时期双方就有频繁的语言、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学习。

本文将对俄罗斯游客出境到中国进行医疗旅游的现象进行深入的探讨。满洲里作为中俄边境上最大的商贸中心，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游客把目的地选在了这里，这样既节约旅程（大概三到五天），同时又能兼顾医疗和健康服务。目前，虽然因经济上的重要性，医疗日益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但对于中俄之间的跨境医疗旅游还没有展开深入研究。①因此，本文将这一主题置于边疆研究领域，利用民族学和社会性别的视角，通过跨境人群的民族志，对亚洲北部中俄边境进行具体分析，这亦是本文的学术研究意义所在。

基于笔者在2008-2013年间在满洲里所做的调查，本文着重探讨以下内容：为了把满洲里建成“俄罗斯游客度假天堂”，当地实行热情好客的政策，但由于跨境俄罗斯游客中的绝大多数是常到满洲里的女性边境贸易者，因此，满洲里当地的服务业带着一些“粉色”（这是从marketologists借用的词汇）。他们通过提供一系列时尚美容、化妆服务，把生意目标锁定特定的女性客户群体，并连带目标客户及其家庭成员对于家居物品的潜在需求。

本文利用这座与俄罗斯和蒙古国相邻的中国边境城市的案例，通过详细的民族志记录，探讨边境城市转变为消遣度假型旅游城市（针对本国和国际游客，尤其针对邻国游客）的过程，以及为使其旅游业多样化而把健康和医疗美容整合进旅游业的努力。接下来，把满洲里视为身体政治的一个例子，旅游业所针对的“俄国人区”事实上创造了城市内部的相互依赖关系，城市居民和客人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复杂的、流变的关系模式。最后，经过

---

① 参见 Roger W. Evans, “Ethnocentrism is an unacceptable rationale for healthcare policy: A critique of transplant tourism position stat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2008, Vol.8, No.6, pp.1089-1095; Colin Michael Hall, *Tourism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2; Colin Michael Hall, “Medical and Health Tourism: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medical mobility”, in Colin Hall (ed.) *Medical Tourism: The Ethics, Regulation, and Marketing of Health Mobility*,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3, pp.3-28; Jane Megan Northrop, *Reflecting on Cosmetic Surgery*: *Body image, shame and narcissism*,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2.

跟随俄罗斯女性买卖人在满洲里的体验，从个人的经验角度展示这一群体如何在“俄国人区”通过购买“美丽”，实现“从丑陋到美”（反之亦然）的转变形象的神话。

笔者认为，满洲里作为边疆城市，被俄罗斯跨境游客视为暂时的“逃难所”。在这里，他们能够体会到欢迎和优待。然而这不仅是因为“城市的热情好客”给予游客的特权，而是因跨境商贸使他们暂时从劳累中解放，忘掉严苛的官僚等级和持续的经济危机，在这里体验短暂的俄罗斯境外“避难所”。

## 中国边境地区的医疗旅游

近年来，与鼓励医疗旅游的亚洲国家如韩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一道，中国逐渐成为该领域的主要成员。[①]另一方面，在中国境内，因其医疗界的负面报道或患者的特殊需求，中国人借助旅游到境外就医的情况越来越多，如去韩国、新加坡和美国等。[②]但相对于前苏联成员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以及蒙古国的医疗和整形手术的发展水平和价格，加上国家对医疗旅游的引导，中国逐步变成了邻国游客的理想的选择。

从全套中医治疗到特定部位的现代医学治疗，从公立医院到私人诊所，中国境内医疗旅游领域的运营具有多样性。中国的主要城市（上海、北京和广州）吸引了数量可观的国际医疗游客。然而，借助额外的与健康相关的医疗服务业，中国边境地区的医疗旅游业仍然有可观的发展前景。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区的跨境旅游者专门到中国去进行医疗旅游，正在成为趋势。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以其适合穆斯林的旅游环境和服务，利用文化和语言的相似性吸引着大量的西西伯利亚和中亚国家的游客。清真食品、术前祷告，特殊的手术等均有俄语和阿拉伯语的翻译。[③]最近新疆媒

---

① Colin Michael Hall, *Tourism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2.

② 中国大陆女性旅行到美国或香港产子的目的，是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美国公民或在香港取得合法居住权。

③ 此信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网络广告www.xjzxmryy.com（2015 年 12 月）

体的报道中提到了一些其他类型的针对境外游客的医疗服务，例如“降血压、治疗心脏和肾脏疾病、减肥以及其他的整形治疗”。[①]

其他的中国边境地区，如内蒙古，借助其信仰和蒙、藏医学传统，吸引了蒙古国以及俄罗斯境内的东西伯利亚持蒙古语的布里亚特游客。这些地区几百年来广受佛教及其医学思想的影响。[②]在中国，蒙、藏传统医药是区别于其他医疗旅游的形式之一。随着健康服务式旅游的不断增长，跨境不再仅限于患者，作为服务，医生和喇嘛以及他们的医药商品也在跨境。正如安德烈·塞皮尔（Andre Sapir）和查塔尔·温特（Chantal Winter）所说的那样，健康服务和与患者的互动，牵连到一系列的社会安排。[③]如今，私人诊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俄罗斯大城市中，他们结合中医和藏医生物制药，主要提供“东方医药”。大部分藏蒙医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和俄罗斯佛教寺庙周围信仰佛教的人群之中。[④]医生同时也带来了医药以及与健康相关的产品，这些医药主要产于印度和中国，这也促进了中俄边境地区的商品和服务的流通。[⑤]

然而，为全面了解中国边境城市的入境医疗旅游，首先要认识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边境城市改善旅游社会环境方面的努力。中国正在不断更新和提升旅游主题，以吸引更多的国内和国际游客。内蒙古境内的两大入境口岸：二连浩特和满洲里，一个在中蒙边境，另一个在中俄边境，这两个口岸可以作为边境城市重要性和繁荣景象的典型案例。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这里因开放式市场和边境进出口枢纽而广为人知。此后的三十年间，

---

① http://russian.news.cn/social/2015-05/02/c_134203882.htm（2015 年 6 月 10 日）

② 中国蒙古传统医药学会负责人巴特尔博士说，每年大约有 10 万名游客来自蒙古国，其中近一半是传统蒙医专业的学生。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7081443.html（2015 年 4 月 23 日）

③ 他们发展了以下几种模式，患者在海外消费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模式 2）：模式 1 为跨境贸易，在这种模式下，贸易需要跨界到另一个国家发生，服务本身跨越边境；模式 2 为海外消费，这种模式下，消费者亲身到达另一个国家接受服务；模式 3 为自然人的流动，这种模式下，跨越边境的是服务的提供者。参见 André Sapir and Chantal Winter, “Services trade”, in D. Greenaway and L.A. Winters (eds.), *Survey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Oxford: Blackwell, 1994, p.27.

④ 连锁的诊所“Naran”是成功地把“东方医药”推进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例子之一。http://naran.ru/（2015 年 7 月 7 日）

⑤ 为了避免俄罗斯医药认证上的复杂性，很多健康相关产品注册为“辅助健康类”。

经济和城市改革使其进一步成为巨大的边境区域经济合作中心和原材料加工处理区，通过铁路运输木材和其他原材料，成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和国际贸易。[①]为进一步增进中国边境城市和蒙古、俄罗斯边境区域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满洲里和二连浩特都在试图重新定位外部引导式的边境贸易模式，从边境贸易模式转变到旅游型，使游客愿意将更多的钱和时间投资到休闲娱乐式的旅途上。[②]例如，从 21 世纪初开始，这两座城市都在城市文化和旅游规划方面充分考虑了公共设施和旅游服务业的发展。二连浩特因其沙漠区域的恐龙遗址成为国家级的恐龙之都。恐龙雕像住进了城市以及侏罗纪主题公园。此公园位于戈壁，因此不仅与恐龙有关的旅游项目得到了开发，附带地，具有戈壁蒙古族特色的野外体验式的旅游项目也大有兴盛之势。满洲里作为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区，从 1992 年开始被中国政府视为第一个陆路口岸城市而开放，如今这里已经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模式。现在满洲里已被提升为中国面向欧洲的国家级大型国门。

## 作为“俄罗斯游客度假天堂”的满洲里

欢迎和接待俄罗斯游客已经给满洲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利益。[③]数据显示，自中国改革开放允许境外游客入境以来，三十年内满洲里的俄罗斯游客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到满洲里的境外游客大部分来自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其数量 2013 年超过了五十万。[④]这些游客中的大部

① Gaëlle Lacaze, “Prostitu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hinese trading town of Ereen”, in Franck Billé, Grégory Delaplace and Caroline Humphrey (eds.), *Frontier encounters :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at the Russian, Chinese and Mongolian border*, Cambridge: Openbook Publishers, 2012, pp.111-135; Sayana Namsaraeva, “Border Language: Chinese Pidgin Russian with Mongolian Accent”, *Inner Asia*, 2012, Vol.16, No.1, pp.116-138; Dieter Stern, “‘Nado minimum!’ -mediating respectability at informal markets on the Russian-Chinese border”, *Inner Asia*, 2015, Vol.17, No.1, pp.5-30.

② 因为二连浩特照搬了满洲里这种与俄罗斯进行一体化整合的先进经济模式，所以被称为“内蒙古的满洲里”。http://www.infpol.ru/ksrtins-dnys/item/11897-erlyan-kak-primer-dlya-buryatii.html（2015 年 6 月 16 日）

③ 作为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对中国到欧洲的陆路运输，俄罗斯和蒙古的贡献接近 65%。

④ 数据来自满洲里市政府官方网站：http://ww.manzhouli.gov.cn/（2015 年 3 月 17 日）

分都是经常光顾满洲里的人，他们从事了多年的边境往来贸易。正如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给出的社会主义特色经济的一般定义，“短缺经济”仍然影响着俄罗斯首都以外的地方。[①]20 世纪 90 年代初游客开始到满洲里，从这里低价进货，再拿到俄罗斯高价售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俄罗斯的商品需求向人们提供了商机和利润。

满洲里锁定了两类游客：一类是来自国内的游客，他们来自中国人口密度较高的南部省市，另一类是来自俄罗斯的游客。这里为两类游客制订了不同的健康和娱乐服务项目。有趣的是，这两类游客几乎有着相反的期望。从污染严重的南方工业城市到满洲里的国内游客希望的是享受空旷的大草原和森林，呼吸干净、清新的空气，并体验蒙古族牧民和北边山区森林中的驯鹿鄂温克人的异族生活。俄罗斯游客则基本来自城市化程度较低的俄罗斯都会以外的边远地区，他们所感兴趣的是以“北方深圳”著称的满洲里的都市生活，感受城市大商场、夜生活、霓虹灯以及桑拿、美容美体沙龙和地方特色美食。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随着俄罗斯游客周末到满洲里购物之旅的拓展，这里逐渐被视为“购物天堂”。到了 21 世纪初，市政府更加致力于适应从事边境贸易的俄罗斯游客的需要，给予了更多后勤和行政上的支持，如过境通道、宾馆、购物商城和仓储地点的建设等。[②]然而，随着俄罗斯经济的稳定，临近满洲里的俄罗斯边远地区的市场满是商品。经过 21 世纪的最初十年，俄罗斯在衣服、鞋、家用电器方面开始能够自给，一些俄罗斯游客的需求开始出现了多样性。迫于地区之间新的竞争压力，迎合游客的需求，满洲里推出了新的旅游规划，把满洲里定位为“俄罗斯游客的度假天堂”。他们通过主办季节性或主题性强的地区和国家级的娱乐项目，加大旅游度假的娱乐性，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游客，例如，主办与哈尔滨冰雕节相媲美的冰雪节，以及中、俄、蒙国际选美大赛，并引导呼伦湖附近的家庭式的休闲娱乐旅游，向不同年龄和性别的群体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

① Já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② Xu Zhanxin, *Manzhouli and the Red Road*, Hailaer: Inner Mongolian Cultural Publishing house, 2009.

娱乐消遣式的旅游和提供医疗健康服务似乎已经成为边疆城市合理的发展方式。除满洲里外，毗邻俄罗斯边疆的中国城镇黑河、珲春等，利用已有的旅游基础设施，使边境旅游呈现出了多样性。下文将详细探讨这一政策在俄罗斯游客和中国居民中产生的实际影响，从群体到个人，两者之中所呈现出的不友善情绪的界限。

## 以好客为基调的政策

在满洲里，俄罗斯游客的大量出现和停留，引起了热情与厌恶的经典场景。某地域的主人（这里是中国的土地和公民）视自己为城市的主人，与外来者（这里是从俄罗斯来的游客）互动。最早从人类学的角度认真探讨此类情境的人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他具有影响力的关于“好客”[①]和“世界性”的著作[②]中，谈到了围绕外来者所形成的模糊不清的状态，认为外来者被视为客人和敌对的人，也就是好客的极限之后会进入不友善状态。也有几位城市学家强调了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趋势：由于在空间上的相叠与互动，城市中的不同想象与实践，相互接触又产生矛盾。[③]从这一点看，满洲里看起来像政治场景，城市居民与非居民（俄国人）分享场地和空间，双方均主张自己该享有的权益，在不断协商的过程中争取国际城市的空间享有权。满洲里居住者的人种和地域属性的多元，说明其成员资格和认同的形成是协商的、不稳定的、易变的过程。城市中出现的俄罗斯游客认为满洲里也应属于自己，从而重新塑造了这座城市的社会关系和空间构成。

---

① Jacques Derrida, “Hostipitality”, *Angelaki: Journal of the Theoretical Humanities*, 2000，Vol.5, No.3, pp.3-18.

② Jacques Derrida, *On 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1.

③ Ash Amin, “Ethnicity and the Multicultural city: living with divers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2002, Vol.34, No.6, pp. 959-980; Engin F. Isin, “City State: Critique of scalar thought”, *Citizenship Studies*, 2007, Vol.11, No.2, pp.211-228; Engin F. Isin, “Theorizing Acts of Citizenship”, in Engin F. Isin and Greg M. Nielsen (eds.), *Acts of Citizenship*,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2008, pp.15-43; Michael Keith, *After the cosmopolitan ? Multicultural cities and the future of racism*,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图 2 满洲里建筑欧式风格的外立面装饰（摄于 2011 年）

为了创造“对外友好的气氛”，整个城市的空间采用了亲俄罗斯模式。为体现“对俄罗斯人友好”，不仅包括店铺牌匾和街道名称使用中文和西里尔字母标注，而且城市的整个建筑风格、街道雕塑和房屋正面装饰都采用了类似于俄罗斯的风格及所谓的欧洲风格（如图 2 所示）。与此同时，语言交流也迎合俄罗斯客人，作为主人，当地人很快学习了俄语。他们使用的词汇有限但很有效，足够能与俄罗斯游客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并指引他们观光满洲里的大小商城和服务场所。当主人们为客人的方便，取用易于理解和记忆的俄文名字的时候，这种不对称的语言使用变得古怪和不平衡，如一位王先生取了“Саша”（是对 Александр 的昵称）的俄文名，程女士则被俄罗斯游客们称为“Маша”（是对 Мария 的昵称）。为区分几百名“Саша”和“Маша”，与俄罗斯游客做生意的中国人的俄文名字会被添加与买卖或体貌特征相关的绰号，如，“Маша-Тойота”是表示名为 Маша 的卖 Toyota 零部件的商人，“Саша Инструменты”是卖技术设备的人等等。在田野调查期间，

笔者记录的联系方式中充满了此类的中国商人的俄文绰号，“Таня-Порт”（一位女士在 Port 宾馆所经营的美容沙龙），“Коля-Adidas”（一位倒卖假冒阿迪达斯的商人），或者“Андрей Красавчик”（一位经营皮衣的商人被俄罗斯女性客人称作帅哥）。

为迎合游客之需，迅速使用俄文名字的不仅仅是满洲里的人，从城市大街小巷中的宾馆、购物中心、精品店、咖啡屋、餐馆甚至其菜单，均采用了中、俄文两种文字。显眼的俄文名称占据了各类招牌的绝大部分面积，中文被缩小搁置在角落。然而，不认识西里尔字母的中国人仍使用原有的中文名称，如“Порт”宾馆里集中了多种针对俄罗斯人的生意，其中文名称是“口岸”。对一个地方使用两种称谓，使得俄罗斯人与中国人在交流时也会产生很多困惑。事实上，两种称谓（俄语和汉语）的盛行，表明了一种社会现实，即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社会空间和人文地理的重叠、共存和冲突，下文中将进行相关阐述。

通过熟悉的视觉效果和服务把满洲里“设计”成符合俄罗斯人喜好的样子，迎合了观光者的需求，同时也给顾客创造了熟悉的购物环境。满洲里的购物设计深入挖掘了俄罗斯品牌的特点，并以此来吸引顾客，引导他们的选择和决定。有一处名为“Снежная Королева”（雪皇后 Snow Queen）的当地商家，其名称与莫斯科著名的皮草商城相关联。另一处名为“Связной”的商城，借用了俄罗斯驰名手机零售商的品牌名称。“Три Толстяка”（三个胖男人）的服装店盗用了俄罗斯连锁品牌的名称出售超大号的服饰。使用在俄罗斯广为人知的品牌，如儿童服饰和玩具的品牌“Детский Мир”（儿童世界）、汽车零件和护理用品品牌“За рулем”（掌舵者）等，都在利用俄罗斯游客对社会主义时代高质量产品的怀旧心理。

在满洲里出售的商品会考虑到一些俄罗斯人的特征，包括超大号的鞋、女士内衣和服装产品等，根据顾客的要求，被选购的商品可以通过货运公司寄送，这些货运公司会处理所有相关的进口手续。通常来说，他们会有一些法律框架之外的操作，并且在非正式的边贸地区处理这些事情。在宾馆和购物中心设立的各个现钞兑换点，能为俄罗斯人兑换各种不同的现钞：卢布、人民币、美元及欧元，为了游客的方便，甚至每一个点都提供 24 小时服务。

同时，在满洲里对俄罗斯人的热情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如德里达所揭示的，热情之余亦有厌恶相伴。[①]“悦纳异己”（亦是敌意之下的热情也是热情之下的敌意）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中国方面用短期签证来控制外国游客在华停留时间，同时划出一定的区域，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中国的热情好客。中方以此来体现对城市空间的掌控，说明游客能够主宰的区域仅仅是城市中的特定区域，是“俄罗斯区”，那里设有绝大多数面向俄罗斯游客的商城、宾馆、娱乐场所和俄语服务项目。

满洲里的俄罗斯区如同这一城市的公共区域，非中国公民可以在这里享受一定的特权生活，但并不是城市的所有区域都会成为外国游客的“避难所”。在俄罗斯区以外，失去熟悉的俄语环境的俄国游客会感到失落和迷茫。事实上，俄罗斯区与城市其他区域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仅隔一条街就是城市非旅游区域。俄罗斯游客去那些区域会感觉不方便，那里没有俄文标识，没有喧闹的俄语广告，然而商品价格却便宜而公道，城市建筑也脱去了浮夸的俄式装饰，街上则满是亚洲脸，其中偶尔点缀着几张欧洲面孔。

通过国家各类官方限制从外国游客那里夺回城市空间得以实现，例如，宾馆需要获得官方认可才可以接待外国游客，通常此类宾馆把房间价格定得很高。笔者亦有亲身经历，为了躲开嘈杂的游客和呼啸的酒驾车辆，笔者住进了位于俄罗斯区以外的区域，但有一天警察突击检查这家宾馆是否接待了外国游客。俄罗斯区以外的商店采取了不同的经营形式，他们不提供批发（大部分俄罗斯边境买卖人所需的）打折商品，而是以固定的价格销售优质的产品并出具发票。在本人印象里，与俄罗斯区相比，这里的买卖关系更有秩序和诚信，不会故意欺骗彼此，迪特尔·斯特恩（Dieter Stern）也曾写到，在俄罗斯区经常发生中国商人和俄罗斯客人之间的争吵。[②]

一次与满洲里当地人住宅区的商店老板刘先生（他没有给自己的俄文名字）聊天时，笔者说出了自己对俄罗斯区外“秩序”的惊讶，他很高兴地解释说，只有外省人才会冒险去与外国人做生意，因为外省人到满洲里后缺乏

---

① Jacques Derrida, *On 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1.

② Dieter Stern, “‘Nado minimum!’-mediating respectability at informal markets on the Russian-Chinese border”, *Inner Asia*, 2015, Vol.17, No.1, pp.5-30.

当地的关系，也没有当地的户口。他觉得在当地人的印象里，来自外省的买卖人是“被排斥的人”，是因为他们在家乡找不到工作或者事业没有起色才来到这里碰运气。他认为外省人的诡计多端与野蛮无礼的程度可与俄罗斯人相匹敌，生意双方都是一些道德素质很低、奸诈、企图非法获取利益的人。他的这一观点的形成，部分原因是，21 世纪初他到俄罗斯赤塔（Чита，地区首府城市）旅游，被威胁要逮捕他的警察洗劫一空，而理由则说他是非法移民（нелегал），企图走私货物。他的个人见解也反映了当前中国道德与市场的公共话题，很多中国人都意识到了道德的衰败，认为市场经济的不良因素引发了公共道德的下降。[①]与俄罗斯人做生意，在刘先生看来，太危险，不值得去尝试。他乐于在当地居民区做买卖，互相知根知底，像邻居一样。

在满洲里，社会空间显得有所不同，那些陌生人——俄罗斯人（完全陌生的人）或外省人（城市公民中的特殊部分）到满洲里后集中于俄罗斯区，一个特殊的隔离区，这使得满洲里的族群和社会分层两极分化，但同时也能看到满洲里在社会和族群分隔方面演化出了自己的模式。这使城市理论的专家们有了更多的讨论，他们假定经济上的不平等使其出现了歧视和空间结构的机制化，创造了居住格局上的分隔。[②]满洲里的例子表明，这里居住模式是基于很特殊的规则和独特的劳动力市场。非居民的高流动性与“临时客人”的状态可能是为什么客人宁愿选择俄罗斯区停留的原因。俄罗斯游客在此区域是因为他们别无其他选择，而中国的外省人是因为他们住在自己的商店里，这里既是工作的地方亦是休息的地方，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在满洲里租或买可居住的房子，商店就成了整个家庭生活的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买卖人中间很普遍。夜晚降临时，他们会把床垫拿出来铺在地板上准备休息。当夜幕降临、商场里拥挤的游客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结束一天功课后嬉闹的学生和准备晚餐以及寝具的父母，一家人就会在满是货物的透明玻璃商铺里进入梦乡。那些推拿、桑拿房以及美容沙龙结束一天的营业后，又成为员

① John J. Hanafin, “Morality and the Market in China: Some Contemporary View”,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2002, Vol.12, No.1, pp.1-18.
② Thomas Maloutas and Kuniko Fujita,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context”, in Thomas Maloutas and Kuniko Fujita (ed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aking sense of Contextual Diversity*, Ashgate, 2012, pp.1-36.

工晚上休息的居所。有些居民住宅晚上也会成为非法留宿外国游客的场所，跨境买卖人中也有看起来不像欧洲人的面孔（其大部分来自蒙古国或俄罗斯的亚洲区），他们利用自己的亚洲人长相可以找到便宜的住处。有一次，笔者就住进了这样的地方，与另外三名跨境女性买卖人共用一间卧室，她们来自雅库特（Якутия），她们也是笔者的访谈对象，这次我们一起在满洲里度过了许多时光。

从满洲里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主导的对俄罗斯游客的热情接纳，实际上，从市场经济角度讲，这是对境外游客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利用游客的非公民身份，甚至他们的“他者”外貌来获取高额利润。境外游客在食宿及其他社会服务方面需要比当地人支付更多。在俄罗斯区，高租金和雇用会俄语的员工，也影响着成本。这样，满洲里作为一个活跃的、有着不一样区域的地方，其殷勤好客也是有局限的。这里对境外游客殷勤好客的宗旨是：“你的价值取决于你的消费”。[①]

## 俄罗斯区的女性经济

### 外来者的身材和脸

对俄罗斯游客行为的限制，一方面是作为提示，另一方面亦在鼓励其成为自己区域的主人，仿佛这一区域是在中国之外。讽刺的是，满洲里在历史上曾是“失去的地方”，是上世纪初沙俄修建的中东铁路上的车站之一。尽管后来归还了中国，但在许多俄罗斯人的帝国想象中，这里依然属于俄罗斯。在俄罗斯区有保存完好的俄式木头房子，这是之前的火车站所在地，按老照片中恢复重建的帝国建筑式样的宾馆“Харбин”，使沙俄时期的满洲里跃然于现实之中。

笔者曾多次从俄罗斯游客那里听到这种说法：“不仅满洲里过去属于他们，而且现在仍属于他们，因为那里所有的东西都用我们的钱建立起来的。”

---

① 2014 年底爆发的货币危机使俄罗斯在与中国的边境贸易中变得无利可图，2015 年初俄罗斯客户服务业减少了 50%。这使得满洲里俄罗斯区的商场和酒店一半处于空闲状态。俄罗斯区的萎缩也影响了满洲里的城市空间，重新组合了城市居民的构成，很多外省人离开了满洲里前往南方。但满洲里与邻国的边贸仍然欣欣向荣。

他们声称，在过去二十年里，如果没有他们的消费，满洲里奇迹般的繁荣景象不会出现。他们与中国人一样，对这座城市的兴起有着同样的投入和贡献。为了强调满洲里也属于他们，给满洲里起了叫“Маньчжурка”或“Манька”的绰号，把他们平常去满洲里旅游叫“去趟 Manzhurka”（сгонять в Маньчжурку），他们并不在乎近乎两天的长途跋涉和乘火车、汽车的旅途劳顿。

下面一位俄罗斯游客的例子正说明了俄罗斯人对满洲里的情感羁绊：

“比起去莫斯科，我们更愿意常去中国，那里价廉又方便。说实话，中国人对待我们的态度比莫斯科要好多了。（在那里）我们得到了尊重，而不是被当成乡巴佬。我有两年时间在边境上服兵役，一直通过坦克望远镜观察满洲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二十五年前，这里是一座尘土飞扬的小镇，遗落在蒙古草原的尽头，没有一点生机。当时这里只有三层的楼房曾经是我们炮兵训练的最高地标。今天的满洲里是一座完全不同的城市，我在这里比在莫斯科更舒服。我对自己所看到的满洲里的变化印象深刻，中国人在‘该死的’光秃秃的两座陡峭的山脉之间营造了一片绿洲。”[①]

另一位跨境买卖人在中国记者的采访中谈到，[②]“满洲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意思是她在这里度过了与她在几百里以外的自己家乡克拉斯诺卡缅斯克（Краснокаменск）一样长的时间。作为导游，她总会在每个周末带旅游团来到满洲里，带他们光顾各类旅游点：白天逛商场，晚上回宾馆或去桑拿室、娱乐场所。这种模式也被中国经营者熟知，他们会为周末涌来的游客做好准备，学会依靠假期挣回大部分钱。下面是一位中国记者在俄罗斯区的观察：

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遍布这里所有的街道。如果不是因为商店里的中国特征，（你）肯定会想你现在是在俄罗斯。在工作日，他们工作挣钱，而在周末他们会来中国消费，享受美味，放松自己。这是邻居俄罗斯人来这里享受“周末天堂”的方式。有一位俄罗斯游客曾告诉我，“因美味和‘美价’，周末来这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所有的宾馆都很忙，游

① http://paidiev.livejournal.com/101245.html（上网时间：2015 年 4 月 30 日）
② http://English.cri.cn/6566/2011/10/20/1461s663596.htm（上网时间：2015 年 5 月 25 日）

客提前预约周末住的房间和服务项目。[①]

这段话介绍了满洲里旅游景象的另外一面，即他们把满洲里比作他们俄罗斯的家乡。有意思的是，大部分人感觉在满洲里要比在俄罗斯更舒服。在俄罗斯他们会感到不满和压力，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得到他们在俄罗斯得不到的东西：可承受的购物、殷勤待客以及释放压力的时间。

笔者已经谈到了殷勤待客和可承受的购物方面的内容，现在开始探讨俄罗斯游客愉悦的身体体验和释放压力方面的实践，尤其是女性跨境买卖人的感受和体验。

**满洲里走向“粉色”**

在满洲里，边境买卖的驱动者是俄罗斯女性，这是后苏联国家出现的值得关注的普遍现象，是社会过渡时期的非正规的边境交易过程。[②]同样，由女性主导的俄罗斯边境贸易的情况在中俄边境的其他地区也有所体现，就像在远东地区所呈现的一样。[③]此外，如笔者所观察到的，这种性别上的不对称，也削弱了一些男女性别角色的期待。在满洲里，女人不仅仅购物，也为了将采购好的货物过境，背着沉重的货物过海关检查、帮司机装卸等。在酒店喝酒、唱歌、跳舞的人群中，占多数的是女性。笔者所参加的周末跨境采购团的例子能够说明这种严重的性别不对称。这个团共有十个成员，其中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有 8 名，两名男士（司机和其中一位女性的丈夫）。笔者跟着这个团看到了她们眼里的满洲里，理解了女性在采购过程中是如何根据自

---

① http://news.xinhuanet.com/life/2007-07/12/content_6362518.htm（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2 日）

② Olga Davydova and Pirjo Pöllänen, “Border crossing from the Ethnosexual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he Finnish-Russian Border”, 2011, *Eurasia Border Review*, Vol.2, No.1, pp. 73-87; G. Ozcan, “Djamila’s Journey from Kolkhoz to Bazaar: Female Entrepreneurs in Kyrgyzstan”, in F.Welter (ed.),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 Transition*, Aldershot: Ashgate, 2006, pp.93-115; Anna Cieślewska, “From shuttle trader to businesswomen: The informal bazaar economy in Kyrgyzstan”, in Jeremy Morris and Abel Polese (eds.), *The informal Post-Socialist Economy: Embedded practices and livelihood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4, pp.121- 134; Dmitry Zimin, Juha Kotilainen and Eugenia Prokhorova, “The Post-Soviet transformation of Svetogorsk and Kostamuksha”, in Heikki Eskelinen, Ilkka Liikanen and James W. Scott (eds.), *The EU – Russia Borderland: New context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BASEES/Routledge series on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84), 2013, pp. 151-166.

③ Tobias Holzlehner, “Trading against the State: Il/legal Cross-Border Networks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ETNOFOOR 26/1*, 2014, Border Issue: pp.13-38.

己的需要“利用”满洲里的。

在俄罗斯区，女性的身体展示随处可见，商店橱窗里和墙壁旁的塑料女性人体模特展示着前沿时尚，街上的广告牌上充斥着化妆品和面部整容的广告。在此情境中，真实的身体也在展示。当女性买卖人在商铺里试衣服时，她们不避讳赤裸身体的程度会让俄罗斯区的中国游客大吃一惊。因为商铺里的空间已经被成堆的商品、纸箱所占据，没有多余的空间腾出来给他们的顾客作为试衣间。害羞的顾客可以要求在一个角落里给她们遮掩一下，但大部分女性会直接在别的顾客面前更换衣服。她们裸露身体表明了对赤裸身体的另一种态度，使得俄罗斯区的商铺成了完美的窥视隐私部位的地点（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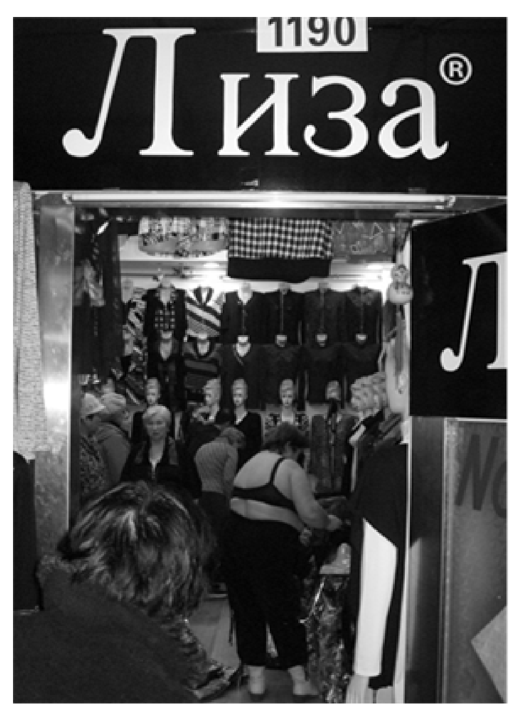



**图 3 满洲里的俄罗斯女性购物者（摄于 2013 年）**

在橱窗里，也会展示作为女性身体局部的塑料模型：展示帽子、假发、太阳镜、围巾的头部模型，戴着手套和陈列最新美甲款式的手部模型等。此

外，还有展示丝袜、裤子、袜子、裙子和鞋等的部位模型。这一裸露自己的身体并观察其他女性身体的过程，晚上依然在继续。女人们去做桑拿（或баня，一种打发时间的流行而民主的方式）、按摩洗浴，护理自己的身体。人们平常为自己做的事情主要是到一个私密的地方洗浴，在一个充满热气和水雾的地方，半裸的中国女性在并排的滑轮式床铺之间工作，为躺在床上的外国女性身体提供深度清洁、熏蒸、去除死皮等的服务。不同的洗浴工具包含着不同的护理程序，整个过程中会在顾客身体上多次喷洒热水。经过对身体的清洁和洗浴之后会进入下一个阶段——按摩，对脚、后背、头部、颈肩、手臂和手指等身体的不同部位进行适度的拉伸、扭动、挤压、推拿等，使身体在各种揉捏的过程中得以更新和放松。当身体进入这一程序后，根据客户需要，会以高价提供各种类型的非外科美容疗程，如面部松弛皮肤处理、美白、面部肉毒杆菌注射、延长睫毛、纹眼线、纹眉、纹唇、美甲、足部保养、修剪或护染、嫁接头发等。

这类非外科美容疗程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连同新的裙装、鞋子，女人们可以在酒店或夜总会里立刻去展示自己的新面貌。在满洲里俄罗斯区，有好几处这样的夜总会，在俄罗斯女性游客中很受欢迎。一处名为“Maxim”的夜总被认为是最好的。在这里，女人们踩着高跟鞋，画着浓妆，穿着时尚性感。吃饭、跳舞、抽烟等间歇时间与俄罗斯游客攀谈，给笔者提供了观察他们在满洲里消费方式的良机。

就餐时，笔者曾采访过邻座开庆生派对的人们。他们是从两百公里外的克拉斯诺卡缅斯克来这里的，此次把购物与派对结合在了一起。过生日的女孩叫莱纳，是位三十岁左右的女性。她告诉我，与其家乡相比，她宁愿在满洲里举行生日派对，这里既便宜又有很多休闲娱乐的地方。拉斯诺卡缅斯克是一个很小的工业城镇，破旧的马路、近乎废弃的铀加工厂、高污染、高死亡率。她指着自己身上的迪士尼公主式样的长裙说，“我来这里散心，顺便买些裙子”。这条长裙的确使得她的身材显得更出众。这使笔者想起了灰姑娘的故事。莱纳生活的家乡小镇如同灰姑娘不得不面对的繁重的日常生活。但尽管如此，她一直在向往着霓虹灯和舞曲。这也是莱纳在这一周末在满洲里所得到的，城市明亮的街灯和丰富的夜生活，在这里从服装到感受，她可

以体会真正公主的待遇。

这个例子（同其他个案一起）表明许多女性到满洲里旅游度假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娱乐和放松，从日常生活中暂时解放出来。周末结束，笔者所在的团返回俄罗斯边境时，一位游伴说：

这次我（在满洲里）在自己身上花了很多钱——我爱我自己！

她认为，这不仅是护理自己的身体以及买新衣服、化妆品等，而是对自己的美丽外表投资。她与笔者坐在同一辆小车里，观察她的脸，发现了以下变化：她的脸看起来很奇怪，脸上的一些部位还在肿胀，还有正消退的划痕以及她纹过的嘴唇太红、太鲜艳，而且眼线纹得颜色过深。在笔者看来，经过“修饰”后，她变得更粗俗，比之前更老了。但她很开心，等回到乌兰—乌德的家，过一周之后她的脸部才能恢复正常，那时会积极地展示自己的美。一路上女人们谈论着各种热门品牌化妆品和脸部整形。

同时，一群人中的其他人还在谈论，她们如何善待了自己，如美甲、接发以及新的鞋子、手袋、上衣等。跟随着这些很敬业的女性，笔者度过了一周时间，发现在她们理解里，物质的获得与美直接相关，这促动了她们的消费行为。[①]据我所知，从她们的眼睛可以看到，有些人已经在盘算，是否能够缩减一些开支，为下一次的整形治疗投资，例如与同伴一起，用再一次的满洲里之行来奖励自己。

**“肉毒杆菌，这里的最好！”**

对整形手术，尤其是脸部的整形，是关系到隐私的敏感话题。从羞愧中所表露的主体性与社会自我这一角度，值得从人类学和心理学研究视角深刻探讨。[②]女权主义研究中，倾向于较为极端的视角，有一种观点把这看作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这是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和对女性身体的利用。凯瑟琳 •摩根（Kathryn Pauly Morgan）在其著作《女人和刀：整形手术与对女性身体的殖民》（1991）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她认为，女人“去挨刀”的决

① 这次笔者的旅程共七天，头两天是坐小型班车从东西伯利亚乌兰—乌德（Ulan-Ude）到满洲里，在这里停留了三天，然后用两天时间回乌兰—乌德。

② Michael Taussig, *Beauty and the Beas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2012; Jane Megan Northrop, *Reflecting on Cosmetic Surgery: Body image, shame and narcissism*,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2.

定，来源于她们想用年轻漂亮的外表去取悦男人。也有人认为，整形手术可能因使女性感觉被解放和自主权的增强而出现，[①]整形手术事实上与自我认同之间的联系要多于美丽。然而，如女性跨境买卖人透露给笔者的内容，每一个个案都综合了这些观点。

经过对女性之间对美的探讨的长期跟踪，使笔者看到的是她们之间对美容治疗细节的频繁的讨论，如，在满洲里她们做了哪些脸部整形，金线和铂金线的哪一种脸部去皱效果好，去年对某一项治疗的最后价格，哪里的Lantox（中国较便宜的替代肉毒杆菌的药物）的效果与肉毒杆菌效果一样好，等等，末了还会谈论手术之后的预期效果。与对方分享好与坏的信息仿佛成了交友、互助的方式，帮助“新来的”去探索满洲里，并使满洲里适应她们的消费方式。下面引用笔者与她们谈话中的一些内容和她们从当地“女性频道”中得到的信息。

关于按摩沙龙：

> 请不要选择随意的地方做按摩，尤其在宾馆。那些年轻女孩的按摩是无用的，她们毛手毛脚的，我能介绍给你我的按摩师，非常好。好几天前我就预约了在满洲里的这三天的内容，在晚上按摩和针灸。

关于肉毒杆菌的注射：

> Лиля（一位中国的美容师）搬到了 Интурист 宾馆，她给我纹过很多次唇，这次收费较高。但经过还价，她给我优惠了一些，尤其是如果你能带其他的顾客过来，会更便宜。尽管如此，与俄罗斯相比这里已经很便宜了。在她店里我也染过头发，做过护理。看，现在我的头发看起来有光泽、健康。现在 Lilia 有了很多顾客，所以她开始做真正的肉毒杆菌注射了，不用便宜的 Lantex。这里的肉毒杆菌是最好的，我们一堆女人都在这里注射。

关于 Lantox 注射：

> 姑娘们，不要图便宜选择便宜的 Lantox。我有一个坏消息，关于我朋友的，她只想让自己的眼袋变得浅一点，但是 Lantox 与肉毒杆菌的

① Kathy Davis, *Reshaping the Female Body: The Dilemma of Cosmetic surgery*,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5; Jane Megan Northrop, *Reflecting on Cosmetic Surgery: Body image, shame and narcissism*,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2.

作用方式不一样，现在她眼睛周围的肌肉都僵住了，并影响了她的视力，她看起来像是被注射了人造 Lantox。这是在那个叫“Алина”的美容沙龙里做的，就在 Фарбин 宾馆的前面。

分享坏消息：

Beauty 沙龙的 Нина 是一个混蛋（дрянь）！千万别去那里，只想着挣钱。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很差劲，比如手、足护理以及糟糕的纹唇技术，纹后第三天就掉颜色了，我还在回家的火车上呢。你知道的，纹唇是很疼的，付两次钱不说，还要疼两次。那里收费一点都不低，纹的时候还那么疼，居然没有效果。糟蹋了我的脸！（все дерьмо на лице）。

另一则坏消息：

我的朋友在“Порт”做了接发，我们是想尝试一楼的新开业的美容沙龙。但是整个处理过程太匆忙，一点都不到位。第二天早晨我在宾馆吃早饭时，接的头发都掉到我的餐盘里了。我们把这个拿到了那个沙龙，那个中国人又给我们接好，并央求原谅。但回到家洗了几次之后，接头部分的颜色和形状都变了，我不得不剪短我的头发，去掉这个恶心的接发。可惜的是浪费了那三百卢布，什么都没能换回来，还毁了我的头发！①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非外科脸部整容治疗、药物脱皮、去死皮等类似治疗之后无一例外都会引起一些淤痕、红肿。通常女性会很在意形象，不愿暴露红肿的脸，治疗之后在几周之内会过较隐秘的生活。但迫于短期的满洲里旅行时间，笔者看到很多女性脖子上缠着绷带，堆着淤青，红肿着脸，满街购物来回于酒店之间。在一次聊天中，一位女性告诉我，当他第一次治疗的时候，她实在不好意思离开宾馆，但她朋友的话鼓励了她：人们能从你的脸看到你到底投入了多少钱来修整你的脸。

因此，在她朋友看来，向他人展示自己脸部的治疗，是表现经济实力的一种方式，表明她有能力给予自己治疗，“能为自己花钱”。在这一点上，使其脸变形的淤青和红肿，事实上成了她的经济实力的一个象征。

特殊的整形手术目前在满洲里还没有开始做。那些想吸脂、隆胸、隆鼻

① 根据 2013 年夏天货币兑换价格，3000 卢布等于 50 英镑。

或做眼部整形的人需要到更大的城市，如哈尔滨、北京等，或者去韩国。[①] 据女人们的谈论，在俄罗斯区唯一能够做的手术是人工流产。因为这个手术的敏感性，在情感上是很难接受的话题，所以女性之间的讨论也都是谈他人的经历而不是自己的。但俄罗斯区频繁出现的终止妊娠类的广告表明，这一项服务不缺顾客。广告中显示对妊娠的终止不只是手术的形式，通过非手术形式如针灸、药物、注射等可以终止从胚胎到后期的不同阶段的妊娠。非手术的妊娠终止似乎有着很高的需求，这类广告在美容沙龙价目单中很常见。在药店甚至发廊都贴有减肥药物、中国减肥茶、美白面膜以及其他与身体和健康护理相关的物品。

毕竟关于美化、清洁女性身体的话题，在满洲里有着自私、悲哀的背景。这反映了俄罗斯女性现在灾难性的和令人悲哀的处境。不管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还是怕把怀孕的事实在自己的小村庄公之于众，女人们总是在跨境去中国接受并不安全的人工流产。在俄罗斯区，当一部分人还在逛街购物，进行时尚、享受的旅途时，另一些人则在宾馆的地下室里，在不够卫生的环境中，接受非专业的对外国女性身体的“清洁”和重塑。最近有所增长的俄罗斯堕胎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使人悲伤的事实，据统计，堕胎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出生数量。[②]据世界数据统计，只有中国的堕胎数量大于俄罗斯，但在人均堕胎数量上，俄罗斯超过了中国。如果把在中国境内的非法堕胎数量加入统计，比如在满洲里的数量，俄罗斯会出现更为糟糕的数据。

## 丑与美之间：雅戛婆婆（Баба Яна）和美人瓦西里萨（Василиса）

“美丽不再是上天的礼物”，这是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ng）在他的作品 《美女与野兽》中的著名论断。如他所谈到的令人沮丧的例子，“美容已经严重地走向歧途”，陶西格从哥伦比亚的田野（调查）点上引用了多个例子，那里整容手术变得很普遍，不仅在富人当中，在城镇贫穷的年

① 高加索式的美作为理想型的美，促使很多拥有亚洲脸的女性从俄罗斯旅行到中国或韩国接受整形手术，以得到渴望的欧洲式的脸部特征。

② 此项数据由女性NGO “Mercy”(miloserdie)提供。https://www.miloserdie.ru/aborty-v-rossii-kak-rasstatsya-s-pozornym-liderstvom/（2015 年 7 月 2 日）

轻女性中也很普遍。她们认为这样可以改善他们的社会、经济处境。

“与童话故事中的美好结局不同，在这里，Jack捅破了那个巨大而美丽的泡沫，让野兽重现在英俊的王子身上。我从哥伦比亚农业综合企业贫民区带来的故事暴露了美丽的阴暗面。为变美而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不幸故事占据了令人沮丧的分量——丰胸引起了感染并切除乳房，眼部整形并未能变成大眼睛，反而使其不管日夜都无法合眼，面部去皱手术则让人最骄傲的部位扭曲成惊悚片中的丑陋形态，脖子上的青筋像马戏团帐篷的支撑架，提臀和丰臀的填充物可能会慢慢下滑到腿部或者有可能要人的命……不仅吸出脂肪，也可能在手术台麻醉的过程中被要了命，或者手术一两天后脱盐而死。”①

跟着跨境购物、“订购美丽”的女性群体，当她们讨论满洲里之行时，笔者也听到了很多类似的故事，灾难在这里继续。实际上，她们花钱买的是包裹在“热情”、“舒适”、“可承担”之下的“丑陋”和虚假服务。中国买卖人出售的是仿冒名牌的产品，如 Adidas、Nokia、Chanel 以及其他世界名牌，因为有足够数量的顾客来购买这些仿冒品，根本不在乎那是质量低下的仿冒品。吸引人的价格——“美价”，使消费者变得很盲目。与此相似，在整形手术中，女性消费者们应该知道，昂贵的质优产品她们无法负担，所以冒风险去购买低质量的产品。“经济”型意味着，这个服务无论好坏，在是否危害健康方面没有任何承诺。如果她们已经购买过假冒的 Chanel，为什么不去买便宜的 Lantex 去代替肉毒杆菌呢！那些出售者应该为顾客注射次品而可能发生的面瘫而担心吗？而那些顾客会关注一次眼部去皱的注射可能使自己变成半个瞎子的风险吗？这种假冒的、便宜的美丽仍然算作美？！

当陶西格探讨那些英雄的脸和身体的改变时，用到了《美女与野兽》这一寓言故事。我讲述的变形记则选择了另外一个民间故事的主人，雅戛婆婆（баба Яга）和美人瓦西里萨（Василиса），在俄罗斯非常流行的两个童话人物形象。瓦西里萨是一名年轻、美丽的姑娘，与灰姑娘（Cinderella）有着相同的经历。雅戛婆婆是一个凶恶、丑陋的老女人，在尘土中飞来飞去，挥

① Michael Taussig, *Beauty and the Beas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7

舞着杵子，住在森林深处破旧的搭在鸡爪上的木屋里[①]。这个故事形象可被套用在到满洲里改变形象的女性身上。一次在从满洲里回去，同路的一位女性，照完镜子后满意地说，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像雅戛婆婆，回去的时候变成了美人瓦西里萨[②]。

这位女士的比喻很有意思并发人深省，她把自己划分到相反的、可变化的两个角色里：一个是丑陋、老太的雅戛婆婆，认为这是自己到满洲里之前的形象；另一个是美丽的瓦西里萨，是在满洲里从又老又丑的状态转变到了年轻漂亮的现在的自己。显然，笔者的同行人是一个幸运的例子，她在满洲里的整容找到了“对的”路子，得到了她所期待的。她处于富有魅力的阶段，但“赐福”的效果是短暂的，她会慢慢变回年迈的状态：纹出来的眼线和眉毛会掉色，接上去的头发会掉落，发根会生长出灰白的头发，皱纹会增加，做好的指甲会出现划痕变得暗淡。最后，她仍然会转入雅戛婆婆，住在偏远的村庄或小镇，在森林深处承受压抑、艰难的生活。因此她又不得不光顾满洲里，接受神奇的改变，到满洲里之前和之后，她的生活将进入一种上升与跌落的循环。

然而，注射使脸部扭曲，纹过之后嘴唇和眼皮感染肿胀，接发的发胶毁了头发，此时，对那些不得不面对镜子里的自己的女性来说，“我回来时却比雅戛婆婆还要难看”，她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问题是，雅戛婆婆除了外表上的难看之外，在斯拉夫和俄罗斯神话故事里，雅戛婆婆还有另外有份量的哲学遗产，她表达了女人成为母亲之后的消极的一面：她是把孩子扔进大锅烹煮的形象。在学术界，尤其是通过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视角，如安德烈亚斯·琼斯（Andreas Johns）在其“雅戛婆婆：俄罗斯民间故事中一种母亲与女巫之间的角色”一文中认为，雅戛婆婆反映了母亲和孩子之间关系以及母亲角色消极的一面。[③]到满洲里终止孕期的女性或许会在回家的路上感受到

---

① 在多个理论中将把 Baba Yaga 广泛地与混沌的、原始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很多研究者认为她是“……月亮、死亡、冬天、蛇、Bits、地母、图腾母系氏族祖先或生殖母亲”。一些学者认为，Baba Yaga 是俄罗斯民间故事中一位凶狠的母亲和女巫。

② “приезжаю бабой Ягой, уезжаю Василисой прекрасной”

③ Andreas Johns, *Baba Yaga: The Ambiguous Mother and Witch of the Russian Folktale*,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4.

这种消极情绪，认为自己是雅戛婆婆，杀掉了自己未出生的孩子。导游瑞玛（Rima）经常带团从外贝加尔地区一个村庄到满洲里，有一次给我讲了一个跨境冒险的故事，是她所带团的成员，旅游目的很明显是到满洲里堕胎。当一行人回去的时候，她因路上突然流血而哭泣不止，其他所有的乘客都震惊了，对她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疑惑不解。瑞玛说，一个中国的针灸专家向这位姑娘保证，妊娠会在针灸后的 24 小时之后终止。但后续的痉挛、阵痛来得晚，在回家的路上，她的身体经不起路上的颠簸。不管怎样，他们带着迷惑继续赶路。堕了胎之后那个姑娘一直哭，一行人中有的选择了沉默，而有的人仍在讨论他们周末在“天堂”购物的体验。也许他们中仍然有的人感觉变成了美女回家，有的人则觉得自己变成了丑八怪。



**图 4  满洲里的俄罗斯套娃雕像（摄于 2010 年）**

被称作世界上最大的俄式套娃的雕像（见图 4），屹立在满洲里，欢迎俄罗斯游客跨境来旅游。她被放置在游客集中的公园，高出了俄罗斯区其他所有俄式风格的雕像，她巨大的尺寸仿佛在表明，这里的主角是俄罗斯女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套娃雕像，粗线条加鲜艳的色彩，白天她的脸闪烁着明亮的颜色，夜晚在灯光的照耀下吸引了很多飞蛾，它们烧伤了翅

膀，但一季又一季，经过春雨秋风夏日冬雪之后，套娃会褪色，变得苍白。因此，每一个春天经几天的维修之后，她会以新的光鲜的色彩登场。从外地移民到这里的工人会对她的外表进行处理，去除尘土、雨渍，给她画上新的脸、眼睛和鼻子，他们给她纹好眉毛、睫毛和头发，给嘴唇、脖子涂上色彩，并画好新的衣服。每一个春天，她都会被这样挽救一次。每天在她的视线里穿梭着载满游客的客车、汽车、火车，奔波于俄罗斯和满洲里之间。如同那些扑火的飞蛾，女性来到这里，被称作“游客天堂”的城市的斑斓色彩所吸引，想象着她们在这里能够获得和享受的那种可能性和力量。

## 结　语

文中虽然谈到的是满洲里跨境女性买卖人的故事，但阐述包含了多个方面，笔者从边界如何形成这一角度探讨了所呈现出的现实与经验。用自下而上的角度、自上而下的方法，分析了日益增多的医疗美容旅游现象。悦纳异己（hospitality）的理论思路，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国际和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如何作用于中俄边境，促使人们跨境到中国边境城市。

霍斯廷•多曼（Hasting Domman）和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M. Wilson）曾提到边境地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类活动区域，这一活动不可能因边境线而终止”，并建议边境应该被视为持续性压力的来源。[①]俄罗斯女性在满洲里所创造的情感景观，不管是她们日常生活还是她们的全部经历（均乐观面对悲哀），都在说明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区域多年的频繁往来，创造了满洲里独特的所属感。满洲里对俄罗斯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甚至比他们的家乡还要强烈），因此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大把的钱去成就中国城市满洲里的现代化。地理学家在认识到土地的社会属性的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了作为文化属性的空间所属感，正如同女权主义地理学家朵瑞斯·华斯沃尔特（Doris Wastl-Walter）和莱恩·斯蒂赫利（Lynn Staeheli）所说的那样：

---

① Hastings Donnan and Thomas M. Wilson, “Ethnography, security and the ‘frontier effect’ in borderlands”, in *Borderlands: Ethnographic approaches to Security, Power, and Identity*,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10, p.7.

有时地域的文化所属感可能通过好的经验而形成，但应该也有因不好的经验而形成的非所属感。这所有的一切与社会性别有关。[①]

根据这样的逻辑，难道俄罗斯女性之所以对于满洲里产生归属感，是由于她们在这里购物、美容之旅的良好经验，特别是在与俄罗斯经济危机形成对比的情况下形成更加强烈的感受？或者是说由于俄罗斯的经济失衡与危机，迫使她们通过在满洲里的边境贸易获得额外收入，在他们眼中，满洲里正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和繁荣的地方，而他们自己家乡的状况却毫无改善的希望，从而造成他们对于家乡的归属感减弱（或者说无归属感增加）的结果？

她们把满洲里当作“天堂”，也可能与其“地狱”般的家乡的对比有关。这使得部分满洲里的区域（俄罗斯区）成了“庇护所”。在回去面对她们艰难的生活之前，在这里，她们可以得到暂时的庇护和休养？如果这一切是真的，在这一点上，满洲里也可以被喻为“逃城”。这是德里达在 2001 年从圣经“逃城”中还原的概念，那里不会有人被视为像客人一样的暂时避难的人。俄罗斯女性通过在满洲里的消费和共享，表达了自己对在俄罗斯所处境况的不满。

（陈红 译　封帅 校）

【**Abstract**】The successful urbanization of a Chinese border city Manzhouli to a great extent resulted from official politics of *hospitality* to attract more foreign tourists. But the mass presence of foreigners also evokes classical situation of *hostipitality* (hospitable hostility) and socio-spatial separation of the city between citizens and non-citizens. In looking at how Russian women, who constitute the majority among tourists, visit Manzhouli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y create a mythology out of their beautification there, I take my cue from Derrida’s ideas of the utopian *city of refuge* to argue that in Manzhouli, women

① Doris Wastl-Walter and Lynn A. Staeheli, “Territory, Territoriality, and Boundaries”, in Lynn Staeheli, Eleonore Kofman, Linda J. Peake (eds.), *Mapping Women, Making Politic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Geography*,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p.142.

find a temporal asylum where they get emotional recovery and revitalize their bodies, thus showing their disagreement with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Russia, by consuming in China. This ethn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beauty consumption among female border crossers situates gender specific practices at the Russia-China border in the wider research of the borders in North Asia.

【**Key Words**】Sino-Russian relations, the Sino-Russian border trade, the Russians in Manchuria, Russian women

【**Аннотация**】Успех урбанизации приграничного города Китая Маньчжурии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зависит от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теплого приём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туристов.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это достижение процесса урбанизаци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внезапное появление большого числа иностранцев также вызвало описываемую в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ситуацию «гостеприимства»,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в разделению городских и негородских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ие женщины являются основн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туризма Манчжурии. Здесь россий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обрели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улучшения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и внешнего вида, демонстрируя сво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и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они тем самым выражают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состояние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на основе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требления продуктов идустрии красоты женщинам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произведена попытка связать модели особых гендерные практик с обширны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ов северной Аз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играничная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яне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женщины

（责任编辑 李恪）

# 模仿性竞争：以中俄边境城市的建筑演化为例

碧法兰*

**【内容提要】**黑河和布拉戈维申斯克这两个边境城市，地理位置接近。由于经济合作密切，两个城市正在经历着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反映在城市建筑上，它们正在逐渐地采用相似的城市理念和建筑风格，变得更加趋同。通过仿造俄罗斯的标志，黑河向中国游客提供了一种“微型的俄罗斯旅游体验”。布拉戈维申斯克则似乎较为保守，但这座俄罗斯城市并没有免受来自她的邻居的文化影响，其中国元素在不经意间不断充实。这两座城市通过彼此之间的借鉴、对话和模仿，已经产生了许多交叉点。

**【关键词】**中俄边境城市　中俄边境城市建筑　中俄跨境交流

**【中图分类号】**D851.2；D814.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3-0122(18)

位于中俄边境上的黑河和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veshchensk）这两座城市在许多方面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两座城市像它们一般，在地理上如此接近，却在外观和感受上如此不一样。几十年来，这两座城市之间的边界紧紧封闭着 ， 结果导致两边在很大程度上各自独立发展。[①]当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边境重新开放时，这两个文化（抑或甚至是“文明”）之间的断裂，成就了黑河和布拉戈维申斯克两座城市之间截然不同的风格：布拉戈维申斯克充满自信，街道与绿地呈网格状分布；黑河则金碧辉

* 碧法兰（Franck Billé），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所研究员。

① 这种情况对于布拉戈维申斯克尤其如此，因为黑河在边界开放之前只是一个小型的定居点。

煌，高楼林立。

两座城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对于城市学家以及人类学家来说都是颇具吸引力的，因为这种结构性差异表明了关于一座现代城市所应有的追求，而不同的样貌则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抱负和理念。政府机关、商业建筑或者公园位置的选择，广场、购物中心和其他社交场所[①]地段的分配，甚至划归汽车使用的场所[②]，都是一个城市构建其自身品牌、展现市场化身份的重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河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分别代表了中国和俄罗斯的文化，然而它们关于城市生活的核心概念和组织原则却大相径庭。不过，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以及经济上的合作关系，这两座城市正在经历着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过去几年的变化证明，它们正在逐渐地采用相似的城市理念和建筑风格，变得越来越趋同。随着黑河的快速发展，它在规模和重要性上日益与接壤的俄罗斯对手城市展开竞争，两者也开始争夺主导地位。诚然，如果说几十年以来俄罗斯是中国的“大哥”，今日的文化等级秩序却似乎正在发生逆转。

尽管乍看之下两座城市似乎并没有很多共同点，但实际情况是，彼此都在通过模仿和复制来相互借鉴。本文关于建筑层面上两者交叉影响的分析灵感来源于法国哲学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的著作。在一本关于模仿现象的著作中，吉拉尔认为竞争并不是双方对特定事物的欲望发生趋同的产物。一方对特定事物产生欲望，是因为那个事物被这一方的竞争对手所需要，也就是说，一个事物因为被需要（desired）才变得受欢迎（desirable）。[③]这种竞争十分关键，因为中俄边境是两个地缘政治大国之间的文化分界，而且中俄两国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崛起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全球雄心，尤其是在俄罗斯正日益孤立的背景下，使得黑河和布拉戈维申斯克之

①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在其重要著作中分析了城市广场的物理结构如何对社交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在公共广场上，沐浴在阳光下且远离风口的舒适长凳有助于人们彼此接近并展开交际。相反地，不那么友好的环境可以把公共广场变成闲置的城市空间，甚至成为犯罪活动发生的潜在场所。William H. Whyte,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 New York: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1980.

② Robert Venturi, Scott Brown, Denise & Izenour Steven,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The Forgotten Symbolism of Architectural For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77.

③ René Girard, *La violence et le sacré*,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10 [1972], pp.216-217.

间的边境竞争成为一股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回响的强大力量。

本文以这两个边境城市的发展作为分析的棱镜，因此涉及到区域发展、价值变迁以及文化和地缘政治定位等更宏大的概念。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城市化可以为进步和现代性这些更为模糊的理念提供有形的内容，而城市构造的变化则从根本上组成了内嵌着物质的利益和野心。在此意义上，中俄边境在过去二十年里所经历的城市化转变也是同时期该地区变迁的一个指标。

## 中国式复制

弥漫在黑河的俄罗斯风貌直接吸引着游客们来到这个快速发展的中国边境小城。街道指示牌同时使用俄文、英文和中文；大多数商店的招牌上有西里尔字母；不少俄罗斯主题的雕塑和纪念碑点缀着街道。很多建筑都让人想起俄罗斯风格，比如友谊宫（Palace of Friendship）便是这样。

在黑河的邻居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俄罗斯旁观者们看来，这些特征的形成是因为受到了商业驱动。采访对象和提供信息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使我确信，黑河的城市发展尤其能够吸引他们。[①]在他们眼中，用俄语字母书写的标志、俄罗斯套娃雕塑以及其他有俄罗斯特征的东西，使他们感到宾至如归，十分放松。这使他们更愿意在黑河停留，也因此而花更多的钱。

黑河的俄罗斯特质也让一些俄罗斯人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一个直接挑战，因为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某些城市元素被复制到了黑龙江对岸。对此有一个经常被提到的例子就是，在紧邻黑河的一个小岛上立起的摩天轮。它不仅是俄罗斯那边摩天轮的放大版，而且正对着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主街道，因此从这个俄罗斯城市的中心就可以看到它。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居民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有利位置。正如阿穆尔州立大学的一位年轻学生所说：“黑河建造的新摩天轮比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还要高一倍，就在‘十月革命 50 周年大街’（Улица 50 лет Октября）的正对面，所以当有人来到我们的城市时，他

①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站得住脚的假设，因为黑河是一个为了应对与俄罗斯的跨境贸易而诞生发展起来的新城市。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黑河还只是一个村子，而布拉戈维申斯克在 1858 年建立后便逐渐发展起来，此前这里是俄罗斯在黑龙江边的第一个定居点阿尔巴济诺（Albazino）要塞。

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的摩天轮。”

当然，这些复制行为深深扎根于一种更古老的东方主义话语，它把东亚人更多地描绘成复制者而不是创新者。按照惯例，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就被刻画成不过是一个对西方发明进行微缩复制的国家：没有能力发明创造，唯一的贡献据称就是拿来某种产品后缩小尺寸。[①]在过去的十年里，虽然方法与日本很不一样，但中国已经成了模仿和复制的头号国家。这一名声绝非空穴来风，因为有一整个产业支撑着淹没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仿造产品。这些假冒产品，用中国话说就是“山寨”，[②]覆盖了从电影、技术、时尚设计到艺术、建筑和处方药品的很大范围。中国仿造行为的法律层面是该进程的一个重要维度，并且已经成为近期不少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③]不过，我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首要目标是将模仿（而不是假冒或抄袭）的行为置于文化交流的中心来考察。

正如记者比安卡•博斯克(Bianca Bosker)所说，中国的仿造之所以如此兴盛，部分原因就是复制行为在中国并不像在西方那样具有负面含义。她谈到，西方“认为复制是由于制造者缺乏创造力和技术，并且被贴上不诚实的标签。”[④]虽然传统上中国文化也颂扬原创，但是复制的艺术也因为其技术成就而受到尊崇。[⑤]重要的一点是，复制曾一度被当作一种控制、驯服和占有

① 有西方人强调日本文化是一种微缩文化——可以想想盆栽——这种说法可以被解读为企图“减少”或“最小化”日本真实的经济与文化影响。日本通过“可爱”和“kawaii”（可愛い）的观念发展了自己的微缩文化，这同样可以被解读为对东方主义话语的主动借用和选择。关于微缩文化，参见 Susan Stewart, *On Longing: Narratives of the Miniature, the Gigantic, the Souvenir, the Collec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余华将山寨翻译为“copycat”：这个词的本意是指用栅栏或其他工事保护起来的山上的村寨，后来这个词语“获得了一个延伸含义，即穷人居住的内陆地区。它还一度指代强盗土匪的巢穴，而且这个词语一直有脱离官方控制获得自由的意味。”参见 Yu Hua, “山寨 Copycat”, in *China in Ten Words*, London: Duckworth Overlook, 2011, pp.181

③ 参考范例 José Carlos G. Aguiar, “They come from China: Pirate CDs in Mexico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eds. Gordon Mathews, Gustavo Lins Ribeiro and Carlos Alva Vega. London: Routledge, 2012;Yi-Chieh Jessica Lin, *Fake Stuff: China and the Rise of Counterfeit Goods*, London: Routledge, 2011.

④ Bianca Bosker, *Original Copies: Architectural Mimic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p.24.

⑤ 在中国的某些文化中，例如藏传佛教，复制的艺术受到极大尊崇并带有“功德”。

外来和遥远的事物的手段——这个过程被地理学家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称为“浓缩模仿”（mimetic condensation）。[①]事实上，意识到一点很有趣，即这些建筑复制所采用的模型都来源于西方，并且都来自那些在特定历史时期曾是对中国殖民的国家。[②]因此，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这些行为可以被解读成对其被殖民历史的重新挪用和超越。顺便提一句，我们也可以将矗立在黑河的巨型摩天轮看作是经济和文化等级体系逆转的象征，中国已经从俄罗斯的“小弟”变成了“聪明的大姐”（мудрая старшая сестра）。[③]

博斯克的研究特别从建筑方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模仿行为并非简单的再生产。甚至在忠实模仿的例子中，它们也经常包含中国人所拒绝放弃的关键的生活特点，比如说风水。总的来说，中国对建筑的模仿与其说是精确的复制，不如说是在创造一种特定的中国式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它在黑河有所体现，而在其他一些边境城市，如满洲里，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当然，模仿建筑不仅仅是一种边境城市的现象——上海郊外的德式安亭小镇、英式泰晤士小镇和瑞典式罗店镇都是很好的例子。

不过，这些上海郊外小镇的设计目的明显是为了营造一种生活在德国、英国或瑞典的感受，而像黑河和满洲里这样的边境小城却将自己塑造成临界地带，在这里，本土的中国风情与边界对面的文化相互缠绕并变得丰富起来。事实上，这些边境的临界现象已经大大超越了两个文化国度的边境相互重叠的理念。相反，它们倾向于大范围地吸收西方建筑遗产，包括希腊罗马风格（见图 1）。这些城市并没有进行忠实的复制，而是以俄罗斯为灵感来源，一方面营造一种愉快的环境来吸引俄罗斯消费者，但同时更重要的是吸引国内游客。在黑河，有一整条街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成排的商店出售各种俄罗斯纪念品（大部分是中国造）。通过复制俄罗斯的符号，黑河向中国游客

---

① Joseph Rykwert, *The Seduction of Place: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50.

② Bianca Bosker, *Original Copies: Architectural Mimic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pp.89-90.玛丽莲·艾维（Marilyn Ivy）在分析日本时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参见 Marilyn Ivy, *Discourses of the Vanishing: Modernity, Phantasm, Jap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6-7.

③ Андрей Пионтковский. Мудрая старшая сестра// Радио Свобода. 28.05.2014

提供了一种“迷你俄罗斯体验”。游客们可以搭乘黑龙江上的短途游船，并在返程途中购买黑河的俄罗斯商品，无须在空间上跨越河岸——这一过程包括取得国际护照，成本较高。在城市的边缘，一座具有标准俄罗斯风格的小镇也建了起来，以理想化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传统的俄罗斯风貌，搭配有风车、面包房甚至一座大教堂（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的缩小比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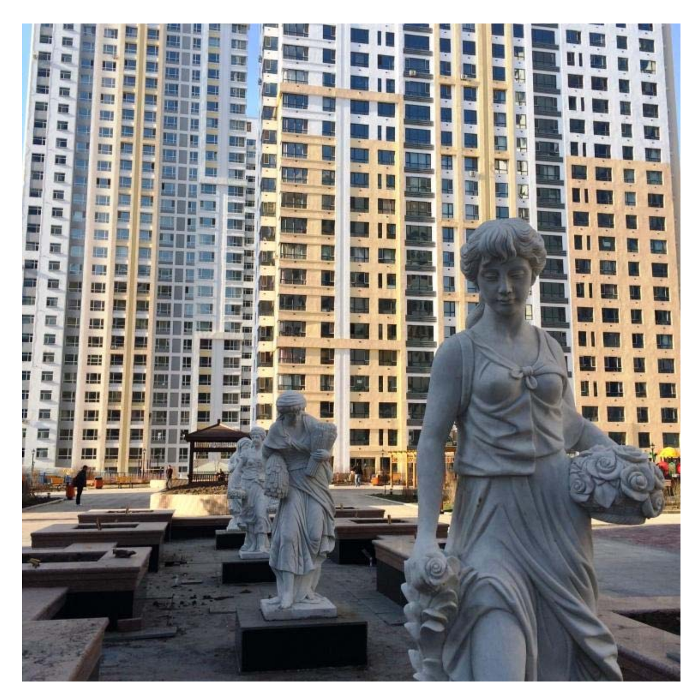


**图 1　黑河新建的居民区（作者拍摄）**

像中国的其他边境城市一样，黑河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俄罗斯印象，其中包含着更大的全球想象。满洲里是中国最繁忙的内陆出入境口岸，全国对东欧进出口商品总量的 60%经由此处。与黑河相类似，它也利用了其位于中、俄、蒙三国边境处的地理位置。该城市的建筑模仿欧洲风格，很多主题公园也在靠近国门的地方涌现出来，例如有一个“套娃公园”展出俄罗斯和西方的著名人物，包括像查理·卓别林、奥黛丽·赫本和耶稣等名人。在黑河河岸有一个更小规模的套娃陈列，它也同样包含了远超俄罗斯文化范畴的主

题，而俄罗斯的著名童话故事则被迪斯尼（Disney）系列的故事补充得天衣无缝（见图 2）。



图 2　带有迪斯尼式图案的套娃雕塑（作者拍摄）

## 俄罗斯式复制

中国式的复制行为对俄罗斯人来说通常是非常陌生的。据我所知，在俄罗斯一侧的边境上并不存在对中国风貌的类似重建。像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其他城市一样，布拉戈维申斯克并不寻求把自身打造成一个临界空间。相反，通过建立纪念碑，这座城市的俄罗斯特性被持续而有力地强化着——这些纪念碑是为了纪念该地区的早期定居者以及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结构上看，这座城市转而向内，而不像黑河那样整个城市布局似乎面朝俄罗斯——城市中最高和最现代的建筑耸立在河岸上或者至少从河对岸看清晰可见，而城市里最高档的酒店也在其中。①

① Бийе Ф.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м измерении: открытые рынки, герметичность и вертикальность в двух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городах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оциология. 2014. No.2. C.76-98.

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街道标识使用俄文和英文，除了近期增设的采用三种文字的旅游指示牌以外，中文字符并不常见。这座俄罗斯城市也很排斥黑河的所作所为，比如给重要的建筑打上灯光。与它的中国邻居不同，布拉戈维申斯克在夜里看起来非常暗。实际上，在过去十年里黑河在夜晚变得越来越灯火通明，这两座城市之间形成了越来越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甚至使得布拉戈维申斯克居民经历尴尬时刻，游客们来到这座城市时，他们会指着黑河的灯火问路人去市中心怎么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黑河打造夜间灯光秀的例子受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居民的抵制，他们宣称灯光和激光束是艳俗的，缺少品味。然而这些审美评价似乎混合着不小的嫉妒心，以及意识到这座俄罗斯城市没有财力与中国邻居进行竞争。与此类似的是，当黑河的堤岸被改造成树林、小公园和雕塑一字排开的步行街时，俄罗斯一侧的河岸依旧维持着原样。

直到 2011 年夏天普京到访布拉戈维申斯克之后，这座城市才终于获得了翻修的资金。到了 10 月份，挖掘工作开始进行，卡车沿着黑龙江岸卸下沙子用于河岸的建筑工程。一年多以后，新河堤的第一段向公众开放，第二段计划在 2014 年初完工，第三段和最后一段计划到夏天完工。这对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大多数居民们来说是一个意外之喜，因为他们曾坚持认为这个项目会停滞不前。人们的这一共识使得新堤岸的建成注定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功，事实上有人认为“比黑河的还要好得多”。

与黑河进行比较当然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翁爱华（Aihwa Ong）所说，城市转型包括“城市之间难以避免的比较、参考和模式打造。”[①]双子城市，特别是像黑河和布拉戈维申斯克这样的城市，坐落在两个不同“文明”的断裂线上，在这里，模仿过程是尤其显而易见的。在前文中，我已经阐述过黑河是怎样故意借用俄罗斯的象征手法，来打造自己作为一个临界处的边境城市形象。布拉戈维申斯克近些年的城市发展实践也表明，这座俄罗斯城市并未免于受到其相邻城市的文化影响。因此，当地报纸在报道新河堤的设计和竣工时，明确提到了黑河的堤岸，而没有一丝一毫“收复失地”的喜悦。

① Aihwa Ong, “Introduction: Worlding Cities, or the Art of Being Global”, in *Worlding Cities: Asian Experiments and the Art of Being Global*, edited by A. Roy and A. Ong, 1-26, Chichester: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1, p.4.

有些时候，城市的影响也与物质材料有关。由于大量的建筑材料直接从中国进口而非当地生产，新的城市发展通常带有一种非常中国式的特征。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用来装饰布拉戈维申斯克经整修河岸的新垃圾桶。这些垃圾桶购自中国，不仅与在中国使用的垃圾桶一模一样，而且带有区分可循环与不可循环物品的中文标志，并用贴纸标示出废旧电池和香烟头应该丢入的隔间。这些方面很少被认为属于“文化影响”，事实上在我素累积起来构成了一座城市的总体形象和品牌。能使人们迅速地辨别出一个城市是英国式、俄罗斯式，还是中国式的，通常是诸如路标、邮箱和街道标识等细微的元素。在这个案例中，布拉戈维申斯克毗邻中国，加上经济不平衡导致依赖从中国进口，极大地促使这些中国的城市形式跨越边境掺杂进来。

在过去几年的发展进程中，其他显著的转变体现在这座城市有关公共照明的政策上。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布拉戈维申斯克批评黑河在晚间上演“灯光秀”的作法是艳俗的，但现在它似乎也采用了这个做法。正如该城市的首席建筑师在一篇新闻报道里所解释的那样，当人们夜里在城中散步时，这座城市应当引出人们的节日情绪。假如当地政府想要所有建筑都亮起来，优先考虑的应该是那些坐落在主要街道上的历史建筑。这些举措是布拉戈维申斯克“对其中国竞争对手所做出的适当反应”，一个鲜明的例子是：最先被点亮的是沿着河岸、但不那么重要的克拉斯诺弗洛斯卡娅街（Красно-флотская），其优先顺序甚至排在市中心的列宁大街和十月革命 50 周年大街之前。[①]

然而，这种复杂而多方面的模仿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两座城市正在变得彼此类似。它们只不过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采用了日趋接近的城市发展规则（urban grammar）。正如西蒙·哈里森（Simon Harrison）所力证的那样，在“人们应该清楚地相互区别开来”这个意义上，借鉴和模仿是创造差异的基本过程。[②]理查德·汉德勒（Richard Handler）以魁北克为例作过分析：“就像在任何一个北美洲城市的连排民族风味餐厅那样，不同民族和种族群体参

① Зражевская Ирина. Власти решили установить подсветку зданий по всему областному центру//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5 февраля 2011. С.5.

② Simon Harrison, *Fracturing Resemblances: Identity and Mimetic Conflict in Melanesia and the West*, New York: Berghahn, 2006, pp.44-47.

与到一个共同市场当中生产出差异，而这又使他们变得相同。”[①]因此，在黑河矗立起来的巨大摩天轮、高楼大厦和夜晚上演的灯光秀，都被刻在一个双层的“彼此同化与竞争性差异化并存的进程”之中。[②]类似地，布拉戈维申斯克所做出的重新设计河岸景色、点亮黑龙江沿岸建筑的决定，构成了一种参与、竞争和自我重新定义的象征。胜人一筹因此已经不单单是对他者的一种被动复制，而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内在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关群体要求获得平等乃至超越。”[③]

这就解释了黑河和布拉戈维申斯克这两座城市如何能够在日益接近的同时保持自身迥异的风格。当我们比较它们遥相呼应、不止一处投射着对方影子的河岸时，这一结论尤其明显。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壮观的河堤上，分布着各式历史纪念碑和军事雕塑，散发着民族自豪感和重生的自信。（见图 3）这种布局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军事防卫，事实上在河岸垂直外墙墙面上还有苏联时期哨塔的造型。在这个意义上，它与黑河的河堤截然不同，后者带有强烈的俄罗斯印记，积极寻求营造一种友好邻居的感觉。



**图 3　面向黑河的布拉戈维申斯克边防警卫雕像（作者拍摄）**

---

① Richard Handler,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Quebec*,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p.195.
② Harrison, *Fracturing Resemblances*, p.46.
③ Ibid.



图 4　黑河的儿童与熊玩耍群雕（作者拍摄）

## 复制之复制

我在本文描述的对话过程，就是双子城市不断从彼此身上借鉴灵感并且变得愈发类似的过程，它是黑河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城市演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只是整个图景的一个部分。黑河的模仿行为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中国的大多数边境城市上演。正如前文所述，在这个国家的最核心处，诸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都市的市内和周边，的确存在其他形式的模仿。因此，黑河受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影响，或许小于其他中国城市对黑河的影响。黑河的俄罗斯符号事实上构成了一种非常中国化的城市品牌塑造方式，其最终目的是要把它转变为一座国际枢纽城市。就像满洲里那样，黑河也是上世纪 90 年代宣布要成为“全球城市”的 40 多个中国城市之一。[①]运用俄罗斯符号打造自身品牌、[②]展示自己的个性和独特性，黑河事实上是在模仿中国的其他城市，并与之进行竞争。

① 顾朝林、孙樱：“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际性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学刊》，1999 年第 3 期。

② 关于城市品牌建设，参见 Anna Klingmann, *Brandscapes: Architecture in the Experience Econom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0.

与此相类似的是，如果近些年来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城市演变是以多种方式对黑河自称具有都市现代性进行回应，那么这种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来自莫斯科而不是布拉戈维申斯克自身。事实上，河岸的整修在中央拨款的情况下才得以进行，并显然受到了普京要求以中国邻居为榜样的讲话的推动。的确，河岸的设计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当地投入：其大部分都是时任市长亚历山大·米古利亚（Александр Мигуля）的作为（而他并非当地人），并且这个设计实际上与犹太自治州首府比罗比詹（Birobidzhan）新建的河岸非常相似。

除此之外，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新河岸弥漫着很强的军事氛围，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建设这种类型堤岸的时候，俄罗斯似乎正在重拾信心并展示出抗衡美国和欧洲的政治意志，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最近在乌克兰事件中甚嚣尘上的保卫国家情绪，在与中国边境接壤的建筑和巡逻中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因此，布拉戈维申斯克所发生的城市演变看起来是高度融合的：在某些层面，它受到中国邻居行为的鼓动；在其他层面，它体现了更大的趋势，表明俄罗斯对其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态度正在改变。

在这种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动力之下，布拉戈维申斯克近些年对传统建筑的兴趣也在激增，也有很多新建筑受到建于 19 世纪中叶的布拉戈维申斯克第一批建筑的启发。位于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阿穆尔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奥莉加（Ольга）对此谈到，就像新河岸那样，这些城市形态在建造方式上多少带有迪斯尼的风格。[①]“我不喜欢新河岸，”她坦言道。“因为它让我想到中国式复制，即它们试图模仿传统建筑，但结果都是糟糕的复制。”在她看来，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老建筑已然是对俄罗斯西部帝国式建筑的拙劣复制。“革命之前这座城市的居民是富有的商人，但他们可能并未受到过良好的教育。通常他们的钱比品味要多。因此，他们在布拉戈维申斯克造的建筑有着不一样的审美趣味，颜色过于明亮，甚至很艳俗，不像欧洲那样克制。同时，这些建筑也受到了不同时期和风格——新俄罗斯和现代——的影响，实际上却并不属于两者中的某一种。”对于她来说，目前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出现的新建筑形式，是在寻求模仿这个城市在革命前时期的贵族风格，但结

① 关于“迪士尼式仿造”（Disney-fied simulacra），参见 Ross King, “Seoul,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and the Postnational Hypersp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7, 2009, p.627.

果却是拙劣的第三手复制。在我们的对话中，奥莉加对于观景台的设计尤其不满，她将其描述为劣质的模仿——试图创造出一种贵族气质与品味的形象，却终致粗鄙和庸俗。[①]

奥莉加对于这些"新传统"建筑的解读非常有趣。她认为，尽管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城市发展努力传递一种历史厚重感，但事实上更像是对诸如黑河和满洲里等典型中国边境城市的模仿。就像中国的边境城市一样，这个城市发展的原动力不是忠实地再生某种风格，而是从某种既定的风格中获取灵感。在黑河或者满洲里，接纳俄罗斯建筑元素的目标是为了传递一种世界临界处的意味；而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模仿的过程是为了强化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建造传统建筑一方面是为了展示在黑龙江岸边长达一个世纪的存在，另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俄罗斯的文化主导地位超过中国。在中国正稳步获得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导权的国际转变背景下，后一个方面显得尤其重要。

尽管布拉戈维申斯克心怀壮志，但是近些年来它的建筑项目显然背离了中国在该地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和对城市演变的塑造。在过去的几年里，市政当局重新宣称拥有 45 公顷的河岸冲积地带，希望建造一处包括标志性建筑和高度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复合体，例如高耸的摩天大厦和连通两岸的单轨列车。[②]如此宏伟的计划——就像关于城市照明的新政策那样——很明显是向黑河发出的一个信号，尤其因为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城市规模并不大且地区重要性有限。[③]

布拉戈维申斯克正在实施或计划中的其他项目，例如"小威尼斯"和"小荷兰"，是中国在引导城市潮流方面发挥重要影响力的证明。"小威尼斯"项目即将在"友谊公园"（Парк "Дружба"）对面一片 9 公顷的空地上动工，预

---

① 有学者认为，这种形式的模仿遗漏的"恰恰是那些使得这些建筑得以出现的历史特性。这些文化符号脱离了其指代对象，除了图案相似之外，没有'原创'和'重建'的意义。"参见 Serguei Alex Oushakine, "'We're Nostalgic But We're Not Crazy:' Retrofitting the Past in Russia", *The Russian Review*, 2007, Vol.66, No.3, p.469.

② Яна Гафарова. Мечты о дворцах и монорельсах// Моя Мадонна. 2012. No.8. С.3.

③ 按照一位当地记者的说法，布拉戈维申斯克照明计划的提出实际上是对黑河城市建设的一个直接回应。参见Зражевская Ирина. Власти решили установить подсветку зданий по всему областному центру

期将建成一个包含商场、展览与运动中心、酒店、咖啡馆和餐馆在内的大型综合场所。这个地点将按照威尼斯风格打造，竣工时会有运河和贡多拉船。（见图 5、图 6）[①]这个项目来自一个叫何文安的中国人的创意，他是布拉戈维申斯克最大也是最新的酒店“Asia”的老板。[②]被称为“小荷兰”的未来项目也归何文安所有[③]，正处在讨论阶段。如果这个项目得以实施，将在城市的一个河畔地带建造一个荷兰风格的综合性居住区，其间是运河组成的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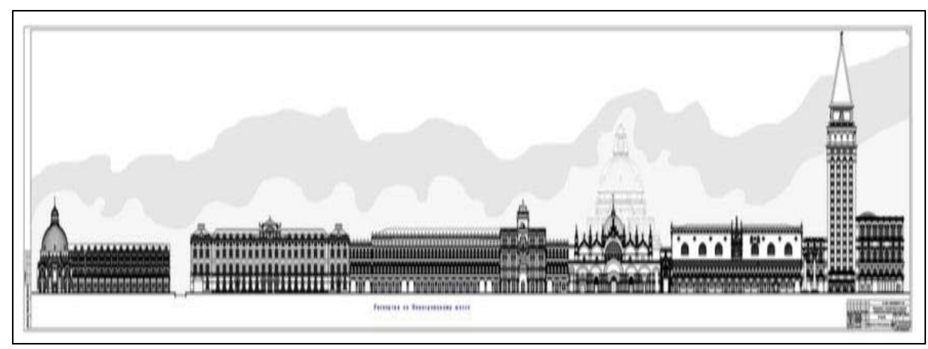


图 5　从新特罗伊茨克高速公路看“小威尼斯”项目全貌

① Елена Астафьева. В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е появится Венеция// Амурская Правда. 2012. No.60.

② 何文安似乎很有信心，认为小威尼斯项目可以吸引远至莫斯科的游客。他宣称是在一次意大利之行后受到启发，要再建一个威尼斯式的地方（根据 2014 年 4 月 20 号的访谈）。

③ 何文安是20世纪90年代初边境开放后第一批从事对俄贸易的中国商人。他没有显赫的背景，曾在福建省做木匠，现在非常成功，是华富集团的老板。参见何文安：“从乡村小木匠到跨国地产大亨”，http://www.fqxww.cn/fqg/2009-11-18/8828.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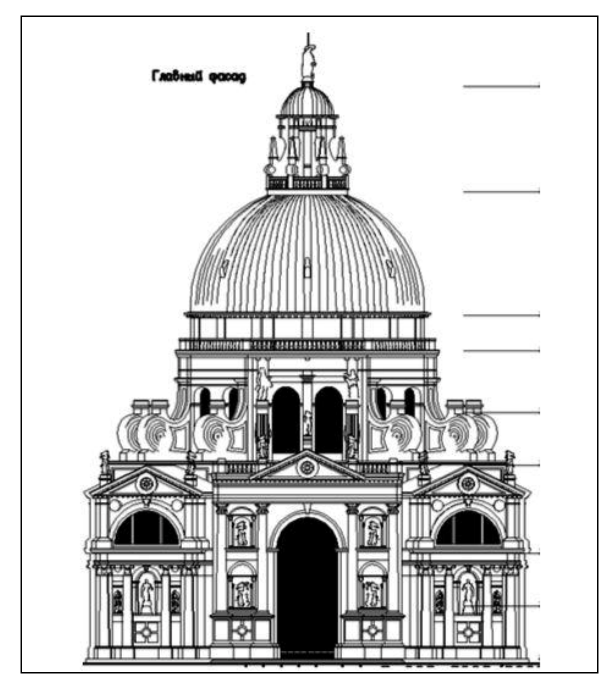



图 6　第 7 号建筑的正面图

## 结论

乍看之下，黑河和布拉戈维申斯克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城市，在很多方面它们各自象征着自己的国家。然而，进一步观察它们近年来的城市发展实践就会发现，它们通过借鉴、启发和模仿的对话过程产生了诸多重叠。这种互相借鉴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两座城市正变得愈加相似。不过两座城市的建筑风格和城市发展确实日趋接近。

笔者在这篇文章中的论述受到陶西格（Taussig）对模仿研究的启发。他成功地融合了两种看似不相容的紧张状态，即一方面愿意采用相邻城市的文化元素，而另一方面不断强调差异和独特性。[①]博斯克曾经令人信服地辩称，

① Michael Taussig, *Mimesis and Alterity: A Particular History of the Sens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模仿并不是生搬硬套地再生产。事实上，黑河和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城市演变所体现的是肯扎里（Kenzari）①以及之前的吉拉尔（Girard）所提到的建筑上的“模仿性竞争”（mimetic rivalry），即两座相邻城市相互借鉴、相互启发但是运用独特而原创的方式。

因此，黑河采用的俄罗斯符号并不是非原创性的复制或者所谓“仿造建筑”（duplitecture）；②与之相反，黑河所展示的俄罗斯特性让人想到这座城市与俄罗斯的联系是其通向更广阔世界的路径。在前文我讨论过，诸如套娃雕塑等俄罗斯符号承载着“国外”和“西方”这样更大的概念，而俄罗斯是一个通向欧洲和美国的窗口——推而广之，黑河本身也可算作其中。与此类似的是，黑河俄罗斯风情街上的商店售卖油画或酒之类的俄罗斯商品，但它们同时出售其他非中国产的商品，比如韩国巧克力。

模仿也可以通过更为间接和隐晦的方式来实现。例如，布拉戈维申斯克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强调真正的传统建筑来保留俄罗斯特性，但是它的行为却很能使人联想到中国的做法。无论是近期对市内历史性建筑灯光效果的重视，还是在河岸上建造标志性建筑，这些项目或许在俄罗斯媒体的描述中是爱国的，但是其意义被一种模仿性竞争所强化，而这种竞争始终是无言和无意识的。

模仿总是和不真实画上等号，但是两者之间的界限通常很模糊。正如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所说，模仿不能脱离发明，因为任何发明都依赖之前的无数次模仿。不论模仿得是好是坏，模仿过程中的创意元素都清楚可见，这往往更具有破坏性，不断地模糊着“赞美”与“批评”、“正品”与“仿冒”、“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界限。模仿的概念还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③这个概念非常接近，因为它揭示了任何原创性作品都有可复制的本质。

好的模仿往往形成一种文化基础，这种基础使得创造性得以发展和演

① Bechir Kenzari, “Construction Rites, Mimetic Rivalry, Violence” in *Architecture and Violence*, ed. Bechir Kenzari. Barcelona: Actar, 2011.

② Bianca Bosker, *Original Copies: Architectural Mimic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③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London: Routledge, 1993.

化。[①]勒内·吉拉尔曾经提醒我们："在不久以前的欧洲，美国人还被描绘成模仿者，是不错的技术工人，确实如此，而真正的脑力在德国或英国。然而若干年之后，美国人成了出色的创新者"。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同样的批评也指向日本人：他们"被贬低为不过是西方模式的复制者，在任何领域都没有真正的领导力。如今他们在越来越多技术领域里成了驱动力量。"[②]

在我的整个田野调查中，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受访者们一致贬低黑河是一个冒牌货，是一个败絮其中的波特金（Potemkin）式的村子。[③]这种将中国与"假冒"、复制的想法联系在一起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俄罗斯。然而，即使是中国模仿性最强的行为，例如复制西方科技产品，也包含着创新成分，比如说山寨版的苹果手机提供了原产品所没有的额外功能。或许正像吉拉尔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我们坚持创新和真实，那么就并不打算承认在创新之中模仿也发挥着功用。[④]

（李 佩 译　丁 端 校）

---

**【Abstract】**The two cities of Heihe and Blagoveshchensk, on the Sino-Russian border, are close to each other geographically. Due to their close economic cooperation, both cities are undergoing a mutually influencing period. Their evolution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suggests that they are gradually adopting a similar urban and architectural grammar, and that they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ensurable. By replicating Russian symbols, the city of Heihe offers Chinese tourists a "mini Russian experience". Blagoveshchensk seems rather

---

① 这种解读和本杰明关于儿童游戏活动中的模仿行为模式的观点很相似，参见 Walter Benjamin, "On the Mimetic Faculty", in *Beyond the Body Proper: Reading the Anthropology of Material Life*, eds. Margaret Lock & Judith Farquha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66]）。模仿行为也在前社会活动和非人类生活中扮演着核心作用。参考范例 Laura U. Marks, *Touch: Sensuous Theory and Multisensory Med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Roger Caillois, "Mimicry and Legendary Psychasthenia", 31 October 1984, pp.17-32.

② René Girard, "Innovation and Repetition", in *Architects & Mimetic Rivalry*, ed. Samir Younés. London: Papadakis, 2012, p.46.

③ Бийе Ф.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м измерении: открытые рынки, герметичность и вертикальность в двух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городах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④ Girard, "Innovation and Repetition", p.46.

conservative, yet this Russian city still can’t avoid being influenced culturally by her neighbor. Actually, Chinese factors are emerging continuously. Through mutual reference, dialogues and imitation, these two cities have many in common.

【**Key Words**】Sino-Russian Border City, Sino-Russian Border Urban Architecture, Sino-Russian Cross-border Exchanges

【**Аннотация**】Хэйхэ и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как приграничные города, благодаря своей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близости и тесному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переживают процесс взаимного влиян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ородской архитекрутры эти два города всё чаще воплощают схожие архитектурные концепции и стил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ё более очевидна конвергенция.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имит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имволических объектов Хэйхэ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китайским туристам «туристический опыт России в миниатюре».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кажется более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м, однако и этот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род не застрахован от культурных влияний своих соседей и постоянно обогощается элементами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Эти два города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иалога и имитации имеют ряд точек пересече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приграничные города,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городов,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ые обмены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责任编辑　常　喆）

# 俄罗斯帝国民族分离主义的起源*

孙超**

**【内容提要】**俄罗斯帝国解体，民族分离主义是其重要诱因。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多与帝国晚期政策失误有关。在民族政策上，帝国早期在专制的基础上进行差异化管理取得一定效果，但晚期以大俄罗斯主义为核心观念，强制实施直接统治，实施俄罗斯化政策，区分异族人，构建出少数民族的他者。在帝国治理上，自上而下的自治传统破坏了帝国的专制能力；为加强专制统治而频繁取消自治政策又引起更大的民族矛盾。这些因素导致帝国晚期外围民族主义的兴起，并在 1905 年革命时集中得以释放。随着帝国外部环境的变化，民族分离主义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

**【关键词】**俄罗斯　帝国治理　自治　外围民族主义　民族分离

**【中图分类号】**D751.2；D56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3-0140(23)

## 引言

自苏联解体以来，民族分离主义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一些西方学者将民族分离主义视为瓦解原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①]但事实上，

---

* 非常感谢《俄罗斯研究》编辑老师和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中疏漏之处由笔者负责。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后苏联空间内‘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10）的阶段性成果。

** 孙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4 级博士研究生。

① 宋全成：“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当代西方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 年第 1 期，第 83 页。

民族分离主义是伴随着现代世界体系形成和政治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浮出水面，逐渐成为威胁国家生存和稳定的痼疾。在民族分离者的理想世界中，各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国家，并且像个体一样，相互以合法的身份对待对方。[①]几乎所有的民族分离主义都将民族自决权作为理论依据，视法国大革命和北美独立战争为行为的合法性源泉。[②]但同时民族分离主义侵蚀多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主权和疆域，国际社会和国际法从未支持过脱离反殖民反压迫背景下瓦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分离运动。因此，脱离了具体时空背景讨论民族分离主义是无意义的。

基于此，梳理不同地区民族分离主义的历史源流显得尤为重要。在西欧和北美地区，民族分离主义出现是长期封建压迫和殖民剥削的结果。相比之下，欧洲中东部的民族分离主义出现很晚。欧洲中东部的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权直至一战之后才得以完成。究其原因，多与欧洲中东部存在数个多民族帝国有关。这些多民族帝国实施多管齐下的民族治理，抑制民族抗争和分离力量的形成。位于欧洲东部的俄罗斯帝国正是这类帝国的典范。作为东正教的保护者，俄罗斯帝国的民族治理并非简单粗暴。[③]在帝国治理体系中，沙皇被视为神一般的存在，凌驾于政治之上，并对受迫害的民族施以援手。库班哥萨克、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以及后来的中亚草原突厥人，以其不同的方式适应俄罗斯的帝国统治。[④]俄罗斯文明成功地将基督教融入大帝国的治理之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统治方式。该文明一方面通过领土扩张和对外战争，塑造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为核心的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吸纳少数民族精英进入帝国中央，并给予边缘地区以物质和政策上的优惠，维持帝国中央与少数民族高层的联盟状态。[⑤]

但就是这样一个帝国，却在一战期间迅速崩溃，民族分离主义在帝国废

---

①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主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25 页。

② 王建娥："民族分离主义的解读与治理——多民族国家化解民族矛盾、解决分离困窘的一个思路"，《民族研究》，2010 年第 2 期，第 17-18 页。

③ John A. Armstrong, *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p.79.

④ Ibid, pp.80-81.

⑤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75-284.

墟上大量涌现。二月革命之后，分离浪潮迅速从波罗的海地区和芬兰涌起，如多米诺骨牌般从俄罗斯西部边缘地区渐次倒下，改变了稳固不变俄罗斯帝国地图。

为什么俄罗斯帝国在 20 世纪初爆发如此频繁密集的民族分离冲突？拥有多民族治理典范的俄罗斯帝国传统，为什么难以建立“想象共同体”，在战争危难中反而遭到众多民族的背叛？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从帝国的政治变迁和民族政策入手，回溯帝俄时代欧亚地区分离主义的起源。

## 概念厘清与理论工具

探讨俄罗斯帝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根源，首先需要厘清与分离有关的核心概念。分离的历史和智识传统可以回溯到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代。[①]在被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称之为革命的年代（1789-1948），人民主权成为激荡各国暴力对抗旧制度的合法性来源。[②]人民主权说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渐裂变为三条抗争路径：拥有主权实体的人民，其目标是颠覆旧秩序，建立民主制度；国家公民，其目标是实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具有共同命运和文化特性的民族共同体，其目标是建立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的国家。[③]民主、主权和民族自决权“三位一体”，逐渐嵌入民族-国家建立原则之中。民族随着民族-国家的成长而逐渐政治化。[④]分离（secession）指的是“部分土地-人口脱离已存在的主权国家，在未获得主权国家同意的前提下建立独立的政治实体”。[⑤]它是打破帝国牢笼获得民族独立的有效方法。[⑥]民族主义政

---

① Beth Kathleen Dougherty, “Breaking Away: Identity, Intervention and Secession”, 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01, p.9.

② 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E.J.Hobsbawn, *On History*, NewYork: The New Press, 1997.

③ Andreas Wimmer, *Nationalist Exclusion and Ethnic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

④ Ibid, pp.2-3.

⑤ Marcelo G.Kohen edited, *Secessio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s*, p.3. 卢婧：“国际法视野下的国际分离问题”，《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4 年，第 12 卷第 2 辑，第 153-154 页。

⑥ Margaret Moore, *The Ethics of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

治诉求与分离抗争相结合导致历史上的一系列民族分离战争。[①]

政治民族主义兴起模糊了民族主义与分离主义的边界。在多民族国家看来，政治民族主义是意在使民族（nation）边界与其治理单元[②]（governance unit）边界相一致的集体行动。[③]赫克特（Michael Hechter）认为，"只有民族的边界与治理单位的边界存在分离时，民族主义才会出现。"[④]赫克特将民族主义视为常量，将时间概念从民族主义的概念范畴中剔除，有利于进行长时段的政治分析。同时，赫克特理清了帝国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强调帝国并没有着手构建单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间接统治的存在阻碍了民族主义兴起。帝国治理模式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帝国对地方政权直接统治的加强推动了外围精英选择民族主义，容易导致外围民族主义（peripheral nationalism）的出现。而外围民族主义正是试图通过使民族与其所在国分离而实现民族自决。[⑤]赫克特强调从政治结构的角度观察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与演变，忽略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这是有失偏颇的。但正是将视野聚焦在帝国政策演变上，我们才能更为细致的观察民族分离主义的起源和蜕变。本文将借鉴赫克特对民族分离主义的研究思路，认为正是俄罗斯帝国专制传统的强化和声誉的下降容易促成民族主义力量的形成，进而孕育民族分离主义。

目前对政治民族主义认识存在原生论和工具论两种路径，民族分离主义是内外政治结构演变的结果却是学界共识。[⑥]本文将综合使用政治民族主义两种分析路径探究俄罗斯帝国民族分离主义起源。本文认为，俄罗斯帝国的民族分离主义的形成既离不开不合理统治政策对各个民族的长期伤害，也离不开工业化对帝国统治结构的冲击。不合理的统治政策往往会造成异化效应

---

① Andreas Wimmer, *Nationalist Exclusion and Ethnic Conflict*, p.3.

② 这里的**治理单元**指的是负责向其成员提供绝大部分社会秩序与其他集体公益产品——包括保护私人财产、公平和福利等——的领土单元。[美]迈克尔·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韩召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9 页。

③ [美]迈克尔·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韩召颖等译，第 7 页。

④ 同上，第 44 页。

⑤ 同上，第 16 页。

⑥ 张建军："近二十年民族分离主义研究述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第 41-42 页。

和积累效应：政治、社会矛盾易被异化为民族冲突；民族矛盾积累，加速民族的分离主义倾向。社会大变革的发生将激发潜在的民族矛盾，民族分离主义力量趁机崛起，对多民族国家生存造成严重威胁。

下面主要从俄罗斯帝国的统治政策变迁入手，主要探讨三个方面内容：帝国晚期的民族政策为什么引起少数民族的仇恨和反叛；良好的自治传统为什么在帝国中晚期运转不灵，促成外围民族主义的兴起；革命浪潮如何引起帝国民族融合结构的质变，进而促成整个帝国的崩溃。

## 帝国的民族政策及其后果

自 10 世纪以来，欧亚地区的政治演进就是一部帝国的兴衰史。蒙古帝国快速崛起改变了欧亚地区的地缘版图。1223 年、1237-1238 年与 1239-1240 年蒙古军队的三次远征，扫荡欧亚大部分地区，打开了通往东欧和巴尔干的通道，并在最西端建立起以南俄草原和伏尔加河下游为中心的国家——金帐汗国。[①]而罗斯则在王公政权统治下处于割据状态。[②]金帐汗国的统治将伊斯兰教带到欧亚地区，并在内讧和战乱中逐渐瓦解。而在此刻，罗斯开始强大起来。

蒙古帝国衰落后，莫斯科公国继承了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帝国治理传统，开始向欧亚大陆逐步扩张。伊凡雷帝对喀山汗国的征服是标志性的事件，象征着“莫斯科罗斯承袭了草原遗产，从中央集权的王国转变为多民族的帝国。”[③]俄罗斯民族虽然在地理上分散开来，却初次结合成为莫斯科君主政权统治下的一个政治上的整体。[④]移民和国土开拓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主要事件，也是欧亚地区各族政治互动的主要进程。[⑤]自 17 世纪到 19 世纪中叶，俄罗斯民族向东欧平原散布开来，逐步组建俄罗斯帝国。与此同时，在彼得

① [苏]格列科夫和雅库博夫斯基著：《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48 页。
②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张草纫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27-28 页。
③ Jaroslaw Pelenski, *Russia and Kazan*, Pairs and The Hague: Mouton, 1974, pp.175-178.
④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张草纫等译，第 28 页。
⑤ 同上。

一世时期，俄罗斯加紧西化步伐，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宣布“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帝国专制制度发展到新的阶段。[①]

帝国对各区域的民族治理并没有严密的计划性，基本上是专制统治的自然延伸。专制制度强力保证了移民和国土开拓的实施，成为帝国民族政策的基础。帝国根据统治的难易程度在各地区建立各种类型的地方机关，这些机关都要服从圣彼得堡中央的管辖。俄罗斯帝国通过历次改革维持了和平稳定，同时也面临危机。帝国的统治在 19 世纪遭受启蒙主义和革命思想的双重挑战。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直接挑战俄罗斯世袭君主制度的合法性；19 世纪的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则对“俄罗斯土地属于俄罗斯人的遗产”，提出了质疑。[②]另外，政策多变，今天向自由主义让步，明天又吓得要命地把这些让步收回，（国家）因而越来越失去信用。[③]1812 年，俄国发动“人民战争”反抗法兰西帝国并取得胜利，俄罗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走上欧洲历史舞台，俄罗斯经历西方文明的洗礼。[④]随后的历史进程却使俄帝国心态越加保守，越加依赖专制制度。。亚历山大在国内执行的宪政改革乏善可陈，在对外政策上建立四国同盟以镇压自由主义和民族革命。随后继位尼古拉一世奉行“正教、政权与国家（民族）”（Orthodoxy, Autocracy, Nationality）理念，强调国家（民族）来源于东正教和专制政权。[⑤]专制制度的加强要求对各民族实施直接控制。帝国的民族问题在 19 世纪中后期涌现出来，加剧了俄罗斯帝国的衰落。

在进步思想家那里，沙皇帝国逐渐被塑造成为“旧制度”和“民族监狱”的典型代表。现代俄国只不过是莫斯科公国的变形而已。[⑥]另一方面，政策

---

① ［英］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早期现代政府和西方的突破——从民族国家到工业革命》，马百亮译，第 398 页。

② Aviel Roshwald, *Ethnic Nationalism & the Fall of Empires, Central Europe, Russia& The Middle East, 1914-192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20.

③ ［德］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84-285 页。

④ ［英］多米尼克·列文：《俄罗斯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1814）》，吴畋等译，第 571-572 页。

⑤ Dominic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4.

⑥ ［德］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309 页。

累积的负面因素逐渐积累起来。尼古拉一世时期异族人（Инородцы）[①]的概念，最初被帝国引入界定西伯利亚游牧、半游牧居民。随着帝国的扩张，帝国要对新加入的族群作出判断，以确定其是否符合异族人的身份。1835 年，犹太人被划入异族人范畴。1850 年，异族扩大到非俄罗斯族范畴，并迅速流行起来，不仅指代帝国东部地区的西伯利亚人和突厥人，而且芬兰人、日耳曼人和瑞典人也都被列入其中。[②]异族人被视为帝国中的“他者”，在帝国内部遭受歧视和排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化（Russification）政策成为沙皇推行民族政策的另一个手段。沙皇政府除了对各少数民族实行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外，主张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宗教，一种语言”，强制推行同化政策。[③]（参见表 1）自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到 1905 年革命，帝国在各个领域强制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对少数民族的迫害达到历史顶峰。[④]

但这种俄罗斯化政策并不成功。沙皇希望通过东正教和俄国文化解决民族问题，保持家长制国家中皇帝与个人的神秘联系。[⑤]较之于语言和族群性，宗教在识别俄罗斯人身份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天主教俄国人”和“穆斯林俄国人”甚至在今天都很难被本国人接受。[⑥]但对少数民族来说却非如此。多数被强制归化的少数民族并没有在宗教信仰上发生变化，东正教也难以将不同信仰的民众团结在一起。帝国排斥异族人，却又对少数民族采取同

① 在俄罗斯帝国的话语体系中， Инородцы（inorodtsy)有多种内涵：最早指的是帝俄时代俄东部边境地区的非俄罗斯人；在一些官方文件中，它代表具有独立法律范畴的少数族群；也指不服从帝国基本法，保存本民族风俗、拥有自己的领袖，且不服兵役的一类人；它同时也是对帝国内所有非俄罗斯族居民的蔑称。参见 John W. Slocum, “Who, and When, Were the Inorodtsy? The Evolution of the Category of ‘Alien’ in Imperial Russia”, *The Russian Review*, 1998, Vol.57, No.2, p.173.

② Jane Burkank, Mark von Hagen, and Anatolyi Remnev(ed.), *Russian Empire: Space, People and Power 1700-1930*,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74.

③ 张建华：“俄罗斯国家的形成与民族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第 93 页。

④ 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 p.6.

⑤ ［俄］梁赞诺夫斯基，《俄罗斯史》，杨烨等译，第 359 页。

⑥ Dominic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p.27.

化政策。这种不顾现实的强力民族构建（排斥和同化），只能引起各民族更大的反感。在反抗沙皇军事扩张、殖民统治、经济剥削和文化渗透过程中，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得以成长，民族独立意识逐渐增强。

表 1　帝俄中晚期各地区主要俄罗斯化政策及其问题

| 民族政策 / 地区 | 时间 | 主要表现 | 问题 |
|---|---|---|---|
| 波罗的海地区 | 19 世纪中后期 | 减少日耳曼人特权；加强帝国对地方的控制；大学和城市更换俄语名称 | 俄罗斯文化并没有得到拓展；疏远了俄罗斯与日耳曼人、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的关系 |
| 芬兰 | 世纪之交 | 将俄语作为官方商业用语；强迫芬兰人服兵役。 | 大量有组织的芬兰人反抗；1904 年芬兰总督博布里科夫（N. I. Bobrikov）被暗杀 |
| 乌克兰与白俄罗斯 | 19 世纪中后期 | 不允许学校教授乌克兰语与白俄罗斯语；多数乌克兰语刊物和著作不允许出版 | 许多城市里出现了称作“格罗马达社”(意为村社)的秘密团体，鼓吹乌克兰文化，寻求地方自治 |
| 立陶宛与波兰 | 19 世纪中后期 | 官方否认立陶宛语的存在；波兰语出版物在华沙和帝国西部省份遭受更严格的审查；多次镇压波兰民族起义 | 波兰多次起义要求独立；1905 年波兰全境工人大罢工 |
| 高加索地区 | 19 世纪 | 干预伊斯兰教法的解释，为帝国统治服务；大规模强制迁移穆斯林至奥斯曼帝国；视高加索基督教徒为威胁，强制亚美尼亚学校推行俄语教学；监督城市亚美尼亚人以防革命 | 20 世纪初多次爆发族群冲突和工人起义，最为著名的是 1905 年亚美尼亚－鞑靼战争 |
| 中亚地区 | 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初 | 在中亚扩张领土；修建铁路，建立殖民城市塔什干；鼓励俄罗斯人移民中亚，开垦荒地；成立管理穆斯林的机构；建立俄语学校，实行俄语教育 | 帝国在中亚腐败统治引发当地的强烈的民族抗争运动，较大规模的有三次：1892 年塔什干的“霍乱”起义、1898 年的安集延起义和 1916 年的中亚民族大起义 |

资料来源：参考《剑桥俄国史》自制。Dominic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36-42.

俄罗斯帝国在民族问题上缺乏资源和能力来执行民族排斥或俄化政策，不仅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反而加剧民族矛盾，酿成民族危机。帝国在赢得民族认同上也陷入被动局面。尽管长久以来俄罗斯国家民族主义在巩固沙皇政权并维持帝国统一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并没有成为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基础。换句话说，俄罗斯国家民族主义并未成为俄罗斯帝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帝国上层早已将非俄罗斯人视为不可分割的一员，但统治精英所持的王朝思想和特权意识，却难以有效地将非俄民族整合进帝国治理核心，也难以在非俄民族中建构起国家认同。沙皇帝国既不愿意接受民族多样性，又无法构建出以俄罗斯人为核心的国家民族，最终酿成外围民族主义的崛起。

19 世纪末，帝国的民族政策已经成为推翻政权的革命火种。随着各种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情绪在帝国的散播，分离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民族分离主义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帝国危机的重要源头。

## 帝国自治传统的发酵

在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看来，列国纷争的 19 世纪存在两种类型的帝国。一类是自 16 世纪开始崛起，到 19 世纪在工业和金融方面领先其他国家的海洋帝国。这些国家拥有广阔的殖民地，集中分布在大洋边缘。另一类帝国较为古老，其特点是，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专制君王在其中依托集权化体制和官僚阶层进行统治，集中分布在产粮地区。[①]位于欧亚大陆的俄罗斯是个“混合型帝国”（hybrid empire），兼具两类帝国的特征。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多是因为吸收了大陆帝国的统治技术和观念，且具备海洋帝国的基督教属性。帝国扩张的受害者多是游牧民族和穆斯林，这些文明在西方文明崛起时期就已经落后。[②]从另一方面看，庞大的疆域、多样的民族、集中化的行政管理、沙皇的绝对专制传统，以及不同于大陆帝国的封闭政治文化，又使它难以归入海洋帝国。[③]正是这种混合特征导致了俄罗斯帝国治

---

① Dominic Lieven, “Dilemmas of Empire 1850-1918: Power, Territory, Ident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99, Vol.34, No.2, p.163.
② Ibid.
③ Ibid.

理的特殊性。俄罗斯统治者需要长期思索两个问题：如何维持政治长久稳定，确保沙皇的至高地位不受侵犯；如何让帝国顺利进入发达的海洋帝国阵营，而不垂死挣扎进入衰朽落后的第二阵营。

18 世纪，俄罗斯进入欧洲剧场，并被各国所接受。俄罗斯帝国的进入扩大了欧洲的外延。俄罗斯努力将其自身——王朝-绝对主义的旧制度体系挤进欧洲主流的政治体系之中，并成为“文明国家”的一员。[①]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启蒙学者们对俄国的认识又提升了一层：尽管披着旧制度的外衣，帝国却积极主动吸收启蒙精神、实行开明专制。俄罗斯帝国在与欧洲交流中获得大量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但却忧惧革命浪潮，逐渐走向封闭保守。在沙皇看来，帝国一方面需要加强集权，构建稳定有效的治理模式；另一方面要寻求变革，套上西化的外衣，加紧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俄罗斯这种常态与变革的矛盾，在帝国治理上表现得异常明显，也成为民族分离主义起源的重要背景。

自治——作为帝国区域治理的重要政治传统，也跟随着帝国的现代化走上快车道。[②]俄罗斯帝国的自治存在两个维度：自下而上的自治传统和自上而下的自治政策。这种看似矛盾却又统一的自治属性直接源自俄罗斯帝国的混合特性：基层的发达民主传统和高层有效的集权管理。下面将简述两种自治在俄罗斯帝国的沿革，及其对分离主义形成的影响。

自治，作为俄罗斯的政治传统，通常总是与中央集权相区别的。真正的地方自治是由地方社会的代表，比较独立自主地处理地方上的事务，有权向居民课税，处置社会财产和地方收入等等。[③]判断地方自治的标准，并不是其职能，而是其与中央政权的相互依赖程度。[④]俄罗斯存在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例如古罗斯的市民大会“维彻”（вече）和莫斯科国家的“米尔”（мир）。

---

① Martin Malia, *Russia under Western Eyes: from the Bronze Horseman to the Lenin Mausoleum*,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75.

② 曹维安、师建军：“俄国大改革前的地方自治传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5 期，第 83-89 页。

③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 2 卷）》，贾宗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359 页。

④ 同上，第 359 页。

这些自治机构历经时代变迁，逐步从社会下层的地方性城乡公社，演变为地方自治组织。[①]1864 年，俄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关于省县地方自治机构的法令》。根据该法令，各省县建立地方自治机关，进行自我管理。地方自治机关是一种介于政府与民间之间的“类法团组织”，类似于在沙皇政治板块不松动的原则下放权让利。[②]自治运动逐渐兴起，地方自治局蚕食政府权力，政府行政力量在基层逐渐被地方自治机构削弱。[③]它成为自由主义思想萌芽的组织基础，也促使帝国从封建君主制向资本主义君主制转变。[④]虽然地方自治传统在帝国晚期立宪改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第三种分子”[⑤]希图在保留沙皇专制的前提下，使用民主自治和政治自由代替官吏进行管理，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由于与官僚机构紧密连接，与民众保持一定的距离，最终自由主义自治实验没有获得成功。[⑥]但自治传统极大地削弱了沙皇政权的汲取性特征，逐步内化了西方的民主自治精神，促成了市民社会的崛起。

需要重点提及的是另外一种自治——自上而下的自治政策。俄罗斯国内现代化与对外军事扩张同步进行。俄罗斯在扩张过程中，对军队的依赖程度高，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同时维持超大规模国家的稳定，俄罗斯地方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只有两种职能：征兵和收税。[⑦]由于持续的对外扩张，边疆地区与中央距离遥远，将帝国进行分区管理成为帝国行政发展的必需，

---

① 曹维安、师建军：“俄国大改革前的地方自治传统”，第 89 页。

②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607 页。

③ 同上，第 610-612 页。

④ [俄]列宁，“关于纪念日”，《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67 页。

⑤ “第三种分子” 这个词，是萨马拉省副省长康多伊迪用来表示“既不属于行政当局，也不属于各等级代表之列”的人，是对在地方自治机关里受雇担任农艺师、统计人员、技术员、医生、兽医、教师等职务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以区别于政府与行政当局的人员（第一种分子）和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第二种分子）。详细内容参见[俄]列宁，“关于第三种分子”，《列宁全集（第五卷）》，，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93-301 页。

⑥ 邵丽英、罗能勤：“俄国地方自治改革方案形成过程述评”，《北大史学》，1998 年第 5 辑，第 110-111 页。

⑦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第 276 页。

由此逐渐形成两种地域：俄罗斯主体（Russia Proper）[①]地区和边缘地区。在俄罗斯主体地区，中央衙门各部权力更容易渗透到地方，中央与地区之间是垂直管理体系；而在边缘地区，不同的区域、领地和民族自治机构，依然保有较高的自主权，总督和地方行政长官往往成为权力拥有者。[②]沙皇对这些地区谨慎对待，授权总督和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央地关系在漫长的 18 世纪到 19 世纪上半期，在地方分权和央地均衡之间摇摆。权力去中心化、自治、保护国等特殊的管理形式，只是帝国对边缘地区管理的权宜之计，并没有改变帝国中央集权的特性。而帝国也逐渐将边缘地区的管理，纳入到帝国的中央官僚部门之中，通过设置功能性和行政性的管理机关，将边缘地区逐渐纳入帝国结构的“内核”。[③]自治，作为纳入帝国内核的重要管理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

帝国通过支持边缘“占绝对多数的族群”和“传统的共同体”自治，换取他们对帝国的忠诚。米罗诺夫指出，被占领区的行政和社会制度，取决于俄国的意志，通常都允许被占领区实行广泛的自治，“只要忠实于中央政权，自治的程度就扩大”。[④]自治作为帝国加强统治的权宜之计，尽管有不同形式（政治自治、行政自治[⑤]）以及根据不同地域所采取的地方行政管理样式（军事-民主管理体制、总督直接管辖、共治等），自治政策终究为帝国的中央集权和帝国中央权力扩张服务。（参见表 2）自治政策加强了一些民族（族群）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但由于帝国并不承认其独立认同的存在，在长时

① 又称“大俄罗斯（Great Russia）”，俄罗斯帝国的核心地域，俄罗斯人种形成的地方，以俄罗斯族人为主。1654-1721 年，沙皇将之诠释为“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结合体。

② John Ledonne, “Russian Governors General, 1775-1825: Territorial of Functional Administration”, *Cahiers du Monde Russe*, 2001, Vol.42, No.1, p.30.

③ Mikhail Stoliarov, *Federalism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Power in Rus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utledge, p.25.

④［俄］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的形成》（上），张广翔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第 12 页。

⑤ 区分政治自治和行政自治的标准，是政治实体加入帝俄后是否保留原有国家性的制度框架。如果政治实体国家制度框架得到重视和保留，即为政治自治；反之则为行政自治。关于两个概念的详细分析参见[俄]斯大林，“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1920 年 11 月 17 日）”，《斯大林全集》第 4 卷，北京：中共中央编译局，1956 年，第 352-358 页。

段还难以达到“分而治之”的效果。[①]

表 2　帝国的自治政策概览

| 政策<br>主要地域 | 时间 | 行政划分 | 主要措施 | 说明 | 是否自治 |
| --- | --- | --- | --- | --- | --- |
| 喀山、阿斯特拉罕 | 16 世纪 | 县；隶属于喀山的行政衙门 | 镇压为主，安置督军，建立堡垒和据点；汲取经济资源 | 以经济掠夺和征服为主 | 否 |
| 西伯利亚 | 16 世纪末 | 隶属于喀山衙门；1637 年成立西伯利亚衙门 | 安置督军；建立大量堡垒；煽动部族之间内讧；内部事务不加干涉，保留特权和领地，允许各部族保留自己的经济生活制度和萨满教文化 | 赋予地方行政机关（督军）更大的权力 | 地方权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未自治 |
| 左岸乌克兰 | 1654 年起 | 1663 年成立小俄罗斯衙门，服从外交部门；1772 年小俄罗斯委员会成立，服从枢密院；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自治被取消，成为沙俄普通行省 | 略微限制盖特曼哥萨克国的政治经济权力，哥萨克首长处于督军监督之下 | 盖特曼汗国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国家受到沙皇制约；1669 年俄乌合并文书标志着乌克兰自治的终结，哥萨克军队成为正规军，乌克兰自由农民沦为农奴 | 早期政治自治，后被取消 |
| 波罗的海地区 | 18 世纪北方战争之后 | 地方自治代表会；后设立新省，由总督管理，总督由沙皇委任，向沙皇和枢密院负责 | 波罗的海地区团体-等级管理体制未受影响，但后来在行政改革中受到冲击，帝国力量渗透渐深 | 尽管俄罗斯进行多次行政改革，帝国管理在行政自治和总督管理上变化不大 | 行政自治；在帝国内保持过去的自治地位 |
| 比萨拉比亚 | 19 世纪初 | 安置总督，进行管辖；后自治权被取消，建立新省 | 1818 年以正式法令确认其自治地位；总督管理的地方政府拥有行政权；但最终被取消 | 原初拥有自治权，总督式管理逐渐将其纳入帝国结构 | 行政自治；后被取消 |
| 伏尔加河流域西南部 | 17 世纪开始 | 处于自己的汗和军事-氏族管理之下；各汗被认为是沙皇的总督，沙皇安置官员进行共管 | 各汗掌握大权，但权力很快受到削弱，受到俄罗斯官员监督，在衙门各部设置专门的事务机构进行监管 | 拥有自治权，但逐渐弱化， | 行政自治 |

① Darius Staliunas, *Making Russians: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Russification in Lithuania and Belarus after 1863*,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B.V., 2007, p.2.

| 北高加索 | 17 世纪 | 各汗国与帝俄签订契约，保持效忠；自治地位逐渐被取消，改为普通行政区 | 保留封建世袭统治，依靠自己的首相和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帝俄在此地实行军事–民主管理；后被纳入帝国行政区 | 成为帝俄成员之后，各汗国苏丹权力逐渐弱化，直至消失 | 政治自治；后自治被取消 |
|---|---|---|---|---|---|
| 东高加索 |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 | 附庸国家，逐渐被纳入到俄罗斯行政区划中；山民村社联盟逐渐被取消 | 各国加入俄国之后，君王拥有一切特权并依托自身力量管理全国；随后帝俄干预受保护国内政，各保护国的君王权力逐步丧失 | 加入帝俄之后，各国成为保护国；但在随后的改革中驱赶王廷，合并进帝俄 | 政治自治；后自治被取消 |
| 芬兰大公国 | 19 世纪 | 附庸国家，地方自治机构受到俄罗斯省长监督 | 沙皇与当地贵族合作，公国由依据等级原则选举出来的贵族进行管理；帝国指派总督进行协管 | 虽然自治地位短暂被取消，但很快恢复 | 政治自治 |
| 波兰 | 18 世纪到 19 世纪末 | 俄罗斯沙皇是波兰国王；波兰议会有广泛的立法权；后被纳入帝国结构：维斯瓦河沿岸边区 | 与芬兰类似，等级代表机构、立法机关和总督三方协调；后被纳入帝国的行政结构中 | 自治地位得到保证；波兰起义后，波兰自治地位每况愈下，后被取消 | 政治自治；后被取消 |
| 中亚地区 | 18 世纪–19 世纪 | 大多数汗国被攻灭，加入帝俄国家成为保护国，后逐渐被纳入到帝国结构之中，隶属西伯利亚行政机关；突厥总督等管辖 | 浩罕汗国被俄国所灭，设费尔干省；哈萨克阿布尔哈伊尔汗国自愿加入俄国，要求俄保护其内外安全；而希瓦和布哈拉汗国一直受帝俄保护，由突厥斯坦总督进行政治、军事和对外关系的监管 | 限制对外主权，保留自治权，保护国具有国家形态 | 政治自治；后被取消 |

参考资料：孟军：“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以 20 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波罗的海边区为例”，《学术探索》，2015 年第 5 期，第 124–129 页；孟君：“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的民族政策”，吉林：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9 年；曹璐：“论革命前俄国地方管理体制”，吉林：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4 年，第 36–53 页；亨利·赫坦巴哈登著：《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年。

自下而上的自治传统和自上而下的自治政策，在 19 世纪中后期发展成削弱帝国专制制度和国家认同的离心力，威胁帝国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帝国人口的迁移和民族主义的崛起，帝国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边疆地区逐渐

殖民地化。[①]欧俄南部和东南部、高加索、中亚西亚和西伯利亚等地，都成为俄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②]大量原住民与俄罗斯人混居在一起，相互之间缺乏长久共居所凝造出来的传统和习惯，造成摩擦倍增。各地的民族主义简直就像平地一声雷一般，自先前全无民族主义渊源的地方乍然冒出，或从那些原先只对风俗有兴趣的人群中在崛起。[③]西方民族主义衍生出来的三个基本理想——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鼓动了民族主义运动。[④]尽管民族主义在帝俄时代传播开来，但只要中央能够维持对各种形式地区机构的控制，那么自治就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然而，民族主义观念、资本主义发展、知识分子的形成，以及地方自治的发展，逐渐耗竭了帝俄的精力。为了进行绝对专制，中央取消了大部分地区的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取而代之的是直接统治，促成了外围民族主义崛起。外围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波兰、芬兰、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随后扩展到高加索和中亚的穆斯林地区。

**表 3　自治传统的发酵与外围民族主义的兴起**

<table>
<tr><th></th><th>类型</th><th>作用</th><th>19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th><th>结果</th></tr>
<tr><td rowspan="4">自治</td><td rowspan="2">自治传统</td><td>削弱帝国专制力量在基层影响力</td><td rowspan="2">变革力量</td><td rowspan="4">外围民族主义兴起</td></tr>
<tr><td>扩大民众政治参与要求，促进自由和革命思想传播</td></tr>
<tr><td rowspan="2">自治政策</td><td>民族-领土的长期一致性有助于民族主义力量形成</td><td rowspan="2">民族主义力量</td></tr>
<tr><td>帝国由间接控制到直接控制鼓励民族意识的觉醒</td></tr>
</table>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列宁最早使用“内部殖民观念”用于解释帝俄资本主义的发展。参见[俄]列宁：“再论现实论问题”，《列宁全集（第 3 卷）》，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60-78 页。
② 同上，第 78 页。
③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02-103 页。
④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26-28 页。

自治传统的发酵与外围民族主义的兴起，出现时间是相一致的。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传统，扩大了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变革的力量逐步凝聚成革命的势力。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等民间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进一步动摇了俄罗斯帝国专制的统治基础。他们奉行民粹主义、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动"到民间去"运动，动员农民和知识群体走上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道路。[①]而帝国自上而下的自治政策，塑造了自治共同体。少数族群在自治区内部的闭合交往，更容易将土地与语言、宗教、文化和政治诉求结合在一起，对帝国提出更大程度的自治或独立要求。自治传统的发酵，不仅削弱了帝国的治理能力，同时也更容易促成外围民族的崛起。

## 外围民族主义的兴起与 1905 年革命

外围民族主义首先从帝国西部边缘开始。19 世纪上半叶，波兰发动起义，要求独立建国，反叛俄罗斯帝国，终至失败。1848 年芬兰自由党人崛起，争取享有大公的自治权，反对帝国的直接管辖，芬兰民族主义迅速崛起。1858 年，波罗的海地区爆发大规模骚乱，抗击俄罗斯化政策和帝国的剥削。1863 年波兰再次发动民族起义，立陶宛人响应，立陶宛民族组织成立。波兰骚乱直到 1864 年才被镇压下去，结果使波兰再次失去自治权，彻底成为俄国的附庸。[②]帝国对波兰的直接控制与俄罗斯化政策激化了波兰对俄罗斯的民族憎恶，波兰人渴求社会变革，期待获得机会进行抗争。非俄民族对自治和独立的政治渴求从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迅速蔓延到乌克兰与高加索。乌克兰知识分子在基辅组建"圣西里尔-梅朵迪乌斯兄弟会"，宣扬乌克兰民族主义。[③]在高加索地区，1859 年北高加索战争结束，50 多万切尔克斯人（Cherkessians）和车臣人被流放。沙皇政权于 1864 年占领整个高加索地区，但当地的反抗从未中断。俄国通过对土耳其和伊朗的战争，获得了阿

---

① 张建华："从民粹主义到列宁主义：俄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艰难跋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 年第 6 期，第 121-123 页。

② [俄]梁赞诺夫斯基，《俄罗斯史》，杨烨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304 页。

③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第 161 页。

塞拜疆（Azerbaijan）、纳希切万（Nakhichevan）、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 Karabakh）以及亚美尼亚（Armeinia）。[①]俄国对高加索地区实施俄罗斯化政策，激起高加索山民的激烈的民族情绪。在帝国边缘以及城市势力无法延伸进去的乡村，孕育着社会革命运动的种子，社会主义思想在南高加索弥漫开来。[②]

尽管非俄民族的民族主义抗争遭到帝国的强力镇压，但这无疑强化了帝国西部边缘非俄民族希求从帝国分离的心理，并鼓舞了这些民族的政治抗争。这为民族分离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沃土。19 世纪中后期，帝国革命力量的发展提振了少数民族抗争的士气，推动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化。革命力量与非俄民族主义力量相互合作，对俄罗斯帝国产生重大安全威胁。至 20 世纪初，帝俄骚乱不断。动荡不定的社会转型、迅速增长的反对力量，以及边缘地区的民族抗争，迅速耗竭了帝国的精力。1899-1903 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俄国阶级矛盾更加尖锐。20 世纪初，俄国就具备了以“革命崇拜”来办一切事情、将革命视为“复活节”的社会氛围。[③]1904-1905 年帝国共发生 1034 次工人罢工，各地发生农民骚动 670 次。[④]随着革命热潮在帝国境内兴起，工人、学生和商人似乎顷刻间对体制充满怨恨和憎恶。而民族抗争，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自然融入社会革命的洪流之中。[⑤]沙皇原先利用的“大俄罗斯主义”和“俄罗斯化”民族政策，由于社会矛盾而失去了观念市场，得不到民众支持。1904 年日俄战争的爆发，为帝俄境内的少数族群提供了变革的政治机会。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观念革命一道，构成了帝俄独特的社会革命。躁动不安的革命情绪，影响帝国边缘的民族共同体。1905 年革命，三大地区和两个群体的民族抗争走向历史前台，为二月革命后的帝国民族分离运动埋下伏笔。这三个地区是高加索地区、芬兰和波兰地区，以

---

① Charlotte Hille, *State Building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Caucasus*, Leiden: DC Publishers, 2010, pp.64-66.

② Christoph Zürcher, *The post-Soviet wars: rebellion, ethnic conflict, and nationhood in the Caucasus*, NY: NYU Press, 2007, p.17.

③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第 209 页。

④ [俄]列宁：《列宁全集（第 5 卷）》，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前言第 2 页。

⑤ Abraham Ascher, *The Revolution of 1905: Russia in Disarr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52.

及波罗的海地区；两大群体是穆斯林和犹太人。沙皇政府不仅失去了对这些地区主要城市如巴库、华沙和里加的控制，也成为穆斯林和犹太人集体认同对抗的“他者”。[①]

在巴库，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与俄罗斯人之间普遍不信任。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差异，随着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成为阻碍民族和谐共存的障碍。[②]1904 年底巴库工人大罢工，成为高加索 1905 年革命的催化剂。革命火种迅速散布到卡拉巴赫、耶烈万、舒西（Shushi）、第比利斯、纳西切万和占贾（Ganja）。在革命混乱之时，高加索各地爆发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激烈的族群冲突，即 1905-1906 年的亚美尼亚-鞑靼战争（Armeno-Tatar war），造成数千人死亡。[③]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人的族群冲突，成为族群矛盾演绎为民族仇恨、并传导至族群战争的典型案例，也为后来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埋下了伏笔。

受帝俄压迫较深的芬兰和波兰两个民族，也掀起了民族自治和民族独立的浪潮。与高加索各民族不同的是，芬兰和波兰民族意识更易被唤醒，帝国处理这些“先进”民族（more advanced peoples）的问题更为棘手。[④]两个民族与帝俄中央政权的斗争更注重策略。1901 年芬兰人向沙俄政府呈文，抗议沙皇政府践踏芬兰宪法政策，违背芬兰自治传统。该呈文得到 50 万人的响应。[⑤]1904 年，芬兰激进分子在赫尔辛基刺杀总督尼古拉·博比科夫（Nikolai Bobrikov），帝俄政府迅速清洗政府中大批反俄化政策的官员，遭致芬兰人民的强烈抗议。1905 年革命爆发时，芬兰社会民主党在赫尔辛基响应，成功组织芬兰大公国总罢工，迫使沙皇承认自治并暂缓实施新征兵法。

---

① Dominic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p.42.

② Ohannes Geukjian,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conflict in the South Caucasus: Nagorno-Karabakh and the legacy of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p.43.

③ Caroline Cox and John Eibner, *Ethnic Cleansing in Progress: War in Nagorno-Karabath*,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the Islamic World, 1993, p.25.

④ G.A. 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1552-1917*, London: Fontana Press, p.381.

⑤ [俄]列宁：“芬兰人民的抗议”，《列宁全集（第 5 卷）》，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编译，第 317 页。

[1]波兰并入帝俄之后，曾经多次反抗帝俄的同化政策，但都遭到失败。然而波兰却逐渐成为帝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占帝国人口 7.9%的波兰，工业产值达到帝国总产值的 25%，大批波兰人管理俄罗斯经济各部门。[2]帝俄在政治上加紧控制波兰以抵消其经济影响，例如不允许地方政府和城市自治，禁止中小学教授波兰语，政府部门歧视波兰裔及天主教徒。[3]帝俄的高压民族政策，积累了很深的民族矛盾。在 1905 年革命爆发后，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在波兰各地出现，压抑已久的民族意识，通过社会抗争运动得到释放。波兰民众有意识地利用政治机会表达诉求：家长们抵制俄化学校，民众参与罢工运动要求获得平等地位，农民被组织起来发动教区运动，以及组建政治和社会组织吁求进入体制等。[4]波兰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抗争手段多元化，标志着波兰对抗帝俄进入了新阶段。

作为欧俄最为发达的地区，波罗的海地区的社会民主意识很早就在这里生根。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组建政党，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南部地区逐渐成为革命政党的活动基地。[5]20 世纪初，波罗的海三省（库尔兰省，Kurland；利夫兰省，Livland；爱沙尼亚省，Estland）躁动不安的情绪源于两个方面：帝俄坚持在该地区教育系统强制推广俄语；强迫当地人改宗信仰东正教。[6]1905 年革命爆发，波罗的海地区趁势而起，各省相继发动罢工运动。其中，利夫兰省表现最为积极。根据帝国官方数据，其省内的拉脱维亚罢工人数占总工人比例的 4.98%，为帝国最高。[7]根据苏联官方统计，1905 年革命，帝俄各省工人参与罢工次数，利夫兰省为平均 4.8 次，排第一；库尔兰省为平均 4.2 次，排第五；爱沙尼亚省为 3.1 次，远高于平均值 2.4

① 新的征兵法要求芬兰民众在俄国军队中服役，芬兰子弟被强行编入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迥异的军队服役，废除了芬兰子弟每年服役名额限制，并取消芬兰地方政权参与军事预算的权利。
② Abraham Ascher, *The Revolution of 1905: Russia in Disarray*, p.155.
③ Ibid.
④ Robert Blobaum, “The Revolution of 1905-1907 and the Crisis of Polish Catholicism”, *Slavic Review*, 1988, Vol.47, No.4, p.667.
⑤ Toivo U.Ruan, “The Revolution of 1905 in the Baltic Provinces and Finland”, *Slavic Review*, 1984, Vol.43, No.3, p.459.
⑥ Abraham Ascher, *The Revolution of 1905: Russia in Disarray*, p.159.
⑦ Toivo U.Ruan, “The Revolution of 1905 in the Baltic Provinces and Finland”, p.460.

次。[1]波罗的海各省城市大罢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偏远乡村，农民也发起骚动，袭击地主，纵火，破坏庄稼等，其中爱沙尼亚地区最为严重。[2]波罗的海地区的抗争运动历史，影响了其日后对帝俄乃至苏联中央政权的态度，为其日后的民族分离主义埋下伏笔。

前文所述的是帝俄西部边缘地区爆发的革命斗争，而在帝国东部和南部地区，特别是中亚地区，穆斯林与帝俄之间的摩擦不断。由于帝俄在穆斯林中强制推行改宗和民族同化，穆斯林的历史遗产、地方文化和风俗习惯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尊重，穆斯林问题迅速成为帝国晚期的一个棘手问题。[3]在中亚草原地区，基督教徒被认为是所有穆斯林唯一不可调和的敌人，捍卫伊斯兰教的思想是能够激起穆斯林战斗的一个刺激因素。[4]为了避免激怒广大伊斯兰教群众，帝国在重视发展东方学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欧亚内陆穆斯林团体的自治地位，并吸纳穆斯林贵族进入体制之中。高加索和突厥斯坦的贵族保持土地和牲畜的所有权，拥有贵族地位。[5]1905 年革命以后，当局准许穆斯林社会组织和会议存在，实施宗教宽容政策。[6]第一次全俄穆斯林大会在下诺夫哥罗德召开，旨在联合穆斯林解决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随后，在第二届会议上，成立了俄罗斯穆斯林联盟政党，将地方穆斯林组织联合起来。[7]1905-1907 革命给伊斯兰教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伏尔加-乌拉尔、中亚、高加索和哈萨克草原上的穆斯林精英和神职人员，被允许举办集会，建立政治团体参与杜马选举。[8]帝国晚期，穆斯林力量得到壮大，成为帝国

---

① Ibid, p.460.

② Ames Ernest, *The Revolution in the Baltic Provinces of Russia*, London: Routledge, 1905, pp.35-41.

③ Vera Tolz, “Orientalism, Nationalism, and Ethnic Divers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005, Vol.48, No.1, p.140.

④ 孟君：“政治问题抑或宗教问题——关于俄罗斯帝国穆斯林问题的探源”，《人民论坛》，2005 年第 12 期，第 237 页。

⑤ 汪金国、洪丽萍：“从 1897 年全俄人口普查看俄罗斯帝国穆斯林的社会阶层状况”，《世界民族》，2006 年 1 期，第 71 页。

⑥ 汪金国、金宁涛：“论俄罗斯帝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与穆斯林政策的变化”，《宁夏社会科学》，2009 年第 6 期，第 87 页。

⑦ 李昕：“伊斯兰教在俄罗斯帝国的发展特点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 年第 2 期，第 190 页。

⑧ Dominic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p.220.

政治变迁的重要变量。

1905 年革命惊醒的另一个群体则是俄国犹太人。犹太人问题一直是帝俄时代重要的民族问题。沙皇政府制定多条严格法令，设置隔离区，限制境内犹太人对外交往，限制犹太人受教育的机会和职业选择。犹太人对体制积累了大量不满。在 1905-1907 年革命期间，犹太人参与社会运动，并巧妙地将革命社会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获得全境犹太人前所未有的支持。[①]犹太人积极利用沙俄政府的弱点，多次发动社会革命。[②]犹太人的抗争与社会革命的结合，演绎出民族主义的新形式，加速了帝俄社会革命的进程。

## 结 语

1905 年革命以后，俄罗斯帝国危机更为深重。短暂的宪政改革并没有缓和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一战的爆发又进一步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矛盾。[③]在 1905 年革命失败后，帝国边境各地的分离主义势力进入潜伏期，并时刻关注政治机会窗口，期待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俄国与欧陆强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事对抗给民族分离带来机遇。[④]帝国的政策也让人失望。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中亚的少数民族被排除在征兵范围之外。[⑤]这直接导致中亚地区骚动。芬兰人以不被帝国征召入伍为荣。在一战爆发之前，波兰人期盼大国之间对抗能够为自己复国创造机会；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努力寻求德国的帮助，阿塞拜疆人与土耳其关系渐佳；乌克兰人着力将寻求文化自治，波

① Mikhail Krutikov, “Russian Revolution and Jewish National Revival: Representations of 1905 in contemporaneous Yiddish Fiction”, *La Rassegna Mensile di Israel*, 1996, Vol.62, No. 1/2, p.229.
② Theodore R.Weeks, “Polish-Jewish Relations 1903-1914: The View from the Chancellery”,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1998, Vol.40, No.3/4, pp.241-242.
③ Hans Rogger,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A Russian Dilemm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62, Vol.4, No.3, p.262.
④ Eric Lohr, Ver Tolz, Alexander Semyonov and Mark von Hagen edited, *The Empire and Nationalism at War*, Bloomington: Slavica Publishers, 2014, p.4.
⑤ Aviel Roshwald, *Ethnic Nationalism & the Fall of Empires, Central Europe, Russia& The Middle East, 1914-192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91.

罗的海各省的抗议和叛乱时断时续。[1]民族主义势力一方面抵制俄罗斯化政策，另一方面在寻找国际支持的机会。他们希望发生战争或是帝国腐朽崩溃，从而为获得国际支持脱离中央政权的管辖创造条件。[2]

1917 年二月革命埋葬了罗曼诺夫王朝，并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作为一场社会革命，二月革命释放了共同体（民族和族群）和社会的需求。帝国边缘的族群冲突，随着社会矛盾的释放而越演越烈，各共同体的分离主义倾向越来越强。社会革命与民族主义在这特殊的时代，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成为分离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的历史前提。在帝国崩溃之际，民族分离主义在帝国瓦解的废墟上涌现出来，成为欧亚地区第一波分离主义浪潮。摩尔达维亚人、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白俄罗斯人、顿河哥萨克、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高加索地区的其他民族纷纷仿效，建立起民族主义政权，不承认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在外界势力的支持下，欧亚地缘政治板块迅速碎片化，并在欧亚地缘政治板块边缘成立新的民族政权。战争、革命与民族分离主义相互交织，构成了 20 世纪初期欧亚地缘政治演变的主题。

---

**【Abstract】**In term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Russian Empire, ethnic separatism is an important incentive. The emergence of ethnic separatism is mainly related with late imperial policy failures. As far as national policies are concerned,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it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due to its differentiate governance based on autocracy, but later with Greater Russia as the core concept , it enforced direct rule,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Russification, distinguish aliens and constructed minorities as “the other”. In empire governance, the top-down autonomy tradition destroys the autocratic ability of the empire; while frequent cancelling autonomy polici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authoritarian rule, has caused greater ethnic conflicts. These factors led to the rise of periphery nationalism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and were finally released during

① Ibid.
② [美]迈克尔· 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韩召颖译，第 95 页。

the 1905 revolution.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empire's external environment, ethnic separatism gradually emerged and became an irresistible trend.

**【Key Words】** Russia, Empire Governance, Autonomy, Peripheral Nationalism, Ethnic Separatism

**【Аннотация】** Этнический сепаратизм послужил важным стимулом для распад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Этнический сепаратизм связан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ошибками позднего этап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На более ранни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этапах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были достигнуты определён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однако на более поздних этапах,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ведущей концеп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еликодержавия, желание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прямое правление, проведение политики русификации, различение народностей России, привело к образова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меньшинств. В сфере управления импери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автономное правление сверху вниз разрушило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сомодержавия в империи, част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политике с целью укрепления авторитарного правления привели к ещё большим этническим конфликтам. В конц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мперии данные факторы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росту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на периферии страны, и достигли своего апогея во время революции 1905 года. Вслед за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вовне империи этнический сепаратизм стал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оявляться и превратился в непреодолимую тенденцию.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импер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автономия, периферийн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этнический сепаратизм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2016 年第 3 期 俄 罗 斯 研 究 No.3, Jun. 2016
总第 199 期 Russian Studies Gen. No.199

东正教

# 试论 17 世纪俄国东正教会分裂的原因

刘博玲*

**【内容提要】**17 世纪俄国东正教会的分裂运动，是俄国宗教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教会分裂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改变某些仪式的细枝末节，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从教会内部而言，这次分裂是教会内部低级神职人员和高级神职人员之间积累已久矛盾的爆发，也是尼康受狂热的神权政治理想的驱动，在教会中积极推行拜占庭化的结果。从教会外部来说，沙皇的"第三罗马"帝国梦想及其积极推行的西欧化政策，促成和巩固了教会分裂的事实，使得俄国东正教会的分裂无法愈合。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　第三罗马帝国　俄罗斯教会分裂

**【中图分类号】**D751.2; B976.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3-0163(21)

17 世纪俄国东正教会的分裂运动，是俄国宗教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1653 年，在沙皇的支持下，俄国东正教牧首尼康对俄国东正教经书和仪式进行了重大改革，要求按照希腊正教经书修正俄国东正教经文，统一俄国各种东正教仪式，包括不允许教徒用两个手指画十字，要求他们像希腊教徒一样必须用三个手指画十字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改革引起了部分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徒的强烈不满，最终造成了教会分裂。那些反对尼康改革、坚持俄国旧礼仪的信徒从教会分离出来，被称为分裂派或者旧礼仪派（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 刘博玲，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

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教会分裂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教会分裂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改变某些仪式的细枝末节，这次分裂运动的发生有着更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既有俄国教会内部的原因，也有来自教会外部的原因。

笔者认为，造成这次教会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1）处于混乱时期的教会内部的矛盾——低级神职人员对高级神职人员的一些不道德行为很不满，要求在教会中实行礼仪和道德的复兴，这激化了低级神职人员和高级神职人员已有的矛盾，奠定了教会最终分裂的基础。（2）教会内部的拜占庭化——让俄国的东正教成为世界东正教的中心，这促使牧首尼康在教会中积极按照希腊礼仪强制进行改革，直接导致了教会的分裂；沙皇建立"第三罗马"的理想与尼康建立"东正教"帝国的理想不谋而合，因此沙皇积极支持尼康的改革，加剧了教会的分裂。（3）教会外部的西欧化倾向——在"第三罗马"理想的驱动下，以沙皇为首的俄国上层社会中西欧化倾向明显，教会外部出现了许多不利于教会统一的因素，使得教会分裂的状况得以巩固。

## 一、教会内部的矛盾

17 世纪的俄国内忧外患，国内发生了暴动、起义，对外又不断与波兰、立陶宛、土耳其、瑞典发生战争，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整个世纪是在极度紧张和不安，在意见分歧、口角和争论中度过的。这是一个不断造反和起义的世纪。"[①]

从 1604 年伪德米特里上台到 1613 年米哈伊尔建立罗曼诺夫王朝的十年被称为"混乱时期"。这个时期俄国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悲剧，对俄国人的身体和心灵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俄国人开始思考"罗斯怎么了，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最虔诚的国家'处于灭亡的边缘，并且威胁到它的继续存在"。[②]思考俄国命运的一些人将其作为上帝对罗斯罪孽和统治者的惩罚。

① ［俄］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著，徐凤林等译：《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年，第 84 页。
② 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 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М.:Институт ДИ-ДИК, 2006. С.65.

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会有由于罗斯没有遵守上帝的约，没有用基督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东正教兄弟，不想承担自己对国家和教会命运的责任而受到惩罚的主题。当时俄国最大的宗教中心——圣三一修道院的院长修士大司祭狄奥尼斯（Дионисий）就是勇于揭露俄国社会问题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俄国人的罪孽之一是酗酒，还指出富人的社会罪孽，写了很多揭露当时社会问题的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狄奥尼斯公开指出，俄国人，特别是莫斯科的上层人物，没有按照基督徒应有的方式行事，因此受到上帝的惩罚。“他感兴趣的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和错误，而是整个罗斯的罪孽和整个社会的举止，是整个第三罗马的失误，是罗斯对基督约的轻视。”[①]

因此，俄国一些虔诚的东正教徒提出应该进行改革，提高人的道德水平，改变社会上的不良风俗。并且改革首先要从教会内部开始。

在 17 世纪初期的俄国教会改革中起关键作用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以深受狄奥尼斯影响的神甫伊万 • 涅罗诺夫（Иван Неронов）为代表，另一部分人是当时围绕在沙皇周围，为巩固神职人员和教徒们的道德而建立的“爱上帝”小组——Боголюбцы[②]。这两部分人在尼康改革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教会内部进行改革，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们是旧礼仪派的前身，以后成了捍卫俄国旧信仰，反对尼康改革的主要力量。

伊万 • 涅罗诺夫是教会早期改革的先锋人物，他积极宣扬神职人员要过道德的生活，认为当时那些无秩序、不道德现象的原因在于神职人员缺少基督教教育，尤其是从礼仪中获得的基督教教育。

1636 年，下诺夫哥罗德的九位大司祭和神甫在涅罗诺夫的领导下向约瑟夫（1634-1641）牧首递交了一份报告，指出俄国教会中让人失望的道德状况，请求采取紧急措施提升宗教虔诚和挽救处于危险中的东正教。他们在给牧首的信中指出了弥漫在教会中的混乱和不遵守信仰的情况，并且指责神职人员懒惰且玩忽职守。由于当时教会中一些神职人员想尽快结束礼拜，因此在教会中进行多声礼仪[③]（神职人员同时读祈祷文和唱诵圣咏）。这导致人

① 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 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С.66.
② 又译“虔诚信教者”小组和“热心宗教事业”小组。
③ “Многогласие”多声礼仪，进行礼仪的时候唱咏和祈祷同时进行。

们听不懂礼拜的内容，信徒们不能够从教堂中获得有益精神的教育。除此之外，社会上也充斥着多神教残余的混乱无序现象。涅罗诺夫认为，这些无秩序不道德现象的原因在于缺少基督教教育，尤其是从礼仪中获得的基督教教育。他们向牧首建议，为了使基督的话语和祈祷的意义进入信徒的心中，必须缓慢、清晰、明白地通过一种声音进行礼拜。应该禁止多声礼仪，采取措施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改善神职人员的纪律状况。下诺夫哥罗德神父们的声音被牧首听到了，牧首部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1636 年 8 月 14 日，牧首以莫斯科神职人员之首的名义发布了一份特殊的公告，规定教会中禁止两种、甚至三种声音同时进行礼拜，并且要求神甫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教会的礼拜和生活。几乎与此同时，牧首的监察员被派往下诺夫哥罗德，全权负责检查教会的书籍，重建神职人员的秩序。[①]这次改革获得了积极的响应，礼仪和道德的复兴运动主要覆盖了俄国北部和伏尔加河上游，在分裂后这里成为旧礼仪派的主要发展地区。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于 1645 年登上皇位，当时沙皇还不到 16 岁，所以身边的人对他影响很大。“沙皇周围有三位对他有特殊影响的人物，他们是年迈聪明的沙皇的叔叔大贵族莫洛佐夫（Морозов）、沙皇的忏悔神父斯特凡·沃尼法季耶夫（Стефан Вонифатьев）和少年沙皇本人亲近的朋友费奥多尔·勒季谢夫（Федор Ртищев）。这三人都忠诚于教会，是真正的信徒。对他们而言，信仰是个人生命和国家事务的一部分，他们总是在生活中尽力践行信仰的原则。”[②]

1647 年，涅罗诺夫从下诺夫哥罗德来到莫斯科，加入了沙皇身边的这个宫廷小组。这样，涅罗诺夫和斯特凡·沃尼法季耶夫、沙皇的朋友费奥多尔·勒季谢夫，以及后来成为牧首的尼康，共同组成了“爱上帝”小组。

1649 年，“爱上帝”小组决定在全俄宗教会议上提出关于单声礼仪的问题，此举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单声礼仪。他们认为，单声礼仪是他们纲领的主要部分，恢复完整的礼仪是教会和国家复兴的神秘的道德和教育工具。

① 参见 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 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С.92.
② Там же. С.103.

当时以主教为首的高级神职人员并不想在全国推广单声礼仪，但是沙皇认为“爱上帝”小组的提议是正确的，因此向牧首约瑟夫施加压力，这样牧首约瑟夫没有立刻否决推广单声礼仪的决议，他决定暂时推迟单声礼仪的问题，同时向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寻求建议。1650 年 2 月 16 日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回复坚决而清晰：单声礼仪不仅仅是可以的，而且应该在所有教堂中推行。[①]

最终牧首发布公文解决了这一问题。“爱上帝”小组最终得到了清晰明确的回复，可以说，他们在宗教会议上战胜了主教，这也是司祭对主教的胜利，低级神职人员对高级神职人员的胜利。1651 年 2 月 9 日新的宗教会议召开，会议的纲领记录在沙皇亲自起草的报告中。纲领的第一点就是支持单声部唱法，第二点是要推行更加清楚的唱咏，第三点是读诗篇的问题。[②]尽管宗教会议最终决定推行单声礼仪，但是主教管理机构间接支持的争议在一些偏远地方和外省继续着，多声礼仪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末。

在与沙皇及政府合作的期间，“爱上帝”小组没有局限于传道、恢复单声礼仪、推广新的印刷出版物。他们利用自己对政府的影响，尽力在生活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建立能够提升普通民众和神职人员道德的环境，减少酗酒，吸引居民进入教堂。

1645-1652 年间，“爱上帝”小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政府和教会出台了很多法令禁止酗酒，严厉谴责酗酒，禁止神职人员和修士进入酒屋、喝伏特加，命令神职人员自身与酗酒做斗争。

“爱上帝”小组为规范礼仪，推行和加强单声礼仪所进行的多年的斗争，就是为了确立俄国古老的章程和古老的信仰。而以尼康为首的官方教会对经文和仪式进行的修订，只是为了与希腊仪式保持一致，以实现“东正教帝国”的梦想，没有顾及俄国本国的传统，因此尼康的新举措必然会引起这些为复兴俄国教会而斗争的“爱上帝”小组成员的反对。

此外，17 世纪初期俄国教会中高级神职人员和低级神职人员的矛盾日益突出。蒙古入侵以后，俄国东正教会中主教的人选主要从修士中选拔任命。

① 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 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С.105.
② Там.же. С.115-116.

这种“修士出身”的主教逐渐将主教变成了与白衣神品隔离的组织，他们不理解低级神职人员的需要，经常鄙视这些没有受过教育、非常贫穷、来自堂区的没有影响力的兄弟。白衣神品和主教团之间的差别表现在教育、生活方式和物质生活方面。白衣神品的大多数人是在距离修道院很远的地方接受的教育，如果白衣神品和平信徒的子女偶然进入修道院学习，修道院的领导也会努力将他们留到修道院或者剃度。因此堂区的神甫或者辅祭的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不太识字。而相反，主教中很多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擅长写作。除此之外，主教拥有很多财富。“甚至像特维尔和罗斯托夫这样的小主教区的主教，都会从 1000 多名教会农民那里获得收入”[①]。而司祭的物质状况与拥有财富保证的主教相比要差很多，而且他们与普通神甫一样，完全依附于主教的管理。

另外，由于当时白衣神品地位低下，接受的教育很少，所以当时教会中普遍存在白衣神品不识字的问题，他们只能在形式上或者发音上进行礼仪。如果有改变，这些人就不能完成礼仪，这也是造成旧礼仪派分裂的原因之一。

## 二．教会中的拜占庭化

俄国历史学家曾写道：“拜占庭化是 17 世纪后半叶典型的特点。”[②]尼康是拜占庭化的积极践行者。俄国哲学家弗洛罗夫斯基如此评价尼康：“就像彼得大帝后来狂热地喜爱一切东西和一切穿着都要按照德国的或者荷兰的一样，尼康也几乎病态地倾向于一切都按照希腊的样子加以改造和装潢。”[③]

尼康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勇气深受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赏识。尼康本人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的权力欲极强，一心想实现东正教帝国的梦想，让莫斯科成为东正教世界的中心，而他本人是领导者。1652 年尼康坐上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会牧首的宝座时，命令教会向他做出承诺：“既然要他当教会牧首，就得听命于他，犹如听命于上司、神甫和慈父一样。”[④]尼康

① 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 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С.105.
② Крамер А.В. Раскол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в середине XVII века.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14. С.58.
③［俄］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著，徐凤林等译：《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第 93 页。
④ 乐峰：《俄国宗教史》（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101 页。

掌权后，继续着手俄国仪式的核心问题，就像以前他和“爱上帝”小组合作的那些年那样。但不同的是，在 17 世纪 40 年代，他的想法与涅罗诺夫和沃尼法季耶夫（Вонифатьев）一样，想复兴俄国传统的礼仪，消除多声礼仪的弊端，而现在他想让俄国礼仪与希腊礼仪一致。

耶路撒冷牧首帕伊西（Паисий）对尼康的影响很大。1649 年耶路撒冷牧首帕伊西来到莫斯科，发现俄国的礼仪与希腊有很多不同。他与尼康进行了很多次谈话，在谈话中指出了俄国礼仪和现代希腊礼仪的众多不同。他和尼康认为是俄国偏离了古希腊的礼仪，发展了地方的东正教礼仪。事实上，在罗斯受洗时，在 7 世纪到 8 世纪希腊有两种礼仪传统，俄国采用了其中的一种，而在拜占庭占主导的是另一种。后来希腊人又改变了自己的礼仪，因此俄国保留的是更古老的那种。

约瑟夫牧首去世以后，尼康成了新的牧首。尼康接任后做了很多贡献。但是“爱上帝”小组的活动唤起了尼康对神权政治的空想，他想建立一种以牧首为首的教会体系在国家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政教关系。基于这种信念，尼康对格鲁吉亚提供了帮助。此外还帮助波兰和立陶宛联邦的居民和西南罗斯对抗波兰天主教的入侵。[①]尼康当上牧首后，想影响俄国的政策，保卫和联合所有的东正教国家。他想将所有东正教信徒统一到俄国沙皇和莫斯科牧首之下，将俄国变为泛东正教帝国。

为了解决引起俄国不安的有关俄国礼仪正确与否的问题，俄国派懂希腊语的学者苏汉诺夫（Суханов）到阿陀斯山（Афон，Athos）求证到底是希腊的礼仪正确还是俄国的正确。阿陀斯山上的修士和帕伊西一样，忘记了在 8 世纪他们将画十字的方式改成了三个手指。希腊人不知道俄国礼仪的历史起源，就说俄国的礼仪不正确，因为他们认为，既然俄国是从希腊人那里接受了基督教，俄国就应该永远以他们为榜样，不偏离希腊的习俗。苏汉诺夫坚决捍卫俄国的东正教传统，坚称俄国的礼仪是更古老和传统的，而希腊在佛罗伦萨会议中改变了自己的传统。而且他以“往年纪事”和“启蒙者”为依据，强调俄罗斯不是从希腊人，而是从使徒安德烈那里直接接受的基督教。

苏汉诺夫没有从阿陀斯山那里得到确切的答案，但是以他为代表的很多

① 参见 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 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С.122-123.

神职人员坚信俄国礼仪的正统性，因此坚决捍卫俄国的礼仪。而尼康担心俄国礼仪与希腊礼仪的不同，会削弱将来俄国作为全人类东正教会领导的地位，会影响自己“东正教帝国”梦想的实现，因此命令修改教会书籍。印书院搜集了古老的俄国礼仪与古希腊礼仪的资料，但是尼康并没有采用。他命令翻译现在的希腊书籍。

1653 年，在大斋戒期之前，尼康没有召开全体会议，而是凭借自己的权力给各个教堂发下一道教令，规定在诵读叙利亚的以法莲的著名祈祷文时要叩几次头，而且他还要求要用三个指头划十字。[①]尼康的改革没有止步于改变画十字的方式，他想改变所有的礼仪。这种态度损毁了教会的权威，伤害了“爱上帝”小组对俄国礼仪传统的忠诚态度。在尼康改革初期，“爱上帝”小组与尼康进行了强烈的对抗，坚决捍卫俄国的传统礼仪。这个小组的许多成员后来成了旧礼仪派的导师，继续与官方教派斗争，捍卫俄国的古老传统。尼康当上牧首后，在很多方面继续了“爱上帝”小组的计划，但他是独自行动的，没有重视“爱上帝”小组存在的事实本身，忘记了自己与他们以前的朋友情谊，以及为了教会的共同工作。在沃尼法季耶夫和涅罗诺夫与牧首约瑟夫发生冲突之后，尼康对“爱上帝”小组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为他自己也参与到与约瑟夫的斗争中，很了解牧首的困境，所以他避免和以前的朋友合作。

正如历史学家 C.A.津科夫斯基所言，尼康自己未必已经考虑清楚了一系列新举措中的第一步。他也没考虑清楚，将俄国人习惯了几百年的两指画十字改变成三指画十字会在教会和人们中间引起多大的波动与不安。俄国从接受基督教开始就是两指画十字，在 16 世纪初曾经尝试推广新的希腊式画十字方法，但是在 1551 年的百章会议上受到了谴责。现在尼康却决定凭借自己的一道命令，并且在宗教敏感时刻的大斋期前夜，取消古俄国和古希腊画十字的方式，代之以来自希腊的新的方式，这无疑会引起人们的强烈不安与反对。“爱上帝”小组对这个命令本身、它的形式、以及尼康为了讨好希腊人而对俄国传统表现出的轻视感到震惊。

①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301 页。

涅罗诺夫、阿瓦库姆和其他在莫斯科的“爱上帝”小组成员聚集到一起开会，讨论怎样看待牧首通告的问题。阿瓦库姆后来这样回忆被牧首命令震惊了的“爱上帝”小组成员的状态：“心被冻住，脚开始颤抖。”[①]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下定决心反对这个新当选的牧首——他们以前的朋友、沙皇和教会曾经许诺在教会事务上绝对听从于他的这个人。

“爱上帝”小组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动摇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即涅罗诺夫出发前往丘多夫修道院（Чудов монастырь）寻找解决方案。在“爱上帝”小组和尼康发生冲突的最初日子里，阿瓦库姆成了涅罗诺夫的得力助手。在离开修道院的那段时间，涅罗诺夫把自己的堂区交给大司祭阿瓦库姆管理。在丘多夫修道院经过严酷的斋戒和祈祷，以及在天成救主像（Спас Нерукотворный）前的祷告，涅罗诺夫听到一个声音，这声音似乎来自圣像：“约翰，要敢作敢为，面对死亡也不要害怕。”[②]

这个呼吁捍卫信仰和两指画十字的声音消除了涅罗诺夫的一切怀疑。回到修道院后，他把这个异象讲给了阿瓦库姆、主教保罗·科洛缅斯基（Павел Коломенский）和其他“爱上帝”小组成员听。他们决定上书沙皇，递交抗议牧首行为的呈文。请愿书的文本是由阿瓦库姆和大司祭丹尼尔·科斯特罗姆斯基（Даниил Костромский）撰写的。丹尼尔·科斯特罗姆斯基来到莫斯科，就是为了和其他“爱上帝”小组成员商议这个事情。抗议的内容非常尖锐，“爱上帝”小组成员写道，基督教纯洁的学说可能会在罗斯消失，教会的领导尼康偏离了东正教的约。[③]

沙皇将请愿书转交给了牧首尼康，他坚持让牧首暂缓他的新举措。尼康这次同意了，但是他坚持在生活中继续推行通告，俄国教会重又恢复了和平。

如果在推行新举措的开始尼康征得教会的同意，或者在宗教会议上进行讨论，然后强制实施，那么“爱上帝”小组或许只能服从。但是尼康在推行其新举措之初坚持个人解决仪式问题的态度，结果给自己的措施和行为带上了无根据的特点，[④]牧首本人和“爱上帝”小组运动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

① Зеньковский.С.А. 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С.170.
② Там же.С.170.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С.171.

大的变化。尽管如上文指出的那样，尼康在很多方面继续了“爱上帝”小组的纲领，但是他是独自行动的，甚至没有考虑到“爱上帝”小组的存在，忘记了自己与他们的友谊和为了教会的共同工作。

在尼康继任牧首前的几年间，“爱上帝”小组的声音响亮地在俄国教会传开。沙皇要求牧首约瑟夫重视他们，接受他们整顿俄国东正教会的纲领，“爱上帝”小组已经不再惧怕主教的愤怒和威胁了。然而现在，尼康从教会拿到独裁的权力后，就要取消“爱上帝”小组对教会的一切影响，不再和他们商议，他开始推行自己个人对教会的领导，企图以此取代教会的集体领导。在和“爱上帝”小组斗争的过程中，尼康在高级神职人员和官僚阶层找到了支持力量。

尼康与“爱上帝”小组的斗争开始了。他吸取了第一次改革尝试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着手进行新的改革，将争论从原则立场变为纪律立场。涅罗诺夫与尼康发生正式冲突的导火线是大司祭洛金·穆罗姆斯基（Логгин Муромский）事件。当时这位有名的“爱上帝”小组成员、教堂主持洛金神甫，因揭露长官妻子的不道德行为而陷入与部队长官的冲突之中。尼康站到部队长官的一方，他成立了世俗和神职官僚体系的统一战线对抗“暴乱分子-大司祭”，命令逮捕洛金。在 1653 年 7 月召开的莫斯科神职人员宗教会议上，涅罗诺夫在牧首面前发表支持洛金的言论。这位“爱上帝”小组资深成员的发言，马上演变成了和尼康的激烈争论。作为报复，牧首以沙皇的意见和权威下令流放涅罗诺夫。涅罗诺夫决定向沙皇上诉。但是曾经允诺向涅罗诺夫提供帮助的罗斯托夫都主教约纳（Иона）和其他著名的教会活动家，由于畏惧牧首尼康，拒绝当见证者，因而使得尼康指控涅罗诺夫破坏纪律和毫无根据地控告牧首的“罪名”成立。涅罗诺夫受洛金事件的牵连，被捕，然后被流放。涅罗诺夫被捕和被流放以后，他的朋友决定继续斗争。阿瓦库姆和丹尼尔立即向沙皇递交了包含解释和反抗内容的呈文。但是尽管对牧首有新的不满，沙皇仍旧信任尼康在宗教会议上所说的话，认为尼康是唯一能够对教会负责的人，把反对尼康的活动压了下去。

几天后，牧首利用阿瓦库姆和他喀山教堂同事之间的矛盾，逮捕了阿瓦库姆本人和 33 位参加礼拜的教区居民（有些资料说 66 位）。当时，因为其

他神甫拒绝向阿瓦库姆提供教堂，所以他只能在棚子里做礼拜，而教规是禁止在棚子里做礼拜的，牧首便以阿瓦库姆违背教规为借口逮捕了他。与此同时，逮捕其他“爱上帝”小组成员的行动也开始了，牧首这次决定要彻底铲除“暴动分子”——大司祭们。

除了这些有名的“爱上帝”小组领袖之外，许多其他神甫和教区居民在尼康组织的迫害“爱上帝”小组的运动中也受到迫害。在首都，“爱上帝”小组的追随者生活在恐怖之中。在牧首的命令下，教会中遍布书吏，寻找所有那些接近“爱上帝”小组或者参与其运动的人。教区居民都避免进入教会，教堂的堂长也被逮捕了，他们对尼康逮捕自己神甫的行为很愤怒，甚至拒绝像平常一样捐款和支付费用。

与涅罗诺夫和他以前的朋友分道扬镳以后，尼康的行为变得更加谨慎。1652 年开始的搜集古代书籍和文献的工作仍在继续。1653 年苏哈诺夫从东方带来的 500 多本书也被加入到搜集的书中，东方牧首寄来大约 200 部旧章程和礼拜书籍，阿陀斯山修道院也寄来 50 部古代祈祷仪式书籍。很多珍贵的材料是其他主教和修道院寄来的。[①]尼康此举是希望从旧的典籍中获得对新礼仪的支持么。“爱上帝”小组被流放和被击溃之后，尼康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设立能够促进实施他的新举措和出版新礼拜书籍的机构方面。1654 年初，印书院被置于牧首的控制之下，开始完全被尼康任命的人所把控。

尼康下一步的重要工作，是要让教会承认，必须按照旧的教会斯拉夫材料和希腊材料重新审查所编写印刷的书籍。1654 年春天，尼康召开了俄国地方宗教会议。在这次宗教会议上，尼康说，建立莫斯科牧首制之始俄国教会就保证，要遵循基督的训诫，遵守全世界宗教大会的规定，在教条和教规方面与希腊教会保持一致。接着，他宣读了 1593 年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的成果，那次会议批准了莫斯科牧首制的合法。然后，尼康强调了新希腊礼仪与俄国礼仪的差异。尽管教会决定修改礼仪，但是不得不承认俄国礼仪是建立在古希腊礼仪基础之上的。宗教会议同意了牧首的论证，只有主教保罗 •科洛缅斯基不同意修改俄国书籍中的某些部分。参加会议的 35 人中有 29 人记录并签署了会议决议，主教保罗签署了保留意见，实际上是表示不同意。这

① 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 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С.176.

样有七位与会者拒绝批准牧首的提议。后来，这七个人中仅有沃尼法季耶夫得以保全，而主教保罗在会议以后被捕了，他被尼康的手下毒打一顿，然后被流放到北部诺夫哥罗德地区，在那里被绞死或者饿死了，有关其他五个人的具体消息没有被记载下来。尽管这次会议的决议规定，按照旧的书单对俄国章程进行对比研究，如果俄国章程与旧的典籍有不同再修改，但是尼康却下令印书院立刻着手按照新希腊出版物修订俄国礼拜书籍。1654 年 4 月 1 日新版的祈祷书开始印刷，4 月 25 日完全新的史册（教会法律汇编）开始印刷，它以 1574 年印刷的威尼斯版本的希腊文本为基础，尼康将新样本寄给了耶路撒冷牧首帕伊西。①

尼康的下一步措施是询问君士坦丁堡牧首俄国章程和希腊章程的差异，并且在询问过程中，尼康还将自己的反对者置于希腊教会的敌人和叛乱者的位置。询问函是由马努伊尔（Мануил）带去的。1654 年 5 月他从莫斯科出发，拿到君士坦丁堡地方宗教会议同意的牧首回信后，于 1655 年初回到莫斯科。②像以前一样，尽管没有等到回信，尼康仍旧继续改变俄国的章程。东方教父为了从尼康那里得到资金支持，不顾一切地反对“爱上帝”小组。人们对新礼仪不太接受，新礼仪又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这些修订者由于没有经验，又不认真，经常犯新的错误，比以前翻译得更差。“有六种尼康的祈祷书被强行在俄国推行；而所有这些祈祷书之间互不相同，没有哪一本是同其他本子一致的。”③好多民众都反对尼康。涅罗诺夫将尼康看成是敌基督，他想摧毁东正教的罗斯。

1655 年 3 月，尼康开始公开地反对俄国古老的画十字方式。在东正教礼拜日，他邀请安提阿的牧首马卡里和塞尔维亚的牧首加夫里尔（Гаврилл）帮助他。他在布道的时候强烈抨击了俄国画十字的方式，然后请求牧首马卡里就该问题表态。马卡里通过翻译表示，在希腊是三个手指画十字，那里不使用俄国画十字的方式。在此后的三年里，尼康集中力量准备俄国章程与新希腊章程的一体化。1655 年 3 月 25–31 日召开的地方宗教会议，在牧首的压力下，同意了改变章程和教会习俗的提议。由于尼康的“改革”，俄国教

① 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 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С.176.
② Там же.С.176.
③［俄］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著，徐凤林等译，《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第 93 页。

会的仪式完全按照新希腊的样式改变了。但他的新举措局限在改变和统一仪式上，因为所有其他方面，比如单声礼仪和布道，实际是“爱上帝”小组推进的。这时候的尼康本人看起来也更加希腊化了，这是他特别努力的结果。在 1655 年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尼康说道，“虽然他是俄国人的儿子，但是他的信仰和信念是希腊的”。[①]他在俄国教会中推行希腊式的服装，而且俄国修道士的帽子，其中包括俄国牧首著名的白色僧帽，都被希腊式的代替了。[②]尼康甚至把希腊食物带进牧首的食堂中。现在他可以认为，他的所有言行就像东方主教一样，当俄国解放东方东正教会时，他就可以统领整个东正教世界，不用担心希腊人会因俄国的混合仪式是外省的做派而斜眼看他了。对此，历史学家C.A.津科夫斯基是这样分析的：有缺陷和外省的成长经历，成为“像所有牧首”那样的愿望，以及像卓越的和有诱惑力的拜占庭人那样做礼拜，这些对出身农民、并且在遥远的外省度过自己生命大部分时间的尼康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影响了他的仪式政策。他的所有“希腊主义”并不是出自对希腊文化或者希腊神学的崇拜，而是出自他对全人类角色的微妙虚荣心和肤浅的愿望。[③]

1656 年在 2 月 24 日，尼康、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马卡里和塞尔维亚主教加夫里尔在升天大教堂向祈祷者展示三指画十字，强调三指画十字适用于所有的东正教徒，宣布将两指画十字者革出教门。此后尼康对俄国人继续施加压力，他让所有在莫斯科生活的神甫签署声明，表示他们认可三指画十字。并且在 1656 年 4 月的主教会议上，再次论述三指画十字的重要性和理论依据。[④]这些做法触及了想保留旧信仰的俄国人最后所能容忍的底线，引起了反抗的风暴。他们指责尼康是异教徒，为敌基督工作。有关尼康就是所等待的敌基督的传闻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在罗斯托夫，有一群支持涅罗诺夫的市民，被当地的神甫号召，开始传播反对牧首及其所作所为的布道。他们说，宗教会议掌握在异教徒手中，罗斯托夫的主教和他的“父”——牧首——被诅咒了。这样，反对尼康拜占庭化措施的活动从教会内部的神职人员扩大到

①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三卷，第 300 页。
② 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 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С.179.
③ Там же.
④ Крамер А.В. Раскол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в середине XVII века. С.168-170.

了普通大众，这些人积极捍卫俄国旧礼仪，不惜被官方教会革除教门，导致了统一的俄国东正教会分裂为改革派和旧礼仪派。

尼康推行的一系列强制措施是教会分裂的导火索，他的第一批敌对者（涅罗诺夫，阿瓦库姆以及自己过去的朋友）对以他为首的改革派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导致了教会的分裂。除此之外，尼康的东正教帝国梦想与沙皇的“第三罗马”理想不谋而合，因此沙皇积极支持尼康改革，巩固了尼康改革的结果。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瓦西里耶维奇（1462-1505 年在位）统治期间，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它的末代皇帝投奔伊凡三世，并把自己的侄女索菲亚·帕列奥洛格嫁给了他。这样，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就把自己看成是拜占庭皇帝的直接继承人。都主教左西玛（Зосима）则在 1492 年首次使用了类似“第三罗马”的概念。他将莫斯科称为“新的君士坦丁堡”，而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称为 “全罗斯大公和君主、君士坦丁堡新皇帝”[①]。在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伊（Филофей）写给大公瓦西里·伊凡诺维奇（1505-1533 年在位）的信中，对“第三罗马”的思想进行了清晰的阐释。信中写道：“有福的沙皇！两个罗马已经衰落了，第三个罗马——莫斯科，站起来了，而第四个不会有……所有的东正教国家团结在您一个王国中；在全世界只有您是基督教皇帝。”[②]从此，“第三罗马”的思想根植于俄国沙皇和人民的心中，俄国的君主和莫斯科大公的后代，都将自己看成是帝国的继承人。俄国学者A.克拉默指出“这种思想成了正在形成的古罗斯社会的信仰，甚至深入到人民大众当中，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圣人和圣物从两个衰落的罗马逃到莫斯科公国的传说。”[③]

虽然“第三罗马”思想产生于 15 世纪的莫斯科公国时期，并且也影响了莫斯科大公和人民，但当时莫斯公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并不是很大，因此这种思想仅仅处于宣扬阶段。到了 17 世纪中叶，莫斯科公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政治上更加统一和巩固，民族意识也大为高涨，使其有能力通过某种现实的政治和军事行动来加强这种思想（即把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

① Успенский Б.А. Этюды о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СПб.: Азбука, 2002. С. 93.
② Ключевский В.О.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асть 3. М.: Москва, 1908.С. 377-378.
③ Крамер А.В. Раскол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в середине ⅩⅦ века. С.53-54.

的思想），而不仅仅是靠希腊神职人员和世俗希腊人的施舍物来宣扬。俄国历史学家认为："在俄国历史上，东正教王国的理想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像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统治初期那样如此珍贵、如此积极地实现。"① 比如 1655 年在对波兰的战争胜利之后，沙皇就扩展了封号，称自己为"全大罗斯、小罗斯和白罗斯的沙皇和专制者，立陶宛、沃伦斯基和波多利斯克的大公"②。"这是要拥有俄国全部的土地，以及邻国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土地的声明"③。

受"第三罗马"思想的影响，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建立全东正教王国，他将自己和俄国看成是拜占庭皇帝和拜占庭帝国。他认为，如果不完全统一东正教会的秩序就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东正教应该成为这个王国的证明，成为这个王国的思想和口号，同时是它的基础和联系到一起的胶合剂。④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沙皇开始统一东正教的秩序和礼仪。他非常关心东正教的秩序和稳定。他写道："不应该只照顾政治的事情，更应该保持教会的和平和遵守信仰。如果我们保留和获得了这个（教会的和平），那我们就会有上帝赐予的所有有福的创造、和平与丰厚的果实，能够妥当地解决其他一切事情。"⑤在他统治时期，对教会书籍进行了改革，在神学书籍中，沙皇被称为圣人。并且从他开始，沙皇开始在圣堂（通过皇门进入的地方）领圣餐，这种做法和当时拜占庭一样。"从 17 世纪后半叶沙皇开始在圣堂领圣餐——通过皇门进入的地方——像神职人员那样，当时拜占庭的皇帝就是这样做的……这符合 17 世纪后半叶典型的拜占庭化特点 ……整体上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圣餐礼的程序和拜占庭皇帝圣餐礼的程序一致……毫无疑问，在这件事上，沙皇直接转向拜占庭的宗教仪式……1667 年 4 月 4 日，伟大的君主按照以前的传统领圣餐，'以前的传统'指的不是别的，正是拜占庭的传统……。"⑥这也是说明了在俄国教会中出现了一股拜占庭化的潮

① 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 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С.103.
② Там же. С.194.
③ Седов П.В. Закат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царства.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2008. С.111.
④ 参见 Крамер А.В. Раскол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в середине XVII века. С.55.
⑤ Карташев А.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М.:Терра, 1993. Т.2. С.122.
⑥ Успенский Б.А. Этюды о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232-242.

流。

沙皇建立“第三罗马”帝国的思想，与尼康建立东正教帝国的梦想不谋而合。因此沙皇和尼康都想要俄国礼仪与希腊礼仪保持一致，积极进行宗教改革，而且在改革初期尼康和沙皇的友好关系使得沙皇支持尼康改革。沙皇非常器重新牧首尼康。当牧首约瑟夫去世后，沙皇的忏悔神父沃尼法季耶夫（Вонифатьев，1645 年至 1652 年在教会中掌管着一切事务，是教会的实际领导人，其实他是新牧首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但是他拒绝了担任新牧首）推荐尼康担任牧首时，沙皇非常高兴地同意了。在担任下诺夫哥罗德主教期间，特别是 1650 年发生混乱时，尼康展现出果断而坚决的品质，以及不惧怕所面临的危险和责任的品质，受到沙皇的欣赏。沙皇写给尼康的信很好地证明了他是怎样地尊重和依恋这位主教，在信中有这样的表达:如“我的挚友，物质世界的和精神世界的”、“发光的大司祭”、“照亮人间的太阳”等等。[①]这些都表明了沙皇是如何器重这位朋友，所以尼康的意见对他来说很重要。1654 年的宗教会议就是在沙皇的主持下进行的，这次会议决定在印刷教会书籍时，根据古代斯拉夫语和希腊语经书进行修改。[②]

新的礼拜书籍的出版在信徒和神职人员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一方面，信徒听不到他们熟悉的祈祷文；另一方面，神职人员对这些新的祈祷文也很陌生，他们对旧的祈祷文早已熟稔于心，想要改变很难。因此，新举措给教会带来了混乱。有经验的神甫公开抵抗和严厉谴责修订章程，他们很清楚章程中的变化，认为这些变化是对旧礼仪的嘲笑，对两指画十字的诅咒必定会导致对信仰的破坏。

除此之外，新的礼拜书出版后，它的个别新版本之间也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在 1655-1688 年之间出版的任意 10 本礼拜书中的经文经常不一致，因为这些没有经验的修士对待校对工作很不认真，他们自己经常弄混、乱说，甚至犯新的、比以前更糟糕的错误。新出的第一版礼拜书中有很多低级的错误，它的出版很快就暂停了。较晚出版的礼拜书好了很多，这些修订者分析了自己的错误后开始了更加认真地工作，甚至开始参考古代的材料检查文

① 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 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С.156.
②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左少兴等译：《俄国史教程》，第三卷，第 302 页。

本。但是为时已晚，不可挽救的错误已经犯下，人们对新礼拜书的信任已经遭破坏。

在教会中拜占庭化潮流的驱动下，以尼康为首的教会统治阶层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措施推行新的礼仪，并且得到了沙皇的支持，这破坏了俄国旧的礼仪传统，伤害了那些忠于旧礼仪传统的俄国人的感情，引起了广大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强烈反抗，点燃了教会分裂的导火索。

## 三、教会外部的西欧化倾向

建立“第三罗马”帝国的梦想在 17 世纪后半期遇到了实现它的合适土壤。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开始积极地实现这一梦想，他不仅在宗教方面进行礼仪改革，在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也开始学习西方。

当时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一些新的举措，目的是振兴军队和国家经济。俄国感受到了有必要学习外来的新技术，因此请了很多外国人来训练士兵，铸造枪炮，建设工厂。随着外国专家、技术人员的到来，西方的一些风尚，比如舞会、演出等开始渗透到俄国上层社会的生活中。由于外国人大批进入莫斯科，他们同本地人的交往日益增加，经常会产生诱惑和冲突。莫斯科统治当局下令禁止德意志人从莫斯科人那里购买房屋，禁止在莫斯科城内建造路得派教堂。1652 年，政府将德意志人从首都迁出去，迁到雅乌扎河波克洛夫卡以外，那里有以前分给他们的土地，这样就兴起了新的德意志居留地。这个德意志居留地成了西欧文化在莫斯科生活中的导向。这样，连同自己的工业和军事技术，他们也将西欧的舒适、生活的方便和娱乐带到了莫斯科。[①]莫斯科的上层人物开始打破旧的成见、兴趣和习惯，接受这些西方的影响。沙皇阿列克谢为彼得改革种下了种子。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写道：“西方的影响是从民族无能为力的感觉中产生的，这种感觉的由来是在战争中、在外事交往中、在商业交换中日益明显地显露出的在西欧面前我们自身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贫乏，而这一切又导致对自身落后的认

---

① 参见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左少兴等译：《俄国史教程》，第三卷，第 267-268 页。

识。”[①]

虽然这些和宗教观念的关系不大，但是这些军事和技术上的外国因素逐渐渗透到了俄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德国人教他们怎样统治军人，教他们作战技能，那也就开始教给他们怎样按照德国的风格穿衣、剃胡子以及接受德国人的信仰，抽烟，每周三周五喝牛奶，直至让俄国人放弃自己的古老信仰。”[②]西欧对俄国的影响逐渐从军事和技术方面转向了生活方面，这使得俄国人开始思考向西欧学习，学习他们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在俄国出现了西方影响的传播者，这些传播者建立拉丁学校，编纂和翻译圣书和各种教科书、百科全书等。当时俄国上层人士开始请外国人担任家庭教师，让子女接受家庭教育。“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时期，俄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不少新时尚，外国的影响不断增强。”[③]在上层社会生活中， 欧洲风尚开始流行起来。“现在，沙皇和大贵族在莫斯科仿效外国式样，开始穿着丝绒服装，坐在漂亮的德意志轿式马车里，车子装有描绘图画的水晶玻璃……莫斯科驻外大使受命在国外招来最熟练的号手为沙皇服务，这些人应证明能为舞会吹奏高音小号。宫廷的高层圈子对‘喜剧表演’——‘戏剧表演’的兴趣与日俱增。”[④]可以说，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是俄国改革的先驱，为彼得大帝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俄国历史学家写道：“十七世纪俄国教会发生的分裂是俄国社会在西方文化影响下这一道德分裂在宗教上的反映。”[⑤]政治和军事上的西欧化导致俄国社会的世俗化倾向加剧，很多平信徒，尤其是大地主和贵族们对俄国传统的教会礼仪失去了兴趣，他们看到了西方先进的生活，一心想追求西方的各种生活方式，很容易抛弃本国古代的传统和习俗，这巩固了尼康的改革成果，使得教会分裂的事实难以逆转。

① 同上，第 257 页。
②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左少兴等译：《俄国史教程》，第三卷，第 294 页。
③ 李英男、戴桂菊，《俄国历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第 174 页。
④ 同上，268-269 页。
⑤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左少兴等译：《俄国史教程》，第三卷，第 362 页。

# 结论

17 世纪俄国教会的分裂不仅仅是由于尼康改革了部分礼仪，修订了经文和书籍引起的，这次分裂既是教会内部低级神职人员和高级神职人员积累已久矛盾的爆发，也是在尼康狂热的神权政治理想，以及沙皇想实现“第三罗马”帝国梦想的推动下最终促成的。

从教会内部来看，当时低级神职人员与高级神职人员在教育、生活方式、物质生活等方面差别很大，低级神职人员对高级神职人员的一些不道德行为很不满，要求在教会中实行礼仪和道德的复兴，这激化了低级神职人员和高级神职人员已有的矛盾，奠定了教会最终分裂的基础。其次，拜占庭化是 17 世纪后半叶俄国的典型特点。尼康一心想建立“东正教帝国”，让俄国的东正教成为世界东正教的中心，这促使他在教会中积极按照希腊礼仪强制进行改革，直接导致了教会的分裂。此外，沙皇建立“第三罗马”的理想与尼康建立“东正教”帝国的理想不谋而合，因此沙皇积极支持尼康的改革，促进和巩固了教会的分裂。从教会外部来看，在“第三罗马”理想的驱动下，以沙皇为首的俄国上层社会中西欧化的倾向明显，教会外部出现了很多不利于教会统一的因素。当时政治上的西欧化政策和社会上的世俗化倾向，使得很多平信徒，尤其是大地主和贵族们对俄国传统的教会礼仪失去了兴趣。他们看到了西方先进的生活，一心想追求西方的各种生活方式，很容易抛弃本国古代的传统和习俗。这巩固了尼康的改革成果，使得教会分裂的事实难以逆转。

这样，在教会内外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统一的俄国东正教会分裂成了改革派和旧礼仪派。教会分裂后，旧礼仪派信徒为了捍卫纯洁的东正教信仰，保护俄国正统的东正教礼仪，反对以尼康为首的教会高级神职人员的特权与官方教会。许多坚持旧礼仪的信徒受到了以尼康和沙皇为首的统治阶层的残酷处罚和迫害。但是他们没有屈服于教会和沙皇的专制与权威，而是坚持俄国自己古老的礼仪和信仰，与沙皇政府和教会进行了多年的斗争。这场始于 17 世纪的斗争，给旧礼仪信徒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们被驱逐、迫害，为了保存自己的礼仪，他们不惜移民到边远地区，甚至国外。直到今天，距

离 17 世纪的分裂已经过了 300 多年，这些旧信仰的坚持者依旧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礼仪，按照他们祖先的方式进行礼拜。

旧礼仪派的这种捍卫俄国古风，保持本民族传统，不畏强权，反对专制的精神，不仅对 18 世纪的农民起义产生了影响，也对 19 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斯拉夫派以及民粹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当社会动乱之时，在“暴动分子”中间总能找到旧礼仪派信徒的身影。俄国历史上的许多文化现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思想的根源。别尔嘉耶夫说：“这种内在的分裂性一直延续到俄国革命，很多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解释。它是“解开俄国思想史的一把钥匙。19 世纪的平民知识分子正是这种分裂性的延续”①。

尽管 17 世纪俄国教会的分裂对于教会自身而言是一个悲剧，但是从历史、文化和人类学的学科角度，17 世纪的各种改革活动也有“优点”。当代俄国东正教学者认为改革的“优点”在于：“分裂分子保留下很多古代的文献，他们成了 17 世纪下半叶新产生的社会阶层——商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彼得一世时期，分裂分子是彼得大帝所有工程项目中的廉价劳动力。”②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以尼康和沙皇为首推进的一系列改革为俄国进一步的欧化扫清了障碍，有助于彼得大帝时期欧洲先进文化在俄国的产生和发展。俄国历史学家认为“整个 17 世纪是为彼得大帝的改革准备的时代。”③他分析了受 17 世纪新风尚影响成长起来的俄国改革者的活动，总结道：“这些主张迅速发展起来……如果把这些主张彼此做一比较，那么我们会看到，它们自然地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纲领，其中外交政策问题同军事、财政、经济、社会、教育等等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些改革任务总和起来就是彼得大帝的改革纲领。”④

---

**【Abstract】**The 17th century separatist movement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w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erms of both Russian religious history and

① [俄]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等译：《俄罗斯思想》，北京：三联书店，1995 年，第 11 页。

② Церковная реформа патриарха Никона и е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28.12.2013. http://studopedia.ru/1_12659_tserkovnaya-reforma-patriarha-nikona-i-ee-posledstviya.html

③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左少兴等译：《俄国史教程》，第三卷，第 362 页。

④ 同上，第 363 页。

cultural history. Why the church split not only lies in changing non-essentials of some ceremony, but also has more profound historic and cultural reasons. Internally speaking, the division is the eventual outbreak of long-term contradictions between lower-level clergies and higher-level ones. Besides, it was also the result of Nikon, driven by fanatic theocracy ideas, in actively implementing Byzantinization within the church. Externally, the tsar's "Third Rome" imperial dreams and his active implementation of Western Europeanization policies led to and consolidated the schism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which could not be healed.

**【Key Words】**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the Third Roman Empire, Split of Russian Churches

**【Аннотация】** Движение раскола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в 17-м веке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событием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религ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Причины раскола крою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в изменениях некоторых тонкостей церемоний, но и имеют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развития Церкви, данный раскол является взрывом накопленного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между низшим духовенством и церковными первосвященниками, а также фанатичных те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идей Никона и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активного внедрения византиизации Церкв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бытий вне Церкви, имперские мечты создания «Третьего Рима» и активное проведе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ом политики европеизации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о раскол и привело к неизбежности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го раскола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третья Римская империя, раскол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东正教政治理念辨析
# ——兼评俄罗斯教会之依附性悖论*

吴舒屏**

**【内容提要】**长久以来，东正教在政教关系层面具有“依附性”的观点一直为国内学界所认同，甚至已经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演化为解析当代俄罗斯政治生活的重要范式之一。但被学界泛化为解释工具的依附性政教关系，并非东正教之原初政治理念。东正教原初的政治理念缘起于拜占廷帝国，是由东正教的“出世性”价值取向所界定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尊崇世俗权威的表象之下，所彰显的是“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与之相对，自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东正教会更倾向于在行政意义上突显世俗权威的核心地位，进而使其政教关系陷入了某种依附性悖论: 即教会对世俗权威的行政依附程度愈深，则对其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感就愈加弱化。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　教会-国家共同体　东正教原初政治理念
**【中图分类号】**D751.2; B976.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3-0184(17)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始，东正教在政教关系层面具有依附性的观点就已为国内学界所认同。多数学者认为，无论在拜占廷抑或沙俄帝国，东正教会皆以世俗权威为宗教领袖，其教权为皇权所控制；只是比之于拜占廷教会，沙

* 本文系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批准号：教外司留（2011）1568）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批准号：09YJA770024）的阶段性成果。
** 吴舒屏，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

俄时代东正教会的依附性更为突显而已。[①]

进入 21 世纪后，伴随着东正教在俄罗斯渐成大势，依附性政教关系再度为学界所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已经被泛化为解析俄罗斯“新权威主义”政治倾向的重要范式之一。例如，刘莹就曾论及，新权威主义源自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君主情结和民族自觉意识，是东正教“君权神授”思想和“第三罗马”理论的产物。[②]戴桂菊也指出，东正教会在新时期与官方达成的协作关系是传统的延续，即“复兴后的俄罗斯东正教在国家中仍发挥着传统的政治职能，它是俄罗斯联邦中央集权的忠实维护者”[③]。应该承认，前述解析模式在理论上无可厚非，其重点在于强调民族文化心理的持久性影响。或者说，复兴后的东正教并非借助教义、仪礼等宗教手段去规范世人的政治行为，而是唤醒了俄罗斯人心中的依附性政教关系情结。然而，东正教所标识的政治传统究竟为何？是否可以将彼得一世以来的俄罗斯政教关系简单地理解为“依附性”之强化？

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前述被学界泛化为解释工具的依附性政教关系并非东正教的原初政治理念。东正教的原初政治理念缘起于拜占廷帝国，是融入了东正教终极价值观念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帝国政治文化中，它具象为“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其间的政治分野十分模糊。在后文中，笔者拟以“出世性”价值取向为依托，探究拜占廷东正教[④]的依附性本质及其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解析彼得一世以后俄罗斯东正教之依附性悖论。

---

① 乐峰先生是持该观点的重要学者之一。他曾提出：在拜占廷帝国时期，尽管皇权控制教权，但教会与国家是彼此合作的。其后，沙俄帝国强化了对教会的控制。自彼得大帝废除牧首制以后，教会即完全演变为沙俄政府之附庸。详见乐峰：《东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6-47 页。

② 详见刘莹：“俄罗斯新权威主义探源”，《俄罗斯研究》，2002 年第 4 期。

③ 戴桂菊：“东正教与俄罗斯改革”，《东欧中亚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④ 笔者注：本文中的“拜占廷东正教会”，不仅指 1054-1453 年间的拜占廷教会，而且也涵盖了更早的“东部教会”。尽管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均以 1054 年教会大分裂作为其产生的标志，但早在 395 年东西罗马帝国分立之时，西部教会和东部教会就已经显现出教义、组织以及礼仪层面的差异。因此，东正教原初政治理念之缘起，可以追溯到 4 世纪。

## 一、东正教依附性之原初理念——“教会-国家共同体”

东正教依附性之原初理念缘起于拜占廷帝国，它是教会和世俗权威共同承认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就其外部特征而言，很容易发现拜占廷世俗权威与教会之间的权力差距，即俗权高于教权。世俗权威的优势集中体现在拜占廷皇帝对教会所拥有的“至尊权”上。“至尊权”不仅包括皇帝作为教会最高领袖可以实施的全部行政管理权，而且还涵盖了世俗人士无法行使的宗教神权。正如D.J.基纳勾普洛斯所言，除任免君士坦丁堡牧首、召集普世会议以及评定主教职位等级以外，“至尊权”还表现为“皇帝具有某种与教士相似的礼仪特权，如向会众布道、焚香，甚至还可以亲自为圣体血祝圣”[①]。

教会对于这种政教关系模式亦持肯定态度。早在四世纪，部分教会神学家们即从理论上对依附性政教关系进行了梳理，并为之提供了神学依据。其中，以恺撒里亚的主教尤西比乌斯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提出：“基督教罗马帝国是天国的预示，正如天国只有一个上帝，人间也只有一个君主，那就是罗马帝国皇帝。皇帝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是教会和国家的有形首脑。”[②]此后，“教会从属于上帝加冕之君”的观念便日益深入民心。

就前述政教关系模式的确立而言，传统史家将其归因于拜占廷教会与强势皇权[③]之间的实力对比。在实力论解析之下，拜占廷教会势必像所有受制于世俗权威的宗教一样，服从于皇权，并且以“君权神授”论为之提供合法性依据。相应地，教会与皇权之间的依附关系则可以解读为行政意义上的“服从”或“从属”。 然而，尽管该结论与依附性的外化特征颇为相符，但实力分析却无法解释教会对其从属地位的持续性认同。从客观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拜占廷皇权的实力指数始终沿着波形曲线高低跳跃，从君士坦丁王朝到帕略奥格王朝，几乎每一次王朝更迭过程都与政治危机相伴。若以实力论观

---

① Justinian, “Novella VI: Imperial Authority over the Church", in D. J. Geanakoplos, *Byzantium: church,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 Chicago, 1984, p. 136.

② Eusebius, “The Universal Empire and the Universal Church”, in D. J. Geanakoplos, *Byzantium: church,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 p. 131.

③ 学界普遍认为，自君士坦丁大帝开始，拜占廷帝国的政治体制已经显现出中央集权特征，详见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2-44 页。

之，教会对依附性政教关系的认同必然是间歇的、断续的，然则历史的真实图景却完全相反。

如果与实力水平并不相关，那么，导致拜占廷教会认同依附性政教关系的稳定诉求究竟是什么？这种依附性的本质究竟是行政意义的从属，还是别的什么呢？对此，结构功能学派的分析似乎展现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曾基于对社会组织结构的分析，阐释了既定宗教的价值取向与世俗政治体制之间的关联模式。在分析模型中，他将发展较成熟的宗教群体划分为“政治自主型”和“政治从属型”两类。艾氏视“政治自主型”为宗教群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所显现的常态。他提出：发展较为成熟的宗教群体大都具有“力行主义”和“普遍主义”倾向，前者指其对于道德和宗教虔诚的强调，后者则看重其信徒的涵盖范围。在此基础上，宗教往往发展出一种自主的（独立于国家现存政治体系的）意识形态取向和行动体系。它所加之于人的责任，并非简单地混溶于礼仪性与宗教性的活动中，而是意味着更具专门性的社会政治活动。[①]与之相对，“政治从属型”宗教组织，是指那些未能适时地衍生出自主意识形态取向的宗教组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它们是相对消极的组织形态。艾氏认为，自主性意识形态的缺失，主要与“出世性”宗教价值取向有关。他曾以东正教为个案进行过分析：“就一般而言，力行主义为宗教活动提供了其自身的自主能动性，提供了组织不同社会活动与群体的动力，提供了裁判世俗现实之各个方面的自主标准。然而，在某些案例之中，例如东正教，……其取向是出世的，这就决定了它们对政治生活的相当消极的态度。”[②]笔者在原则上同意艾氏的逻辑：即东正教的“出世性”价值取向使其漠视尘世、漠视包括社会政治生活在内的一切现实图景。不过，当政治演变为不可规避的社会现实时，东正教在消极处世心态下究竟是被动顺应还是相反呢？艾氏对此并未细述。

笔者认为，关于“出世性”价值取向与政教关系模式之间的关联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在理论上，所谓“入世性”或“出世性”价值取向，不过是将

① 详见［美］S.N.艾森斯塔特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体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62-65 页。
② 详见《帝国的政治体系》，第 66 页。

既定宗教的终极价值与“入世性”抑或“出世性”行为加以融合而已。它们皆无法改变宗教组织的普遍主义和力行主义水平，而只能构建出某种行动导向，进而影响其运作范式。换言之，成熟的宗教组织都会尝试根据终极价值去组织、评价和改造世界，只是“入世性”和“出世性”宗教组织所采取的运作方式不同。在“入世性”取向的影响下，宗教组织基本上会演变为独立的行动体系，依据其终极价值标准去规范现实。例如，罗马天主教会逐渐衍生出一种独立于中古西欧世俗政权之外的行动体系，即根据基督教终极价值去组织、评价和改造世界的罗马教皇权及相关机构；而伊斯兰教却趁阿拉伯半岛的世俗政治建制尚未完善之际，于公元七世纪构建了政教合一体制，进而完全以宗教体系取代了世俗政治。与之相对，在“出世性”价值取向的作用下，宗教组织一般不会朝政治组织方向发展，以至于当政治生活演变为不可规避的社会现实之时，它只能在世俗政治框架之下“创造”出一席出尘之地，并在政教关系上显现出依附性。然而，这种依附性绝非被动顺应之态，而是一种选择。“出世性”宗教总是在现存制度下将其终极价值观念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世俗权威的认同。

拜占廷东正教会堪称“出世性”成熟宗教的典型代表。首先，其宗教价值取向或终极价值观念具有明显的“出世性”特征。“出世主义”理念始于第一代隐修者安东尼（252-356 年），后为东部教会所承继。它在修道目标上强调彻底否定尘世生活，在修道手段上主张自我戒罚，在与尘世的关系上重视远离尘嚣或道德避世。①尽管东正教的修道活动与教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分离的，但由于拜占廷人对修道者极端尊崇②，因此“否定尘世”的价值取向还是越过修道院墙而进入世人内心；相应地，东正教会在上帝观、教会观、人生观乃至伦理规范上，也随之显现出对现实世界的漠视。以教会伦理观为例，早期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原本十分质朴，《登山宝训》中所强调的基督徒品德规范尽在“贫穷”、“温柔”、“虔诚”、“怜悯”以及“清心”（《马太福音》

① 详见拙文“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廷时期的发展”,《世界宗教研究》,2002 年第 1 期。

② 在拜占廷帝国，隐修者是理想基督徒的代表。在世人心目中，他们比教士更有威望，甚至像殉道者一样被封为圣徒。详见 G. Cavallo, *The Byzantines*, Chicago Univ. Press, 1997, p.257.

5：1-11），皆未超越常规范畴。然而，伴随着“出世主义”修道理念的融入，拜占廷教会开始以修道者的品德去衡量普通教徒的虔诚。于是，东正教的宗教伦理规范便归于“灵性生活”原则。一份尚存的拜占廷“灵性导师”的《指导准则》有这样的记载:“追求灵性生活之人，必须经历禁食、祈祷、悲痛及悔悟，并由此而进入安息状态。他并非单纯地弃绝了人类之情感，而是要恒久地敬仰上帝。”[①]其次，拜占廷东正教又是一个颇具影响力和行动力的宗教组织。一方面，作为帝国之国教，它无疑具有强烈的普遍主义倾向，其群众基础遍及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从其向世人普及教会婚姻观念的种种举措也可以看出，它对于宗教虔诚和道德的强调也并非只停留在理论层面。

由“出世性”价值取向所界定的依附性政教关系，与实力论所解析的“行政依附”迥异。它揭示了东正教依附性原初理念之本质特征。从“出世性”的视角观之，东正教之依附性可以理解为教会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世俗权威的认同。该过程的神学图景可以复原为以下两个步骤：其一，由于“自主性意识形态”之缺失，拜占廷东正教在无法规避的政治现实中，将比那些“入世性”宗教更容易接纳世俗政权，进而为其构筑基督教版本的“君权神授”论；其二，作为一个颇具影响力和行动力的宗教组织，拜占廷东正教会在神化皇权的同时，亦将“出世性”终极价值观念付诸实践：于是，原本蕴涵于“君权神授”理论之中的神学预设——“世俗帝国是上帝之国在尘世中的映像”，便在现实生活中具象为“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其终极目标是将拜占廷帝国转化为尘世中的上帝之国。

综上所述，东正教依附性之原初理念虽然承认拜占廷皇帝的“至尊权”，但其本质并非行政意义上的命令与服从；在尊崇世俗权威的表象之下，所彰显的是“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

## 二、“教会-国家共同体”之政治分野

在“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的作用下，拜占廷帝国的政治图景经常令

① J. M. Hussey, *The Orthodox Church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Oxford, 1986, p.363.

人感到困惑。在教会与国家之间，其政治分野极为模糊。经典作家马克思曾从东正教会的角度谈及过该现象："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各教派的特点，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①]那么，究竟何为拜占廷式的"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其政治分野又如何界定呢？

在公元四世纪，"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仅是一种神学预设。在前面所引述的尤西比乌斯主教的著作中，除"教会从属于上帝加冕之君"的观念外，实际上还蕴涵着某些为后世学者所忽视的政治理念——基督教罗马帝国是天国的预示，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相互关联。此乃教会神学家们愿意构建"君权神授"论以及承认"至尊权"的前提，同时也是"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之雏形：只有在"尘世的上帝之国"中，世俗权威才会为教会所认同和服从。

及至六世纪，《查士丁尼法典》进一步阐释了世俗权威与教会之间的权力范畴，并从法律角度再次肯定了二者在本质利益上的一致性。《法典》明确提及："教会权威和帝国权威是上帝出于怜悯而给予人类的最大祝福。教士主管神圣之事，帝国权威被设置来管理人间事务；但两者都出自同一源泉，即，都是用来装点人类的生活。对皇帝而言，没有什么比教士的尊严与荣耀更值得关心；而当他们为皇帝而祈祷的时候就更值得关心。"[②]《查士丁尼法典》的法律释义对于"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一方面，它界定了"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的基本框架，即，在教会与国家之间，只存在一种权力象征，那就是拜占廷皇帝；但教会是与之共存的，教会是皇权存在的合法性保证。另一方面，它还标志着"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已经开始转化为社会意识形态，一种为拜占廷皇帝、教会以及臣民普遍认同的政治理念。

诚然，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世俗帝国，拜占廷在《法典》中公开强调"教会与国家根本利益一致"，似乎有悖于君主政体的运作范式。无论如何，"君权神授"才是为君主制提供政治合法性的核心观念；而且，一般而言，世俗君主大都会运用政治手段反复强化该观念，进而使之转化为社会主流意识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141 页。
② Justinian, "Novella VI: Imperial Authority over the Church", in D. J. Geanakoplos, *Byzantium: church,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 p.136.

态，即政治意识形态。那么，为何“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能够取代“君权神授”而演变为拜占廷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源于拜占廷教会对“出世性”价值取向的坚守。如前文所述，拜占廷教会在构筑“君权神授”理论时，已经赋予其强烈的出世性色彩，将拜占廷帝国诠释为“尘世间的上帝之国”。换言之，教会将“君权神授”和“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有机地融为了一体。其后，伴随着教士的布道与教堂内庄严而隆重的圣礼，尘世天国观念中所蕴涵的出世情结，便在拜占廷民众心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拜占廷人在本质上是极具出世色彩的群体。由于帝国版图一度囊括了埃及、小亚细亚、两河流域以及波斯，所以崇尚古典的拜占廷人亦深受东方神秘主义文化的影响：他们认同狄奥尼修斯[①]的观点，接受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尊崇修道者，甚至在 14 世纪衍生出一种极端的出世性修道方式——“绝对冥思”。对于尘世天国之说，他们自然也会顺应本能而选择接受。由此，考虑到民众之心理倾向，拜占廷皇帝在强调“君权神授”时便不能将“尘世间的上帝之国”弃置一旁；相反，还要极力彰显其出世主义精神。从六世纪至十世纪，伴随着帝国强化“君权神授”之种种举措，“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也逐渐得以政治化，并转变为拜占廷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以政治学视角观之，“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所衍生的政教关系结构具有双重性。其一，依据“至尊权”，拜占廷皇帝对教会拥有全部行政管理权以及部分宗教神权，教会以世俗权威为最高领袖，俗权高于教权。其二，在拜占廷教会与国家之间总是弥漫着合作氛围，皇权与教权并存共荣，其权力分野也十分模糊。E.贝克在分析君士坦丁堡牧首与拜占廷皇帝的关系时曾作过如下描述：“他们彼此居住得很近，是社会中关系密切的成员，是共同的知性生活中的搭档……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拥有共同的心灵；这意味着他们拥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态度，意味着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②]贝克在这里所指的“意识形态”，即是“教会-国家共同体”，抑或“尘世上帝之国”。正是也只能是在此意识形态之上，拜占廷帝国的皇权与教权才能彼此认同、

① 笔者注：拜占廷人在本质上极具出世色彩。狄奥尼修斯是 6 世纪拜占廷神秘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强调以否定的方式来讨论上帝的属性。参见拙文“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廷时期的发展”，《世界宗教研究》，2002 年第 1 期。

② E. Barker,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Byzantium*, Oxford, 1957, p.12.

相互合作。

然而，必须承认，就前述双重性政教关系结构，尤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合作氛围而言，无论是贝克式的描述，还是经典作家注释，均没有在理论上将之阐释清楚。所谓合作氛围抑或模糊的政治图景，究竟是凸显了教权还是皇权？笔者认为：在制度文化的意义上，教权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只能被界定为“至尊权”，所谓“合作氛围”根本无法在这个平台上得到有效阐释。与“君权神授”相比，“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的确彰显了教会的权力，但并未在拜占廷帝国促成与中古西欧社会相似的二元政治格局。教俗权力分野不明的现象，衍生于制度文化以外的心态文化平台，其运作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心理和认知领域。

作为拜占廷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至少在两个层面引导了拜占廷社会的政治生活。首先，在制度文化层面，它强化了“君权神授”理论，进一步彰显了帝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进而巩固了以“至尊权”为核心的教俗体制。纵观拜占廷帝国的历史，从查士丁尼时代、希拉克略时代到毁坏圣像运动时期，几乎在每次社会整合运动期间都伴随着强化“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的举措。以希拉克略的社会整合为例，在面对异族入侵、国库资源枯竭以及宗教纷争等问题困扰时，他曾为重建世人对帝国政治权威的信心作出了许多努力。他特别规定：拜占廷皇帝每年都要参加在圣·索菲亚教堂中所施行的加冕礼。尽管部分学者认为：“该礼仪行为在本质上可能是一种隐语，暗含着中古拜占廷政教关系的紧张。”[①]然而，在笔者看来，这项一年一度为圣器熏香所举行的礼仪活动，实际上是在强调皇帝和神圣事物之间的联系，其目的在于突显世俗权威的神圣性。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应称作“角色异位”，它与拜占廷宫廷艺术中将“皇帝”与“天使”形象异位的创作理念如出一辙。当然，“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也在政治运作过程中产生了负面效应。它完全模糊了宗教与政治领域的界限，致使拜占廷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同时虑及政治与宗教双重利益，进而导致了一系列决策失误。在诸多政治决策悲剧中，拜占廷帝国晚期皇帝曼努尔二世（Manuel

① George P. Majeska, “The Emperor in His Church: Imperial Ritual in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in H. Magurie, *Byzantine Court Culture from 829 to 1204*, London, 1997, p.20.

II，1391-1425 年）的外交政策，即是对政治利益原则弱化的最好诠释。陈志强先生曾对其进行过评述：在其外交决策过程中，即使面对国家利益抑或民族尊严，宗教利益始终是牢不可破的首要原则。[①]的确，在后世学者看来，这种政治决策纯粹属精神错乱。然而，从“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的角度看，曼努尔二世的抉择却是拜占廷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常态反应。教会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放弃了教会的利益也就等于放弃了国家的利益。在这里，政治利益原则已为宗教利益所限定。类似结论在约翰八世（John VIII，1425-1448 年）统治时期进一步得到了印证：虽然约翰八世以牺牲教会纯洁性为代价与罗马天主教会签署《佛罗伦萨东西教会统一协议》，但这种符合政治利益原则的决策在拜占廷民众那里并未获得认同。从拜占廷教会与国民坚决否定该协议的情形来看，政治利益原则最终还是受到了宗教利益的分割。

其次，在制度文化以外，“教会-国家共同体”亦在心态文化层面彰显了教权在社会文化心理和认知领域的重要性，进而在潜意识中规范着世人的政治行为。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伴随着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日渐成熟，部分研究拜占廷的学者亦尝试将中古希腊语的语言现象同世人心理、社会及文化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对拜占廷社会文化心理所产生的影响，亦因此而得到了证明。例如，D.M.尼克尔曾从语言学的角度阐释过拜占廷人的“帝国”概念：“在拜占廷人的语言中，不存在与拉丁语‘基督教世界’对等的词。该词反映在拜占廷人的脑海中就是‘帝国’。所谓‘奉基督之名的人’构成的基督教社会就是普世帝国的特权居民，其领袖是受上帝保护的统治者，是教会秩序和信仰的保卫者。”[②]另一位学者A.施莫曼在探究拜占廷东正教会历史沿革时亦发出这样的感慨：“拜占廷教会的悲剧就在于它只是拜占廷的教会，它不仅从行政上而且还在心理上和自我意识上，深深地将自己融入了拜占廷帝国。”[③]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都涉及到了拜占廷时期的典型话语——“帝国”与“基督教会”。前者谈到了“帝国”与“基督

① 陈志强：“帕略奥格王朝外交政策研究”，《南开学报》，1997 年第 1 期。

② D. M. Nicol, *Church and Society in 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9, p.4.

③ A. Schmemann, *The Historical Road of Eastern Orthodox*, New York, 1963, p.39.

教世界”的语义趋同，而后者则隐含了“帝国”与“上帝之国”内涵之间的联系。笔者认为，此间的“帝国”概念的语义变化，主要源自“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的影响。它强调拜占廷帝国是“尘世间的上帝之国”，同时也促使民众对“基督徒”、“臣民”以及“罗马人（拜占廷人）”等概念的认知日益趋同。伴随着拜占廷社会的精神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在心理层面融合为一体，“帝国”便成为拜占廷民众和教会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之国”。

在“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的作用下，拜占廷人在认知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亦同样明显。随着该观念逐渐演变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神学在拜占廷帝国逐渐被推向极致，并在认知模式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J.哈尔顿曾经这样描述过查士丁尼时代:“只有在基督教的词汇中，东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才能被描绘成查士丁尼及其同时代人所能理解的‘世界’。那是其用宗教界定的思想世界，人们的经验和对世界的理解，无论是世俗的还是精神的，都必须通过宗教的词汇来表现”。①此外，世人所关注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宗教的影响，对神学问题的重视与对社会实际问题的重视等同。E.贝克就非常遗憾地谈到过拜占廷政治学的神学化现象：“与神学相比，不能被忘怀的社会事物都将隐现于其后……政治学演变为神学化的政治学，在讨论皇帝的目标与作用的法律文献中，竟然也要记下他必须关心的对超验的问题的看法。”②

## 三、俄罗斯东正教之依附性悖论

拜占廷帝国灭亡后，俄罗斯继而成为东正教世界的领袖，号称“第三罗马”。尽管俄罗斯教会在教义和礼仪上明显地回归传统主义，但在教会组织上，尤其是政教关系层面，它并没有一直延续拜占廷模式。笔者认为，依附性政教关系在俄罗斯的发展，基本上以 1721 年彼得一世的教会改革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改革前的俄东正教会强调“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其依附性则可以理解为教会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世俗权威的认同；在改革以后，教

① J. F. Haldon, *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9, p.25.
② E. Barker,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Byzantium*, p.13.

会的依附性则转变为行政意义上的从属，进而使政教关系陷入某种依附性悖论之中。

自 988 年东正教传入至 1721 年教会改革，俄罗斯教会的政教关系模式具有鲜明的拜占廷特征。伴随着教会在国家政治实践中的作用日益突显，“教会-国家共同体”的政治构架也变得越来越清晰。早在罗斯公国时期，凭借自身所蕴含的政治及文化优势，东正教会已经成为一个超越普通臣民之上的特殊群体。它不仅拥有什一税权和独立司法权，而且还间或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进入封建割据时代，神职人员自然而然地担当起“内讧王公调停人”和“外交使节”的角色；同时，他们在割据封邑内的政治特权也随之而扩展，部分高级主教甚至可以参与法令制定以及其他重要决策过程。[①]在异族统治的两个世纪中，基于东正教会对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进程的神学诠释，俄罗斯民众得以构筑起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反抗鞑靼人和统一国家的斗争就是为建立“尘世中的基督教帝国”而战。尽管此时国已不国，但不可否认的是，“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却比以往更为深入人心。在莫斯科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后，虽然世俗君主对教会权力的限制已经初露端倪，但“教会-国家共同体”的政治构架依然存在。其中，尤以罗曼诺夫王朝米哈伊尔统治时期（1613-1645 年）的政教关系最为经典：“东正教牧首拥有国父地位，获得大君主称号。其意见和建议十分受重视，进而成为国家政策的制定人，一切高层法规都是以两个人的名义签署，重要报告需经两人共同审核，外交使节由二人共同接见。”[②]总之，在彼得一世废除牧首制以前，俄罗斯政教关系一直遵依着“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拜占廷色彩极为浓郁。与笔者所得出的结论相似，米罗诺夫在论及 18 世纪以前沙皇制的权力特点时，也特别强调其神权性质。他指出：“俄国是由上帝和沙皇共同治理的和谐的东正教王国（建立在真诚的信仰、真理及公正的基础之上）。如同圣经里的耶路撒冷一样，俄罗斯王国被视为‘新耶路撒冷’，而俄罗斯人则如同古罗斯人一样，是上帝的新选民。由沙皇率领自己的臣民走入上帝之国，这就是

---

① 详见戴桂菊：《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46-47 页。
② 同上，第 63 页。

俄国历史的结论。”[①]

纵观 18 世纪的沙俄帝国，彼得一世及其后世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教会改革，促使俄国东正教的政教关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改革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废除牧首制，并代之以“主教公会”。1721 年颁布的《宗教章程》规定，主教公会把教会的管理完全交给了国家。它没有常设委员，所有成员都是由沙皇从高级神职人员、修士大司祭和大司祭中聘任。主教公会主席和副主席也由沙皇任命。1722 年，彼得一世又出台了补充文件：在主教公会设立世俗“总监”，后者将作为“国君的眼睛和国家事务的稽查人”来监督主教公会履行政府的章程和法令，制止违规违法行为，并将情节严重者上报沙皇；主教公会则通过总监而得知政府的一切法令。[②]第二，彻底实行教会财产国有化，由隶属于参政院的“经济委员会”接管，并于 1764 年将各教区神职人员都转为列入国家编制的薪俸领受者。[③]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改革后的教会在本质上已经不再是一个自治的宗教组织，而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沙皇不仅是教会最高领袖，而且也切实地管理着教会内部事务。尽管部分学者认为，改革后的教会依然是“一个与国家机构平行的且享有很大自治权的特殊机构”[④]，但无论在管理体制上还是在经济上，俄国东正教会都已经丧失了“与沙皇共治东正教王国”的物质基础；如若论及依附性，则其对沙皇的尊崇，亦不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而是行政意义上的从属。

就东正教依附性之原初理念而言，“行政依附”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某种依附性悖论：即教会对世俗权威的行政依附程度愈深，则对其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感就愈加弱化。首先，“行政依附”会导致沙俄政治体制中“出世”情结的缺失。前文曾论及，东正教原初政治理念是建立在“出世性”价值取向之上的依附观念。东正教淡漠尘世，从未衍生出与罗马教皇的“神权君主

① [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著，张广翔等译：《俄国社会史》（下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12 页。

② 详见[苏]尼·米·尼科利斯基著，丁世超等译：《俄国教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221-222 页。

③ 同上，第 229-232 页。

④ [俄]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著，张广翔等译：《俄国社会史》（上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91 页。

国”相类似的政治理念。面对不可规避的政治生活，它依然坚持固有的“出世性”价值取向，将东正教的终极目标融入“君权神授”理论，借以将世俗君主国转变为“尘世中的上帝之国”。在这个弥漫着东正教出世情结的国度里，尽管世俗权威才是居于权力中心的政治领袖，但教会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虔诚的监督者。然而，如果政教关系演变为俄东正教对沙皇的“行政依附”，则意味着“教会对国家的监控权被取缔”[①]，或者说，俄罗斯政治体制中的“出世”情结已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俄东正教会的“行政依附”程度越高，则其尘世天国的理念就越流于形式；相应地，其对世俗权威的认同感也随之而弱化。其次，“行政依附”亦会迫使俄东正教大行“入世”之道，进而弱化教会的“出世性”价值取向。戴桂菊在论及俄东正教会在 1721 年教会改革后的变化时曾指出：教会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神职人员的布道不再是为了使人向善，而是为了维护沙皇专制和培养顺民。更有甚者，从 1722 年开始，各教区神职人员已经被迫扮演起政府密探的角色，将其在私人忏悔中发现的谋反倾向密报上级。[②]伴随着主教公会“总监”权限的扩展，类似的入世之举已经越来越常规化。笔者认为，这类入世行为会迅速弱化东正教的“出世性”价值取向。这一点很快便在“白神品”（在婚神职人员）阶层得到了证明。至 19 世纪后期，当“白神品”被定位为自由职业阶层后，其思维模式基本上已经与世俗人士无异。米罗诺夫曾对 1914 年间俄国宗教培训班学员的毕业去向进行过分析：只有 47.1%的人愿意担任教职，其余学员则到世俗宗教机关、国家机关和学校等部门工作。这些僧侣后代之所以抛弃教职，主要是因为基层神职人员工作繁重、地位不高以及报酬较低等。[③]

---

① ［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著，张广翔等译：《俄国社会史》（下卷），第 126 页。

② 详见戴桂菊：《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第 78 页。

③ ［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著，张广翔等译：《俄国社会史》（上卷），第 94-95 页。

# 结 语

如前所述，俄罗斯东正教的政治传统在 1721 年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行政依附”的前提下，教会对于世俗权威的尊崇实际上已经陷入依附性悖论，甚至其“出世性”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弱化之势。那么，当东正教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再次复兴以后，其政治传统究竟会归于何处？是尊崇还是否定世俗权威呢？

笔者以为，依据当前俄东正教的生存现状，它对世俗对权威并无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与尊崇，而是在行政层面上的依附。复兴后的东正教会在价值取向上带有明显的“入世性”。2000 年，莫斯科东正教高级僧侣大会所出台的《俄罗斯东正教社会概念框架》阐释了东正教与国家的关系，具体包括：第一，在不采取明显反对东正教信仰和教会道德传统的前提下，允许神职人员和信徒拥有政治主张。第二，教会及其神职人员不参加竞选，不撰文支持竞选者，不参加党派斗争；但是，教会并不放弃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第三，不允许阻止和剥夺神职人员和教民使用公民投票方式来表达个人意愿。[①]透过前述内容，我们不难看出，东正教对世俗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无论此举是源自当今时代的影响，还是延续了沙俄帝国教会的入世之道，无疑都是东正教“出世性”价值取向弱化的表现；同时，也是阻碍东正教依附性原初理念在当代俄罗斯复兴的重要原因。在“出世性”价值取向缺失的时代，俄罗斯东正教很难唤醒拜占廷式的政治传统。既然对权威并无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与尊崇，那么，当代俄罗斯东正教徒对于权威的态度就必然遵从世俗的政治规范。

至于究竟如何看待东正教在当代俄罗斯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笔者认为，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东正教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心理积淀，一种道德准则或价值尺度。事实上，普京政权也倾向于将其列入传统文化。2000 年，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提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即我们的爱国主义、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宗教。2005

① 邱赤峰：“东正教对俄罗斯政治的作用和影响概述”，《国际资料信息》，2004 年第 10 期。

年，普京再次强调了主流意识形态与东正教之间的联系，但也只是提及，主流意识特征应该是国家主义、反西方主义和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传统主义[①]。具体到2008年俄罗斯所提出的“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笔者认为，这的确可以视为俄罗斯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本土化解读。然而，其中本土化的根源究竟在何处？是否就是东正教？其间的关联尚需进一步证明。

---

**【Abstract】**For a long time, it has been accepted by domestic scholars that the Orthodox Church is dependent under the church-state relation. Or even it has already become a political concept, evolving into an important paradigm in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al life. However, the dependence church-state relation, generalized as an academic explanation tool, is actually not the original political idea of the Orthodox Church. The original political idea of Orthodox Church originated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which was a mainstream social ideology defined by its value orientation in “aloofness”; beneath the surface in respecting secular authority, it highlights the “Church-State Community” concept. In contrast, since Peter I,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was more inclined to highlight the centrality of secular authority in the administrative sense, thus plunging it into a kind of dependence paradox in church-state relations. That is, when the Church is administratively more dependent on the secular authority, their identity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is weaker.

**【Key Words】**Russian Orthodox Church, Church-State Community, Original Political Ideas of Orthodox Church

**【Аннотация】**В течение долгого времени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о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на уровне церков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принималась как должное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учёными и даже стал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ей, превратилась в одну из важных парадигм анализ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Однако научное

① 张昊琦：“俄罗斯保守主义与当代政治发展”，《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 年第 3 期。

обобщени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в церков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как инструментов анализа не объясняет изначаль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Оригиналь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возникли в Византии,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рождения» являлась основн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ценностной ориентацией; в условиях уважения к с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ажным являлась концепция «сообщества Церковь -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осле прихода к власти Петра I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стала больше подчёркивать центральную роль с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своего рода парадоксу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в церков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по мере углубления зависимости Церкви от с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на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м уровне её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н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ослаблял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сообщество Церковь-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значаль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Православ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俄罗斯研究（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6 年第 3 期**

（总第 199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定价：30.00 元